沧桑文丛

主编 李辉

留下世纪的
影子和声音
提供真实的
纪录和思考

风雨往事

——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

张颖·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K827.7
268

99364

风雨往事

——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

张颖·著

200237831

沧桑文丛

风雨往事

——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

张 颖 著 责任编辑 胡 茵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128千字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5.000

ISBN7—215—04108—5/K·606 定价:9.50元

张颖，女，1922 年出生于广州市。曾就读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。

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，即赴延安。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一期毕业。曾在新歌剧“农村曲”、“军民进行曲”中担任主要角色。

1939 年调重庆，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、“新华日报”记者、“群众”杂志编辑、新华社驻南京特派记者。

1949 年后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，1955 年调任北京“中国戏剧家协会”书记处书记、“剧本”主编、党组书记。1964 年调外交部，1970 年后曾任外交部新闻司、西欧司副司长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。曾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大使夫人。

江青在广州兰圃为维特克拍照。

江青、姚文元会见维特克。

“沧桑文丛”总序

D294/22

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。

沧桑是时间的流动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。如同一条河流的水，尽管来自不同山川，一旦流在一起，便浑然一体，无法将之一一分开。

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。同一个时刻，同样的阳光照耀下，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，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，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，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。

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，在他的心灵世界里，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。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，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，或者说，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。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、个人与群体、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，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、思想、人生一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
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，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门坎时更让人感到“沧桑”这个词的含义。似乎在这样的时刻，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、社会的变迁。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，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，回首往事，抚摸流逝的日子，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，处在世纪转折时刻，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。他们知道，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，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。

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，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，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，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。

主编一套“沧桑文丛”的构想，便在这样一种感受中形成。

“沧桑文丛”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，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、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。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、地位、职业的限制，题材不受其大小重轻的限制，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。

不猎奇，不虚饰，历史的真实应该是“沧桑文丛”的灵魂与品格。

重要的当然在于，文丛中的作品，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，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，提供真实的历史记录。我相信，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，才会受到读者

的青睐,才是“沧桑文丛”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在。

愿这样一套丛书,以它独有的姿态,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。

李 辉

1997 年 1 月 28 日

1 旧事重提/1
2 江青初见维特克/18
3 移师广州/32
4 饭前饭后/49
5 “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”/58
6 “我是轮人之女”/76
7 江上有奇峰偶尔露峥嵘/89
8 批《武训传》 评《红楼梦》/104
9 亲改记录 树碑立传/121
10 谈话记录的是非/137
11 周总理与《谈话记录》/154
12 旁听审判江青/164
13 题内题外/176

1.旧事重提

1992年,我去美国探亲访友。虽然我们在美国任职的时间不长,但与各地方各方面的朋友相处得很不错。我丈夫去世以后,我又已完全离开了工作岗位,有机会再去美国,既是旧地重游,也能与不少亲朋好友相聚,并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怀与爱心。我住在纽约长岛期间,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,在纪念中美《上海公报》签订20周年的酒会上,遇到了多年未见面的维特克女士夫妇,我们点点头就过去了。我们之间说不上有什么友谊,仅仅认识而已。但见到她,也难免会引起我多年以前许多不愉快的记忆。时过境迁,我也没有放在心上。

不久,我到了华盛顿。离开这个城市已整整7年了,对它既感到陌生,但又似非常熟悉。那正是初夏时节,华盛顿仍是乍寒乍热。走在我曾经住过的那条幽静的小路上,两旁已是绿树成荫,住宅前一簇簇的鲜花已绽开。这不是巴基斯坦大使住宅吗?那不是法国大使官邸吗?这些住宅是常常更换主人的。任期一满就离去了,又换上新的主人。我还去过那高耸的华盛顿纪念塔,那希腊式

的林肯纪念堂，那一大片空地仍是一望无际，绿草青青。小河畔那株株大玉兰树上鲜花已经盛开，白紫相间依然艳丽……旧逝之地，凝望这里的一切，人已去，惆怅之情总难自已。

我住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，虽仍有不少当年同在驻美中国使馆或过去在外交部的同事，却没有时间一起话旧聊天。他们忙，我也忙着去看望友谊深厚或年事已高的老朋友，或是借着午餐晚饭相聚畅谈，还到图书馆寻找一些必需的资料。几天时间匆匆过去了，直到我离开华盛顿前夕，在使馆工作的小贺夫妇来看我，她谈起我刚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关邓颖超同志的文章，说是来得非常及时，并说对于20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见面的事，美国某杂志最近又发表了文章。我正想向她们问个究竟，又进来几位别的同志，于是就扯到别的事情上去。我亦没放在脑子里去想什么。

从美国回来不久，我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，登载于美国中文《时报周刊》，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，原来20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一公案，还被人利用来造谣。在这篇文章中开头说："在大陆，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，很少有不知道《红都女皇》事件的。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，揭示了所谓'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'。"

然后接着写道："按照维特克的假设，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，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，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，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，了解全部内容。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，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，据此写成《红都女皇》一书，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，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

毛泽东,激怒了他,从而使毛、江疏远……”

我看到这篇所谓采访以后,真是哭笑不得;维特克教授这番假设,奇妙之极。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,而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。

事情已过去20年了,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,而且造那种谣言,真是荒唐至极。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诽谤,是法律所不容许的。20年前的事,虽然我不可能淡忘,但不曾想再重话当时。现在我醒悟了。我必须把旧事说清楚。当然啦,每个人写回忆录都带有自己的看法观点,记忆也不可能绝对准确,但历史事实却是不容篡改的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期,也就是1972年,曾发生过一件事,在北京可以说是街头巷议,无人不知,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,那就是江青与《红都女皇》事件。根据当时的传说,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书《红都女皇》,大发脾气,批评了江青,而且江青也就从此“失宠”了。在国内我们许多人都曾听说过,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和“四人帮”,但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,“四人帮”违背了毛泽东的原则,而绝不是因为一本《红都女皇》。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。当时在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《红都女皇》的书,“文革”以后我阅读过这本书,书中极力吹捧江青,而许多事实都属子虚乌有,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,不是事实,写作水平及文字都拙劣得很,此书在内地很少见。

无独有偶,在与此差不多时间,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,名洛克珊·维特克(以下简称维特克)于1972年夏季在中国访问期间,曾采访过江青,谈话时间长达60多小时。她回到美国以后,曾多次

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，并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，名为《江青同志》。维特克这本书与《红都女皇》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回事，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是非颠倒，甚至造谣生事，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。

维特克来中国访问期间，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，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员（另外还有六人）都是参加了的。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，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。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陪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，而这次陪见却不那样寻常，直至如今还闹出些是是非非来。既然如此，我深感有必要就我所知道的情况，把这段历史事实清理一番，记录下来，以便留给以后有兴趣的人们查证或研究。

关于维特克女士，我过去与她素不相识。我在叙述这段故事的时候，只就当时的观察，客观地描述而已。约1984年间，《中国建设》杂志预备在美国刊行英文版，为此在纽约曼哈顿"一碟盐"餐馆举行一次招待会，出席的多是中美有关人士，那一天我遇到维特克，几乎认不出她了。她却上前来与我打招呼，并把她新结婚的丈夫介绍给我。因为当时客人很多我无法与她周旋。她一定要与我谈话，当时她提出说：采访江青的材料很宝贵，想要写一本传记小说。我回答她：你不是已经出了一本书吗？并诚恳地说，江青的谈话大多不真实，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价值。她要了我的名片，说是要到华盛顿来见我，并要我帮助她再写本书。她确曾几次给大使馆打电话找我，但我认为没有必要与她为此而再发生任何瓜葛。我听说她为此还向使馆工作人员大发脾气。到底她所得到的有关江青的是什么材料，竟使她20年后还如此喋喋不休？我如今写下的将会使读者了解一切，这段文字是说明我为什么要在

20年后旧事重提。

1964年秋，我已决定调离文艺部门到外交部工作。那时国务院文化部正积极筹办举行一次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。这固然是由于解放后戏曲改革到一定阶段的必须，而更直接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又到了一个新起点：毛泽东主席批评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、帝王将相死人部，文艺界各个协会都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，如不改正会变成裴多菲俱乐部。这是向整个文艺界敲响警钟。本来在前些年就已提出各种地方戏曲，包括京剧都应该反映现实生活，也必须紧密配合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斗争。事实上全国各地方戏曲剧种，也都在不断涌现出当代现实题材的戏曲，只有京剧步子慢些。所以文化部在国务院的支持和督促下，决定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。各省、市京剧院团都在争排现代戏。我当时正在筹办京剧会演办公室工作，主要是了解督促各京剧团排练情况和审查剧目质量。所以文艺部门把我留下，说是等到会演完毕以后再去外交部报到。第一届全国京剧会演原决定在1963年秋末举行，准备工作很紧张，各地报来的剧目要审阅，已排练成熟的要去看彩排。参加会议工作的人员都很忙碌。在北京有两出戏是比较好的，一是中国京剧院已排练得差不多的《红灯记》，由院长张东川挂帅改编剧本，阿甲任总导演，李少春和杜近芳主演。这出戏是1958年大放卫星的时候，由哈尔滨京剧院首演的，名为《自有后来人》。中国京剧院根据这个剧目重新改编，整理重排。我们曾不止一次去看过排练，都认为很不错。另一个是北京京剧团，由马长礼和赵燕侠他们正在改编排练的《芦荡火种》，这原本是沪剧，后改名为《沙家浜》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几个人都到了中国京剧院的排练场地人民

剧场,看他们分段排和连排。大约10点钟左右,周扬带着一个穿灰布毛服,戴金丝眼镜,头上顶着没有帽徽的军帽的人,后边还有数名警卫员,昂首阔步走了进来。正排着的戏立刻停止了。其他人都站立起来,正不知道来了何许人等。这时周扬向大家介绍:今晚江青同志来看望大家了,她非常关心京剧革命,也就是京剧现代戏,你们中不少人都认识的,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大家惊讶得有点不知所措,因为江青已经有许多年不在文艺界公开露面了。不知道是谁,带头鼓掌欢迎,于是响起了稀稀啦啦的掌声。江青先把头上的帽子脱了,露出一头乌黑锃亮的短发,然后扫视一遍在场人员,脸上露出一点笑容说:"你们辛苦了,很好,很好,毛主席也很关心京剧改革。我也很关心,以后会常常来和大家一起搞改革……"她嘻嘻笑了一声,大家又稀稀啦啦地鼓了一次掌。

这是自1950年以后,我第一次见到江青。那晚上她用眼光扫视全场,可能没有见到我,我当然更没有必要前去和她拉什么关系。我的直觉,江青变了,变得雄赳赳气昂昂,没有平视她面前的任何人。

时间推移到1950年9月30日晚上,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前夕,在这个晚上国务院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。我记得是在北京饭店旧楼大厅,主要来宾是外国使节和一些外国友好人士。建国之初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,主要是苏联东欧,所以中国主人比外国客人多。这次宴会毛泽东主席作主人,江青则作为毛泽东夫人正式露面。她穿了一件深蓝色丝绒长旗袍,在那个年代是很显眼的。而且她还年轻漂亮,周旋于中外客人之间,还颇有悠闲风度。我那时是陪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夫妇来出席这次晚宴的。这种场面我是第一次参加。我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,作个旁

观者看看人群还蛮有意思的。我正一人发呆,忽听得从不远处传来一叫声,我抬起眼睛一看,原来是江青向我伸过手来。我赶忙立起,很不好意思,连声答应。她带笑责问:"难道你没有看见我?怎么就不过来打个招呼呢?"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"我看见你了,但你有那么多客人要应酬,我怎能过去打扰呢。真对不起,有两三年不见了,你身体显得更好了。"她说:"打仗的苦日子刚过,好个屁。"她无拘无束地笑着回答。这时周恩来总理走过来,也笑着说:"原来你们还是老相识啦。""不是你把她从延安带走的吗?那时她还是个小鬼,也是机灵鬼。"江青这么说。

1947年3月,国共和谈完全破裂,董必武同志率领南京和上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所有人员,最后一批返回延安。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已处于被重重围困的极度困难的环境中,还请这批在国统区坚持到最后的同志吃了一顿饭,江青也在座,她穿着一身灰布军服,对大家都和和气气的。看见我也在座,还来慰问几句。

把时间再往前推移。1938年初,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不久,原来在上海、武汉各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,开始纷纷来到当年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,江青这时也已经到了延安。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,这批人聚集在一起,由王震之等执笔写了一个多幕话剧《流寇队长》。主演的有崔嵬、孙维世、江青等。我那时是鲁艺的学生,在这次演出中我管服装兼跑龙套。就在那时候,我认识了江青。也就在那时候,我开始风闻有关她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。据江青自己介绍,她到延安之初,先是在党校学习,以后因为组织分配,才到了鲁艺,是女生学习辅导员,介乎学生与教师之间。我在鲁艺第一期学生中,恐怕年纪是最小的,江青到鲁艺后常常是和院长、老师们在一起,不常和学生们接近,倒是因为演《流寇队长》我

认识了她。她扮演的是农村一个暗娼,绰号"大红鞋",在舞台上很风骚,勾引那个流寇大队长。据说是她自己特别挑演这个角色的。虽说她已到了延安,还是有点明星派头。记得首场演出时,幕间她要换一次服装。我在舞台一角管着服装,忽听江青大声叫唤:"我下一场的衣服呢?谁在管服装,快拿来。"我听她一声叫喊,立刻把她该换的一件大红棉袄送到她面前,并帮着她更换。这时她倒笑嘻嘻地说:"原来是你呀,真像个小东西。"这以后她见到我常常有说有笑,还说要帮助我念台词并教我表演什么的。以后江青又觉得在延安演话剧没意思,因为许多老革命、老干部并不喜欢看话剧,而喜欢看京剧,她就想改行演京剧。本来她从未认真演过京戏,只会哼哼两句。这时她下了决心要演。她开玩笑说要拜阿甲为师(其实也真是阿甲他们教会她演京戏的)。到1938年春节前,阿甲他们几个会唱会演会拉琴的,正预备演出一场京戏《打渔杀家》,这出传统京剧剧目稍加修改还有点革命的意思。江青参加这次演出,演桂英儿,阿甲为衬托她扮演老肖恩。在延安这也算首次演整出革命京戏。彩排那天,康生来看戏,这也是少有的事,可能他早与江青认识,看完以后便大加赞扬,并声称毛泽东主席特别喜欢看京戏,正式演出时,他要请毛泽东来看,江青十分高兴。平常江青偶和我闲谈,她是很崇拜英雄人物的。她曾说过一句话,给我留下极深刻的记忆:英雄人物创造历史,她如果不能成为英雄,也要作英雄的终生伴侣。也许她曾想过,自己不能成为伟大的英雄人物,也可以跟着英雄的丈夫伟大起来吧。

《打渔杀家》正式演出时,康生果然请上毛泽东主席一起来看戏。坐在前排,康生频频鼓掌叫好。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,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。

过后不久,江青就在鲁艺消失了。再也不见她到鲁艺来了,接着流传着各种新闻,最引人注意的是,江青在杨家岭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了。在鲁艺这种传闻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。因为在鲁艺不少从上海来的同志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事情都知道一些,也就不觉得太奇怪了。

大概是6月的一个星期天,延安天空湛蓝湛蓝的,晴空万里,我觉得只有在延安才能看到这样美丽的蓝天。星期日我洗完衣服,在窑洞前靠在两张木板凳上,一边看书一边晒太阳,这是让人最舒畅的享受了。忽然山下听见喊我的声音,接着跑上来一位小战士,要我到杨家岭去一趟,说是到了那里就知道了。我只好跟着去了。那是当时中央领导住的地方,我从来没有去过。到一个窑洞门前,小战士喊了报告,就把我引进去了。原来是江青坐在一张木桌前,她让我也在一条板凳上坐下,显得满亲热地问这问那。说是几个月不到我们那儿了,大家对她有什么说法,其他几个学校又说她什么。我告诉她,没听见什么特别的,只在开始时老见不到她了,大家有些奇怪而已。

她突地站起来说:"今天你在这里吃午饭吧,请你吃炒土豆丝(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好菜了,当学生是吃不到的),还让你见见主席。"说完走出窑洞,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。这时我才抬头张望。窑洞里像其他人家一样,仅有一张木桌和两条板凳。土炕上铺了较大的褥子,还有一条军被和军毯。地上有个没有生火的炭盘,还有个瓦罐和水壶。我觉得已经坐了好长时间,在这地方心里总不那么安稳,又不敢出声。我轻轻走到窑洞外,这一片平坦坦的泥土地上也看不见个人影。心里好生奇怪,怎么连个警卫战士都没见到呢,江青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?当时我心想:我听过毛主席作报

告，但和他从不相识也从没有说过一句话，那么大的党的领导我还真有点怕，又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江青不回来可能有别的事。这么一想，我就按照原路下了山，过了河，回到我自己的天地里去了。

打那以后，还见过一次江青。当时她有点生气，说我没出息，上不得台面。那不辞而别的事也就算了。从此，我们好些年都没见过面。1939 年我离开延安，分派到重庆工作。

1950 年后 13 年中，我没有见过江青，只是在某时候听说她当了中宣部电影处长了，某时候又写了有关电影《武训传》的调查报告了，某时候又听说她去苏联养病了……直到 1963 年底 1964 年初，全国第一届京剧现代戏会演时期，她才突然出现。我还不清楚她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。自从周扬领她看过《红灯记》排演后，关于她的传闻就越来越多了。

另一件令我难忘的事，也是在京剧现代戏会演前后发生的：被称为“八个样板戏”之一的《奇袭白虎团》是山东省京剧院准备来京参加会演的节目。剧本送上来的初期，曾经有些争论：有人认为公式化，脸谱化，没有戏；有人则认为虽然有这些缺点，但可以改好，这是反映当代军事题材的剧目，应该尽量帮助改好。于是决定把这个戏从山东调到北京来演出。看演出当然要比看剧本形象突出多了，看过之后再定能否修改好。山东京剧团到北京，试演《奇袭白虎团》时，江青又突然出现在剧场。但看完演出后她没有在台上露面就走了。

过了没几天，我忽然接到通知，江青要在她的住处（中南海内）讨论《奇袭白虎团》。我是稀里糊涂跟着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齐燕铭去的。同去的有周扬、林默涵、周巍峙等人，其他我也记不清楚了。我们被带进一处三明大客厅，隔扇都是红木雕刻的，十分讲究，但

陈设的却是现代舒适的沙发。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，使人感觉有一股威严压抑、透不出气来的气氛。等了好一会儿，江青才飘然而至。她高昂着头，好像谁也没瞧见，俨然是女皇驾到。我感觉到当时大家都是屏息着呼吸的。她走到一张特为她准备的高背沙发上落座，随即扫视众人，开腔讲话："这是很好的戏嘛，我看很有基础，完全可以改好，没有什么好争论的。我已经为山东京剧团准备好材料，给他们本钱。抗美援朝的事情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可都知道。告诉你们那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，《奇袭白虎团》不过是其中小小一段插曲。你们告诉山东京剧团，很好，一定可以改好。呵，对了，那个带队的什么宣传部长，不就是谭启龙的老婆吗？告诉她，我支持，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。唔，那个小武生叫什么？好得很！唱、念、做、打都不错，是个可造之才。……"散会后我们默默退出来，我心想她说的不全是废话吗？谁改？如何能改得更好？她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。有一点肯定了，山东京剧团可以来京参加会演。往后《奇袭白虎团》没作多少改动，就那么一直演下来了。"文化大革命"开始后不久，江青又说什么山东省不接受她的意见，妨碍她修改样板戏，那个女宣传部长也被打成反革命，《奇袭白虎团》就成了江青指导创作的样板戏。

京剧会演结束了，文艺界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欣慰，也受了教育。大家都认为京剧这个古老传统的剧种是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，许多著名的京剧演员都有决心要亲自参与这场京剧革命，并为此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记得在闭幕式的前一天，周恩来总理召集京剧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开了会，总结了这次会演的经验，给大家很大鼓舞。到会的有数百人，大家精神饱满而兴奋。本来这天的大会通知周恩来总理会见大家并讲话。时间刚过两点周恩来总理就

迈着轻快矫健的步子走了进来，大家自然使劲鼓掌，而随后跟着进来的却是江青，周扬等人隔一段距离走在后边。也许多数人并未见过江青，认识她的也难免吃惊：她怎么来了?! 周恩来总理先讲话，大意是说，这次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取得很大成绩，这是对戏曲界的大检阅，说明戏剧工作者决心改革，使戏曲能更好地更具体地为社会主义服务。他称赞了老艺术家们的热情。总之是要从各个方面给文艺工作者鼓气，希望大家都能以饱满的精神，开阔的思想进行创作，不要因为受到一点批评，就无所适从，失掉信心和勇气。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给了每个与会同志以鼓舞和力量。

接着，江青讲了话，人们都报以掌声。她一站上台，脸无表情，开头就来了一句："今天我是来给你们泼冷水的。去年冬天毛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，你们一定都没有忘记吧。文艺界已经改了吗？……"

我听到这里，咯噔一下，江青为何如此讲话？其他同志也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住了，谁也不理解她怎么一出场就如此杀气腾腾。

江青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。她到底讲了些什么，我也记不清，也许就没听明白。反正她在破口大骂。使我记忆最深的一句是："解放这么些年，你们都在干什么？人民养活着你们，你们是在白白浪费人民给的粮食……"看起来文艺界又要祸从天降了。

1964年底，也就是全国京剧会演之后，我调到了外交部。

1965年全国农村开始了"四清"运动。中央各个部门的也分批派干部去农村参加"四清"运动。1965年夏末我首批到了苏北盐城地区的南通市。那时外交部在这里有一个四清工作队。我们这些队员，根据上级规定要与农民三同(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)。这

倒是和解放前夕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差不多。我住在如皋一户姓林的贫苦农民家里。那时的南通市在当地算是较富裕的，有两条像样的街道，好像还有一两家卖百货的大店铺。我们一两个月轮流回到县城买些吃的用的。那时的苏北还是个很贫穷的地区，但这个小城真像天堂一般了。

我住那个村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，但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所借住的那个林姓人家：林家是贫农，一家四口人，住两间破小草房，房屋非常低矮，没有窗户，潮湿异常。家里的母亲仅有五十来岁，但已老态龙钟，佝偻着身子，在家里负担一切家务，还照顾四岁的孙儿。我和这位老大娘住在一室，白天随着年轻夫妇去下田。她家种着几分稻田，那时自留地只有门前屋后一点点。她家养不起猪，只养几只鸡，下蛋给孙儿增点食。平日他们都是两稀一干，糠菜各半，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是几块烂咸鱼或一碟咸菜。

那时，我们同农民三同的目的是扎根串连调查情况，要抓出在农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我住在这户农民家中两月有余，他们一日三餐都无法解决，对于搞什么“四清”确实毫无所知，也毫无兴趣。说实在的，在下乡之前我们也都学习了有关文件，实际上是不甚了了。农村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走资派？以后我又调到一户村干部家里扎根，他家的生活比那户贫农稍好一点，但仍然是每日两稀一干，离什么资本主义还有十万八千里呢。这使我们回想起1947年在晋西北搞土地改革斗地主的情景。说实在的，那里的所谓的地主，其实也是穷人一个，只不过有床铺盖，有半缸粮食而已。但他比起那些赤贫算好点，把他当地主斗了，可以分他的地，分他的粮。后来总结经验的时候，都认为是侵犯了中农的利益。数十年来各种运动各种斗争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多了。

在那段时间，我们大家顶关心的倒是来自北京的各种报纸新闻，我们大致隔三五天能看到北京来的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等等。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形势表面还是比较风平浪静的，而稍有敏感嗅觉的人，也会在“前十条”、“后十条”、“桃园经验”、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等等下面感觉到一点什么，所以大家一有机会就会跑到南通市，看看报纸，听听消息。

终于慢慢流露不同寻常的气氛。

1965 年 11 月 10 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，北京各大报并没有转载，但却印发了小册子，即使是远在农村的人也不得不引起注意。

不久以后，又听说戚本禹还写了一篇文章《要害是罢官》，《文汇报》又发表了许多篇有关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，众说纷纭。《海瑞罢官》不过是一出戏，如何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？我们虽然很少议论，但都在猜测，在北京，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到底怎么啦？

1966 年 5 月 1 日刚过去几天，我们在南通市看到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篇“五一”社论。这时已经非常明显了，矛头是针对着北京市委领导，甚至向着党中央的。这对一群普通干部来说，在神州大地，真像是发生了强烈地震。各人心中都是惶惶不可终日。还好，没过几天，接到命令，全体“四清”工作队员立刻返回北京。

1966 年 6 月的北京已经乱哄哄了，满大街的人流，窜来窜去，各式各样不成形的大字报已经开始出现在街头。不过在外交部内还比较平静，照常办公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，江青上台了，扶摇直上成了国家领导人。

有着数千年自我封闭的泱泱大国，到 20 世纪 60 年代又一次

关着门自己斗自己，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。而在那场自我大动乱中不知丧失了多少宝贵的时间、精力和人才。这种损失不管怎样计算，都是无法估量的。1968年以后，发动这场运动的最高决策者，也到了欲罢而不能的地步。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，地球上各国的变化，并不因为我们闭眼不看而停止活动。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思想深处，不会忘记这些。尤其是周恩来一直掌管着外交事务，就是在他被逼到最无可奈何的时候，他也不曾忘记。到1968年以后周恩来花费了许多精力来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，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。其时我国和七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。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烧事件，就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处理的，并谈及与英国关系升为大使级的问题。当然毛泽东也很重视对外关系。在这段时间中，外交上还曾发生了被人称为戏剧性的变化：1970年国庆日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。在那个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的年代，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——诚然斯诺是中国的老朋友，而且是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对世界舆论来说，这不是件小事。当时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，也由于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，尤其是所谓“美苏和解”的逆转，他们也考虑到东方大国——中国的分量。在波兰首都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晤，已经谈过134次，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不少迹象表明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，也在考虑在有利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冻结了20年的僵局。但他们好像忽略了毛泽东会见斯诺这件大事，而却在华沙大使级135次会谈中，作出些缓和局势的姿态。说到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，一般人也许都不大注意，其实在中美正常关系中断20年间，这是唯一没有中断的一根线，我认为还是应该承认所起的一定作用。如果有心人就会注意到每隔一个

月、两个月甚或更长时间，我们就会在《人民日报》的二版，有时会在头版的一个角落，有一小方块新闻，写着华沙中美大使第若干次会谈。作用不大，却是一根没有断的线。

1971年，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。我国派出"文革"以来第一支乒乓球队出国比赛。美国也派出了九名队员。当比赛暂停休息的那一天，美国球队有一名队员格伦·科恩，大约是为了好奇，偶然地接近获得三次世界冠军的中国运动员庄则栋，并把一件T恤送给庄则栋作为礼物。庄则栋接受了，而且回赠给科恩一块印有中国风景画的手帕。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，不久却引发了中美之间的爆炸性新闻。

两天之后，中国乒乓球队领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在回国途中访问中国。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，因为中美断绝正常关系以来，无论是官方或民间都没有过访问（新闻记者除外）。美国乒乓球队的领队格雷厄·梅·斯廷霍文第二天回答，同意访问中国。他们来到中国受到热烈欢迎，周恩来总理还接见了这支乒乓球队。这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头条大新闻，也就是后来被称作周恩来精心策划的"乒乓外交"。毛泽东主席说它是小球转动了世界这个大球。

1971年1月5日，尼克松总统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传递信息给周恩来。1971年4月21日，周恩来总理仍然通过巴基斯坦给美国领导人复信，表示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（例如基辛格博士），甚至美国总统本人。这时候，两国领导人秘密传话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。

1971年7月9日至7月11日，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北京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，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。基辛格此行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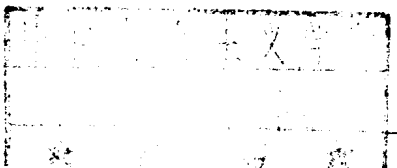
要的收获是确定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问北京。

1971年7月15日,太平洋时间下午5点半,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尼克松总统将要访华的公告。尼克松是在洛杉矶附近的全国广播公司向全国发表公告的。他除了宣读共同声明之外,还作了简短的讲话。我认为他的讲话相当出色,内容全面,措词恰当。应当承认,尼克松是美国总统中富有胆识、智慧和战略目光的一位杰出总统。虽然他曾遭受过一些非议,但事实已证明,他是一位杰出的美国总统。

后来听说,尼克松总统走出广播室来到洛杉矶的佩林诺餐厅,受到当时在餐厅中许多人的祝贺。此后几天,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,甚至以前都已准备到台湾去旅游的内阁成员们、参众两院的议员们,都改变了主意,要到中国大陆去旅行参观了。

1972年2月21日,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,中美两国发表了《上海公报》。这一事件确使世界各国为之震动。在美国初时有各种不完全一样的反响:欢呼者有之,震惊者有之,怀疑者有之,也有唱反调的。但时过不久,大家就趋于共识:这是世界和平事业的一次巨大成功。此后很快美国公众就对中国大陆产生了极大兴趣,想要了解中国大陆,到中国大陆去的热潮很快汹涌起来。

这篇故事要说到的主角之一,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洛克珊·维特克就是在这大潮之中来访问中国的。在中国境内的另一主角,就是蛰伏了十数年后,在"文化大革命"中异军突起,扶摇直上成为中国说一不二的大人物——江青。



△ 旧事重提

2.江青初见维特克

1972年,中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已到中晚期,林彪一伙已经完蛋了,江青一伙还在不断兴风作浪。他们不断给外交部制造麻烦,比如意大利记者“安东尼奥尼”事件之类。但在外交部内,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,外交形势大好,日常工作比较忙碌,这和社会上仍然是乱哄哄的情况有所不同。不过内部的不同派别、不同思想的斗争在暗中仍是很激烈的。我们这些已恢复工作的干部,仍像过去一样,按时上班,忙自己的工作。在办公室里谁也不多说一句话,谁都得自我保护,这也是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。

8月12日上午,在新闻司办公室,坐着几个副司长,像往日一样,只听见翻阅文件材料的微小声音。突然电话铃响了,把大家吓了一跳,跟着是司秘书的声音:“老张,乔副部长请你立刻到他办公室去。”我起身点了点头就出门去了。

部长办公室都在三楼。我快步跑上三楼,西边是乔冠华副部长的办公室,门是开着的。我进去时,他正站着和王副部长讲话。我站在他办公桌的两三米外,他们抬头见到是我,很随便地说:“今

天下午3时，在人民大会堂，江青同志要见一个外宾，派你去陪见。”我呆立着，脑子还没有转过来，只是感到奇怪，江青见外宾怎么找我陪见呢？我只好问：“见哪国新闻记者？”因为只有见记者才和我有点关系。

“不是记者，是位副教授，友协的客人，让你临时去帮忙的。”乔副部长说。

“我不去，既是友协的客人，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那不合适。”那时江青已经“声威”大震，随便说一句什么话就可置人于死地，谁都不愿意和她的什么事沾上边，我也不例外。

“是和你的工作无关，这是临时任务，原本是周大使去陪见的，但他已经安排别的陪见了。外交部总得去个人呀。”乔很耐心地解释，虽说是上下级，也有多年老交情，还比较客客气气的。

“另找别人吧，干嘛要我去哩？反正是临时任务。”我坚持。

“我和几位副部长，”他用眼睛看看身旁的王副部长，“已经商量过了，你去比较合适，一则是江青认识你，我们就不用先去请示；二来呢，你搞过文艺，万一她问起什么，你还可以说得上来。就这一次，你还是去吧。”乔说完话就哈哈一笑，使我无法再说什么，他又转头和那位部长谈别的了。我只好退出来，这是命令，我不能违抗，心里老大不痛快。

我回到办公室，赶紧找“友协简报”，我总得先了解一下，这位副教授——即洛克珊·维特克女士，是何许人？为何来中国？来了多久？……好容易找到几份有关材料，我匆匆看过，又认真记下要点，好在材料也极简单。

维特克原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，经她本人要求，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，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

19日至9月1日在我国访问。她想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。前两天,邓颖超、康克清等老同志已接见了她,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。在友协的接待计划中,本来没有安排她见江青。按照当时的惯例,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,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。维特克一再要求,友协送上一份请示给周恩来总理,看是否要见。周恩来8月10日批示:"江青同志,如你这两天精神好,可以见见此人,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。如不愿见,也可不见。"

江青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,便立刻决定于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……

我那时能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如此简单。

8月12日下午两点一刻,外交部按照规格,派出一个主陪见,主翻译小沈,礼宾司一副科长,一个速记员,都已到达接见厅,主管礼宾司的王副部长也来了。按常规她是可以不来的,因为是江青接见,不敢出漏子,所以也来了。她安排好每个人的座位,并就如何入场握手,摄影记者进出,以及正式照相时谁应该站到哪个位置等问题作了详细交待。这时友协负责人老丁和友协陪同老陈也都进来了。我立刻走过去和老丁她们打招呼,说明派我来的原因,并询问了点客人的情况。于是各人都坐到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,静静地等候着。两点三刻,王副部长急匆匆跑进来,一边吆喝着大家:"来了,来了。"

在场的人立即起立等候,在前呼后拥下,江青和姚文元轻松入场。王副部长立刻把我拉到江青面前说:"今天外交部由她来陪见,首长认识她吗?"江青把金丝眼镜一扶,睁眼一瞧,放大嗓门叫了一声,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。

“原来是你呀，小鬼，去年范文同来访问的时候，我还见到你。是啦，嫁鸡随鸡，你就去了外交部。”然后挥了挥手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王副部长已完成任务走了。江青忽然想起随着进来的姚文元，面向大家说：“姚文元同志你们大家都熟悉吧？是当今最杰出的理论家、批评家。”

江青和姚文元坐到当中主人的位置上，其他人也默默坐下。瞧着当时气氛，我只得站起来，把老丁请到江青面前给大家介绍，她是对外友协负责人，维特克来访是友协接待的，是否请她汇报一下情况。

江青又一挥手：“你们写的情况，我全看过了，不用再说了，时间也差不多啦，请客人来吧。”

过不一会儿，友协小俞陪伴着维特克女士走进人民大会堂江苏厅。江青立刻站起来，以惊人的速度走到门口，异乎寻常地张开双臂，准备拥抱，也许感到这种动作过分了，便停了一秒钟，用双手握着维特克的手，非常热情地说：

“哎呀，你真年轻，真漂亮，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吗？我非常非常高兴会见你，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，我不见，就有人说我骄傲啦，是不是？”

维特克睁着美丽的眼睛，带着微笑，受宠若惊得不知所措。但她迅速镇定自己，用天真的语调、轻微而有点颤抖的声音回答：

“见到你，江青夫人，我感到非常荣幸，非常感动，到中国来而不见你，那么我还算来过中国吗？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。”

在场的记者，咔嚓咔嚓按快门，一阵耀眼的闪光灯过去了。谈话开始。下面所有叙述的都是两人的原话，我只在文字不通处稍修改，但不可能是全文而是有删节。

江青:“你知道,我身体很不好,睡不着,天天吃安眠药,越吃越多,不得了啦!这是林彪想害死我,对我下毒手,用了种种手段,甚至不人道,通过医生来害我……”

我刚从门口走回,刚坐下,觉得奇怪,怎么一见面就谈这些?

江青:“你看呵,你知道,我是为了你才留下来的,专机都已备好,等着哩,我要到南方去休养,但为了你,我留下来了,你该高兴吧。”

维特克显出一脸惊异的神色,只好点头微笑,耐心而又有趣味地听着。

江青:“你不是想了解我吗?关于我个人的历史,我的革命斗争史,我都可以对你谈。唔,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哩。今天我就可以给你谈一些,你在中国还要住些天吧,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谈,很有意思,你会有兴趣的。”

江青一面哈哈笑,一面愉快地滔滔不绝。她的声音本来有些沙哑,但拿着腔说起话来,使人觉得甜蜜蜜的。我来人民大会堂时,根本不知道她们要谈什么内容,只说是礼节性会见。我望望友协老丁她们,直见她们面目发呆,直直地坐在沙发上,坐的姿势像是很不舒服,但又不敢挪动似的。

姚文元坐在江青身旁,脸向江青那边歪着,时时微笑,泰然自若。

江青的脸部下边很难看,是个倒龇牙,但嘴角两边都有小酒窝。所以在夏天的时候,她常常拿着一把檀香扇,把下巴遮着点,嘴边的小酒窝还露着,让人看得见,这就显得娇美多了。后来我才看到,这已是她的习惯动作,需要的时候,她总是拿着扇子。这时她正轻轻摇着扇,发出一阵阵檀香味。

维特克立刻把握住时机,微笑着,也用娇滴滴的声音说:

"我太高兴了,我太感激了。我非常愿意知道你个人的历史,因为你个人的历史,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。我这样说不会错吧。"

江青微微颌首,表示赞许。她已经感到面前这个美国人很聪明,说话很讨人喜欢,或者真是个可用之材。

维特克接着说:"前两天我听了邓颖超、康克清等前辈的讲话,深受教益。与你的谈话,一定更有意义。"

江青:"邓颖超、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,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,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。我可是不一样,我的面要宽得多。我可以给你谈战争,谈军事,谈政治,谈经济、艺术,还有文化大革命。"江青已经耐不住要吐露自己的心思了。

江青:"我听说,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,那么你到中国来必须了解全面情况,才能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,是吗?"

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,因为她从未对一个中国主人说过要写书,只是想搜集点材料而已。友协丁、陈两位,也显出十分惊奇的神色。她们从未向任何领导人汇报过维特克要写书。维特克听江青这么一问还猜不透她的用意,捉摸不定,迟疑片刻,接着说:

"如果我有足够的材料,能够写一本书,对我是最高的向往,我将会尽力去做的。"

江青:"很好呀,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,使中国的事情让更多美国人知道,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……"

江青虽是嘻哈笑着,却是十分认真地说:"我们合作吧,我提供你材料,我给你说,你来写,我想你一定知道,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·斯诺,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,写中国共产党,在西

方一举成名。你很年轻,很有才华。你写我,写现代的中国,那就是第二个斯诺,你将举世闻名。”

我坐在一旁,直到此时,我好像才如梦初醒:江青之所以一定要见维特克,原来如此。我看看周围的人,个个目瞪口呆。只有姚文元毫无表情,像是早已知道。

维特克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冲击,很难立刻作出合适的反应,讷讷地说:

“江青夫人,那我请求,你所谈的,我都记录,(其实她一直在记)因为太重要了。我不可能全部记在心里。”

江青:“当然可以记,什么都可以记,但也可以不记,你看我这里有翻译,还有速记,我让她们把我们的谈话,整理成文字,然后一起送给你,供你使用。”

维特克:“那太好了,江青夫人,我应该如何感谢你才好呢?”

江青:“不用谢,只要你把书写好就行了。好,按照中国人的说法,一言为定啦。”

谈话非常迅速、愉快地进行着。

这算什么礼节性会见?东拉西扯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,当然,主题是点出来了,江青让维特克给她写本书。她已感到在中国的威风已举足轻重,现在应该在世界扬名了。我只不过在心中如此想着,默默坐着。过一会儿,江青带娇带笑的声音,又在大厅飘荡起来。她好像回到数十年前一样,非常亲热地对着维特克。

江青:“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,我很喜欢这个名字,是我以前的一个老师给取的,蓝色的云彩,鹤是轻盈的鸟。你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吗?鹤立鸡群。这就是出众呀,飞翔在天空真是美极了。”

江青边说边加有一点演员的表演味道,对此她自己十分得意。

江青:“后来为什么要改名字呢?那时我到了上海,找职业。组织上让我去电影厂,有一个导演给我取名蓝平,别人写错了字,才变成蓝苹。哈哈,蓝色的苹果,有新意。我用这个名字当演员,在舞台上也在银幕中……”

江青微微仰起头,像是回忆什么,又像是在寻找最恰当的词句。

江青:“我是有艺术经验的。我很下功夫,背台词可不容易啦。如果我没有经验,我能把样板戏排得那么好吗?我一样一样地教他们呀。怎么念,怎么做,我都教,我在这方面花了多少心血!唔,对啦,今晚我要陪你去看样板戏《红灯记》,我们要到剧场去看。在剧场你会看到观众的情绪,也可以看到普通的中国人民是怎样对待我的,那么多人都欢迎呀,真使人感动。”

姚文元坐在近旁,显得沉稳,其实他是在寻找讨好江青的适当时机,这时他插话:

“江青同志既是艺术家,又是政治家,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、领导者。样板戏都是她亲自创作出来的,她的贡献很大,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。”

江青又挥了挥手,接着说了下去:“后来我要革命,要到延安去,我自己取了这个名字。江水也是蓝的,清清的江水。哎,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,所以叫江青。哈哈哈哈。我最喜欢蓝色,以前我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,从月白到藏青,我都爱穿,蓝布旗袍,既朴素又大方……有意思吧,是不是?”

维特克:“江青夫人,非常有趣,我相信这是所有美国人都不知道而又非常愿意知道的。你真是当代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妇女!”

江青:“不应该简单说妇女,我不做妇女工作。”

整整一下午，我坐在那里听她们谈得很热闹，江青情绪很高，看来她是预先计划好的。本来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，只谈一个小时。江青却大谈她个人的历史，但又不系统。因为前边有关维特克的活动情况，我没有参加，完全不了解。这时我看看坐在身旁的老丁，她面无表情，大概也是无可奈何吧。这三小时下来，我对于这位维特克，倒是有了点印象：她表面上年轻漂亮，也很谦虚，但实质是很有城府的。她很快就抓到了江青的性格，对江青时时表示出天真的微笑。她很有心计，句句话都能说到江青的心坎上。她太会讨好江青了。

江青那带点沙哑，但仍调润得甜蜜蜜的声音又响起来："喏，今晚我请你在这里吃饭，说是宴会也可以，你是我的客人呀。这里是江苏厅。"这时她站起身来，握着维特克的手，很亲热地带着维特克观赏江苏厅，"你看周围装饰着江苏省的手工艺品，苏绣是世界闻名的。你看这围屏绣得多美，孔雀开屏。这是缂丝，是一种特殊的丝织艺术品，全世界都没有啊。这里的厨师是特别从苏州请来的，他可是能做全国各地的名菜。今晚我还请你吃北京烤鸭，比全聚德要好吃多了。"

江青拉着维特克的手，绕江苏厅走了一圈，边走边讲解，兴致很高。

维特克虽是很聪明，但多少有点吃惊。她今天的遭遇竟如此奇特而出乎她的意外。她感到自己的舌头不那么灵活似的，每说一句话也都不那么流畅了，很不容易找到适当的词句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、被如此宠幸的场面。她脸色发红，显然在紧张思索：机会太难得了，一定得把握住；这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，一个了不起的女人，而且是一个神秘的人物。

这时江青突然放开手,上下打量维特克的衣服,好像眼睛一亮:"你打扮得很美,很朴素。女士们还是穿裙子好看。你这样的裙子不算超短裙(那天,维特克上身穿着鲜红和蓝相间格子的衬衫,一条牛仔服短裙子,是一般年青人的穿着),我现在也提倡中国的女孩子穿裙子,我还替她们设计中国民族形式的裙子哩。好啦,好啦,快坐下吧,我们都饿了,该入席了。"

今晚请客的菜肴与往常请客大不一样,按常规请这样级别的客人,规定是六样冷盘,四菜一汤。领导人物请客,可以加一样稍为名贵些的菜。可是江苏厅今晚却摆出大筵席,冷盘不算,有七八样热菜,外加北京烤鸭。江青不愧是交际能手、美食专家,餐桌上她唱独角,却也显得十分热闹。

江青得意洋洋,来了段开场白:

"今天的菜谱是我亲自定的。我知道,你们美国人不讲究吃,尽吃牛排,是不是?我尊重别国人的习惯。但是中国菜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一部分,很有科学性的,营养价值更甭提了。我们还讲究食物治疗。喏,这个炸子鸡,绝对不能用冷冻的,完全新鲜。它的重量不超过一斤半,否则太老。喏,这个鱼,我最爱吃活鲫鱼了,全是刚从河里抓来的,每条只有半斤多。还有我这个烤鸭呀,不油腻,不能用太肥的鸭子,并且把油都去掉了,哈哈嘻嘻,你还年轻,胆固醇对你还没有太大威胁性。"

维特克吃得很有滋味,她还没有忘记时时赞叹:

"江青夫人,你真是了不起,你对中国什么都懂。这几个小时,你教会我很多东西。"

整整四个小时了,维特克没有说多少话。但总要装出微笑的样子,脸部肌肉显然已紧张得疲倦了。但她仍然微笑着。

江青话锋一转,又说到样板戏:"今晚我们去看的《红灯记》是由我改编和导演的,连服装都得我亲自设计。她们不懂,他们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呀。那个导演顽固得很,简直是破坏,他就是不采纳我的意见。后来才知道,哼,原来他是个叛徒,现行反革命。小张,你应该认识他的,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?"

"小张"这个叫法,我20年没听过了,一时反应不过来。江青向我一瞪眼,我才醒悟,原来是让我回话哩。

"他原名叫符律衡,原来是杭州美院学美术的吧,到延安后才改名阿甲。"

我和阿甲是老同学了,深知他为人忠厚老实。《红灯记》就是他编导的,刚才江青那番话,早在传闻中知道了,但今晚是第一次亲耳听见。江青随便一句话,就把人定为叛徒、反革命。阿甲已经被关起来,江青把《红灯记》占为己有。这一天亲眼所见,江青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多了,简直变为另外一个人了。几年来听到不少有关江青的事,还半信半疑。现在我开始明白了,许多传闻中所说的都是事实。

宴会进行得非常热烈,江青又谈到美国电影《飘》。

江青:"这个女作家了不起,从小说到电影都是第一流的。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?喏,我看过大概有十遍了,每看一遍都很感动。"

姚文元也许感到这样吹捧《飘》不太适宜,轻轻地说:"从历史观点来看,内容是有缺点的。她同情奴隶主。"

江青:"电影可没有那么明显,我没有看到电影中赞扬三K党。"

江青从不承认自己有一句话是错的,哪怕是她的亲信姚文元

也不放过。

江青:“嘉宝是我最喜爱的美国电影明星。她可以称为最好的艺术家,我就崇拜她。30 年代我在上海,她的电影我都去看,哪怕没有钱饿肚子,我也要去看。”

江青滔滔不绝:“如果你回到美国,能见到嘉宝,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她,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? 简直不公平。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。”

维特克又微笑着,显然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:“听说她现在很少出门。偶尔出门,脸上也蒙着纱巾。她不愿意观众看到她已老去的容颜。我大概不会有机会见到她。”

江青:“那有什么? 唔,艺术家难免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嘛。”

晚饭已毕,江青首先站起来,兴奋地向大家说:现在我们该去剧院了。

长龙一样的车队,从人民大会堂出发,经长安街、西单过西四。当时马路两旁灯光微弱,行人稀少。车队进入护国寺“人民剧场”,剧场院内周围也仅有警卫人员。门外入场口,并无往常那种喧嚣之声。

那正是 7 点刚过,剧场内灯光已经暗了下来,准备开幕。这时旁门一开,全场灯光大亮,江青带领这一群人,穿场而过。江青昂首阔步,自己鼓着掌。于是楼上楼下观众席上所有的观众都起立鼓掌。走到正中坐位时,江青回过头来向楼上楼下的观众颔首微笑,双手举起作感谢状。观众看见她还带着个外国人,更是一片哗然,欢呼大叫。

我们几人大为惊讶,这种场面还真没有见过哩。心想,这是搞的什么花样? 干嘛要制造这种场面? 是争取人心还是有意做出来

△ 2 江青初见维特克

给维特克看呢？让维特克知道她在中国有如此地位？大概这两层意思都有吧。我们几人心中当然明白，江青来的地方，一般人是进不来的，这里边坐着的“观众”都是经过挑选组织好的。

一直闹到11点多，江青和维特克握别时，还特别提到，她会找到机会，再约见维特克，还可以详谈。

看完《红灯记》，我回到家中，心里很不平静，回想过来的这一天，江青的种种表演实在太出乎意料了。想起1964年京剧会演时，江青突然出现在“人民剧场”。第一次上台见见演员倒也没有什么，但过了几天她又去看连排，情形可就大变样。那次她上台见到阿甲好像笑嘻嘻地，而话中却带着极大的讽刺甚至是愤恨：“你真成了大导演哩，京剧界的大师。是不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也用于京剧呀？你们的戏很不错，我来祝贺。”

阿甲连忙说：“江青同志指正，大家欢迎江青同志来关心我们的演出！”他是个老实人，说的也是老实话。

过了不几天，江青带了自己一班人马再次来到剧场，看完戏跑到后台，院长把全体人员召集过来，听江青指示。这天江青的脸上没有了笑容：

“你们的戏还可以，但问题还有不少。你们穿的衣服太新，都是穷人又在旧社会，难道不该穿打补丁的衣服？京剧里也有化子装嘛。少春呀，你的个子矮，没有多少英雄人物的气概。杜近芳是演青衣的，铁梅应该是小旦……”

所有在场的人，鸦雀无声，面面相觑。

全体散了，留下阿甲和院长，江青又说开了：“应该换掉两个男女主角，你们剧院没有人啦？你们反映的是地下党的生活，没有这个气息怎么行，我看呀，还得好好改改……”

阿甲近乎哀求了:“你的意见我都接受,都可以改,但是李少春、杜近芳不好换,时间太仓促了,而且角色中的唱腔动作都是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,我要尊重演员的劳动。”

京剧会演期间,《红灯记》获得很大成功,深受观众欢迎和戏剧界的好评。可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没几天,阿甲就被戴上“牛鬼蛇神”、反动权威的帽子遭到揪斗,没过几天又被打成了叛徒。江青有一次讲话说,阿甲就是不听我的话,破坏样板戏,于是再一次升级将阿甲打成了现行反革命,关起来了。几年来对于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实,哪个人的心里能不去思考呢?

3.移师广州

江青会见维特克,在外交部也不算件小事,友协要整理情况向上面反映。我是外交部派去的,那就得向外交部领导汇报。第二天上午我到乔副部长那里,把江苏厅的谈话,如实简要说了。他无可奈何地说:"江青要说什么要干什么谁也管不了。你听了就算了。"我又告诉他,江青还要见还要说,还要整理记录,这些是否都交给友协办呢?乔突感愕然:"再说吧。"

17日夜,周恩来总理召集所有陪见接待人员了解情况,他当然已看到友协的接待简报了。周总理告诉大家,江青已经乘专机飞到广州,行前决定还要与维特克继续谈话。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开始谁也不说,还是周总理指定让老丁先说,她认为没有必要再见了,因为维特克想了解江青的历史,那一天已说了不少。看来那时周总理对江青的事也颇感棘手。他说江青去广州前已留下话,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再谈。他接着说,是否再了解一下维特克女士的情况:她的水平如何?她希望了解中国的目的是什么?他指着老丁和我说,你们分别找她再谈一次,尽量多了解维特克本人

的情况。

我第二天就到北京饭店拜访维特克,我非常客气地和她闲谈,问她在中国过得如何?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否符合她的需要?其实我要知道的是她的中文水平到底如何,她对中国近代当代史的了解和研究,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。但结果使我相当失望。她既不能听又不会讲中文,看中文报纸也不大通。我很奇怪她是怎样把几篇文章翻成英文的(据说她把《红旗飘飘》中的几篇文章翻译并发表了)。近代史她知道些,当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可说一窍不通。对孔夫子,她简直谈不出什么。古代史、文化哲学等等都不愿谈及或并不知道,而对国民党内的某些新闻轶事她倒知道得不少。我真纳闷,这就是中国问题专家吗?当然一两次接触对一个人是难以全面了解的。

19日晚上,周总理又召集会议研究情况。老丁了解的情况使我很有同感。维特克对蒋夫人宋美龄津津乐道,还有特殊的见解,并认为蒋夫人在美国很有影响,所以蒋介石就能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。因此如果新中国要得到美国的援助,就必须把江青捧出来,使美国人对待江青也像对宋美龄那样。所以她对江青有兴趣,她要把江青介绍给美国人,使美国也援助新中国。她的这种见解对于我们来说,可以说是难以理解,甚至是不可思议的。维特克的这一说法,友协简报上刊登了,而且江青也看过了,她却毫不在意。也许,她真想与宋美龄比试比试。然而,她对别人并不了解,尤其对美国政策及国内民情毫无所知。

大概周总理几天与江青不断在电话中商讨而不得要领吧,8月24日半夜,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他的办公室,又召开一次小型会议。只有接待过维特克的六个人参加。这时维特克已经由江青

办公室安排在上海参观样板团，看样板戏，并有专人向她介绍上海“一月风暴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全部经过。

周总理经过一天劳碌，已显得很疲劳了。他从办公桌边站起来走到我们身旁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来回踱步，然后停下来对我们说：“对不起，这么晚还把你们叫来，有点急事。刚才中央办公厅来电话，说是江青在广州一定要见维特克，明天就把维特克接到广州，陪见翻译还是你们原班人员吧。今晚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。”我们几个人都认为其实可以不见，我们都和维特克谈过话，她对中国虽有兴趣，但谈不上懂得多少。鼓励她写书，看来不行吧。江青让陪同带去了五部有关战争的电影，老陈从上海来电话，说维特克一部都没有看。据说维特克除了对江青个人的历史以外，她表示对什么都没有兴趣。

周总理此时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：“不要谈什么战争。你到达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刻转告江青同志，只谈文艺。再见一次就够了。”这是对我说的。然后对礼宾司的同志说：“维特克女士的签证是28日到期。她不是说非要赶回美国开课吗？不要再延期了。”

讲完这几句话后，他停了一下，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，拿出一本《鲁迅诗选》交给我。

“这是老版本，《鲁迅全集》没有收进去。对了解鲁迅思想有参考价值，你带到广州交给江青同志，也许对她有用。”

大家看着周总理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态，以及又如此仔细关心江青，很受感动。

载着维特克一行人的专机于第二天11点半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。有十多个人来迎接，包括广东省外事办的主任。这位外办

杨主任走在前面,先与维特克寒暄了几句,就走到我身旁。我们是认识的。他轻轻对我说:"你来了就好,那位首长正等着见你哩。"于是把我拉到一辆车旁,里面走出来一位高大的警卫战士,一举手把我送进车里。杨主任说:"你先去吧。其他一切由我安排,你们所有来的人都住在解放路广东省迎宾馆。"

刚下飞机,耳朵里嗡嗡发响,心神还没有镇静下来。车里只有我一个人,只觉得汽车在广州城里奔驰而过,也不知道拐了几道弯。过了一座桥汽车停在一座大建筑物旁,我被带进一间异常空旷的大房间里,不知又拐了几道弯,来到一处室内的游泳池。这是一处建筑讲究,尺度标准的运动员训练场地,设备齐全,空调适度。我好奇地站在游泳池旁,带我进来的那位警卫战士,不知何时已退出去了。我正有点奇怪地四面张望着,忽然从另一端一张大的藤制躺椅上,慢慢坐起一个人,身穿游泳衣,头戴游泳帽,抬起头来哈哈笑着向我招手:此人正是江青。

江青:"小张,你们都到啦? 过来,过来,快过来呀。你现在明白了吧,我为什么夏天要到南方来。这是多么好的游泳池! 我怕冷,在南国夏天,我可以痛快地游泳,舒服极了。北京比这里可是差得远去哩。"

江青很高兴,她如此亲热的样子,使我惊讶地睁着眼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江青:"你们都来了? 维特克也来了? 很好,很好,小张你怎么木讷讷的。"江青拉着我的手,使我不知如何是好。

江青:"这些年我们很少接近啦,这是环境所致,没有办法呵。我第一次看见你时,你简直像个小东西。哈哈哈,真有趣,你现在也快成老太婆啦。我早就想跟你谈谈你的工作。你现在干什么?"

“我在外交部。”

江青:“没意思,你应该归队嘛。我那个文化组呀,就是缺少有文化工作经验的人,你可以来帮助他们呵。你知道,陈不听我的话,那个刘呀,哎哎是个小混球,跳跳舞还可以,干其他的事什么都不行。”

突然间开始这样的谈话,太没有思想准备了。我心中只想着一条:不能再干什么文化了,更不做与江青发生任何联系的事。

“文化大革命以前,我执行错误路线,觉悟不高。这几年我也不搞文艺了,现在许多事我也不懂,知道得太少……”我尽量平静地回答。

江青:“不懂可以学呀,你可以当领导嘛,在我的领导下工作嘛,算了算了,现在不谈。”她随即摆摆手,显出不耐烦的神气。

我没有忘记,手中还拿着周总理临行前交给我的那本《鲁迅诗选》。立即正面对江青说:“周总理让我转告您,维特克女士只有很少时间了,请您就谈一次文艺问题。这本诗选是他送您参考用的。”随即双手把那本《鲁迅诗选》送过去交到江青手里。

“啪”的一声响,江青把那本《诗选》扔到躺椅上,说:“行啦,行啦,你走吧,下午3点钟来向我汇报维特克的情况。”

回到宾馆,我走进为我们准备的高级迎宾馆,陈已经等在那里了。她一见面就急着问:

“我的好同志,你到哪里去了?维特克一直等着你,她说非要马上见你不可。”

维特克已坐在会客室里,脸上的表情不像往常那样微笑媚人,我和她握过手,刚坐下,她立刻生硬地说:

“我和江青夫人第一次谈话的记录,相信你已经带来了,就请

交给我吧,这对我来说,是十分宝贵的。”

维特克今天的样子,又是这样的命令口气,我觉得有点可笑。我尽量非常礼貌地对待客人。

“还没有整理好,需要修改和翻译。你要的不是中文原稿呵。答应过的事情,我们一定做到的。”

维特克:“我必须亲自带走这份记录,明天你一定交给我。这是江青夫人亲自答应我的。”

“在你离开我国之前,第一次谈话记录,一定能交给你。今天下午江青夫人还要接见你。”

送走了客人,回到为我预备的房间。这处迎宾馆,是那个年代当地最好的宾馆了,古老样式的新建筑,陈设着硬木家具。给我预备两大间,其中一间是给接待人员碰头开会用的。但除了给外宾住的房子以外,都没有空调设备。南方的8月天,气候又潮又热,闷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倒在床上想休息一下,但连日接二连三的事,都令我感到意外。闭眼休息一会吧,却已经满身大汗,走进浴室冲洗一遍,那也枉然。我知道老陈和小俞住在对面房间,便走了进去,她们都已洗过澡,开着风扇乘凉。她们两人虽然都在友协工作,但也不是十分熟悉,又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谁愿意多说话而惹是生非呢?老陈年纪大几岁,成熟些,话就更少了。还是小俞忍不住:

“大姐,你说说又跑到广州来干什么?这位什么副教授,我看她是越来越神气起来了。江青为什么对她产生那样的好感呢?我看她对中国,什么也不懂。”

“我也弄不清楚,本来说是不见了,又突然打电话到上海,还派专机接到这里。”老陈接着说,“张大姐,你刚从北京来,到底是怎么

回事呢?"

"这是江青自己决定的,看来周总理也阻拦不了。就让江青和维特克再谈一次,就在今天下午。听说你们带着五部有关战争的电影。维特克看了没有呢?反应如何?"

"一部也没有看,她说对战争没有兴趣。"

8月25日午后4点,三辆小轿车把我们载走了。我和礼宾官唐坐的第一辆车跑在前面,把其余两辆远远丢在后边。出了城市,路过郊区,也数不清过了多少条大路,又弯弯曲曲经过许多小道,像是走进一个小村落。只见有几户人家,数丛翠竹。车子开过去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。车子嘎的一声停住了。在这场地上,中间有花坛:外层一圈是茉莉花,散出浓郁的香味;中间是各色盛开的鲜艳花朵;四周一根根柱子上还有圆顶的路灯。多年不到这个城市了,没想到在这半山上,开出了这一片平地,建筑了这么一幢漂亮的现代化别墅。

我们的车在一幢建筑物前刚停下,两个穿着笔挺薄呢军服的人便拉开面对的大门,让我们进去。我们走进一条宽大的走廊,也可以说是一间长长的大房间。面对阳光的一面,全是落地大玻璃窗,看来是为了冬天在室内得到充足的阳光。这时,右边屏风后面,传出了江青的声音,她叫着我的名字。

江青:"维特克的情绪怎么样?在上海谈得有意思吧?几部有关战争的影片是否都给她看过了?她都说了些什么?"

"据说她一部战争的电影都没有看,小俞告诉我,维特克自己说对什么战争都没有兴趣。她只对你本人的历史有兴趣……"

"呵,你没跟着去上海,算啦,她们也快到了,一切准备齐全了吧?"

江青踏入那间显得很空旷的会客室(准确地说这是间会议室),这是左右两边有两大间、中间一间较小的大房子,四周摆满舒适的小沙发,中间正对大门还有几张大沙发,显然是为首长准备的。离沙发不远处,有一张大长形桌,上面已摊开五幅大地图。矮矮的几处茶几都放着一个或两个麦克风,接连着录音设备。我和礼宾官唐互相看着,还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架势接见外宾的。一会儿,一个穿着讲究的军官从里间走出来。

"首长好,一切准备齐全,请您检查。"

江青:"你们认识吧,我的老战友,在西北战场我们一起作战,观点一致的。"

我向他点点头。其实互相早就认识了,只是多年不见面,也从不互通信息。我突然见他觉得奇怪,怎么他也来了?在北京时也没听到有关交代呵。他也许已猜透我的心思,向我解释,说是直接飞来的。"已经到这里几天了,中央办公厅交代说,首长召唤我来的,开始我也不太明白。"军官愉快而爽直地回答。

我已猜出今晚江青要讲什么了,无奈只得走到她身旁,极力压低声音说:"江青同志,据陪同到上海的同志说,维特克对战争没有兴趣。而且周总理特别交代,让我转达,请你只谈文艺问题。"

江青脸色突然一变,金丝眼镜后边,两眼瞪得鼓鼓地看了我一眼,"哼"了一声就转身走开了。但一会儿又转过脸来,笑嘻嘻地说:

"哎,小张,你看我今天穿的布拉基怎么样?藕荷色,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,蓝色当然也是我喜欢的。"

这时我才发现,江青今天穿着一身真丝双皱料子的连衣裙,脚穿一双白色皮鞋,手上拎着一个方方的白皮包。"文化大革命"以

来,还真是绝无仅有。

江青:"我觉得女孩子穿裤子不好看,为什么不穿裙子呢?你们都没有裙子吗?李副官,明天给她们每人发一条裙子,算我送的。"

江青的声音又突然提高了八度,吓了我一跳。我心中十分奇怪,江青的声音和脸色何以能如此千变万化,而且仅仅发生在一瞬间。

这时,维特克带着只有见江青时才特有的永远微笑走了进来,孩童一般清脆甜蜜的声音响了起来:

"呵,这是一所多么美丽的乡间别墅呵,建在丛山之间,幽雅清静,超凡脱俗。按照中国的说法,真是世外桃源。"

江青:"你是我的客人,特别请你到这里看看。这是林彪小舰队建造的。他很会享受呀。现在他完蛋啦,摔死在温都尔汗。应该让我们来享受一下。林彪很坏,他害我呀……这房子是盖得不错,你看,前面有这样宽敞的走廊,夏天可挡太阳避暑,散步,冬天可以晒太阳而不受风吹。后边还有哩,一会儿我在里边请你吃晚饭。"

江青拉着维特克的手,一起走进大客厅,让她坐在紧靠自己的大沙发上,又特别对她介绍那位参谋:"他是我的老战友,谈西北战场,他是我的助手,喏,这些地图都是他准备的。"

维特克显出一点吃惊的样子,立刻又镇定下来。她注视着茶几上的麦克风,娇滴滴地问道:"江青夫人,关于战争,我懂得很少,我怎么能记录下你的谈话呢?我想这不是扩音器吧?"

江青:"这是录音器,我所讲的全部录下来,我不仅可以给你全部记录稿,而且全部录音带都送给你,该满意了吧?"

我听着大为吃惊。职责所在不得不对江青说:“江青同志,把录音带送给外宾,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呀,别说得太肯定了,免得以后麻烦。”江青装着没有听见。

两人谈话又开始。这是1972年8月25日下午6时30分至26日凌晨3时40分。我下边摘录当时的部分谈话记录。可能有点乏味,文字也不流畅,但这是真实的记录。

江青:“你好吗?听说你急着要走。”

维特克:“我30日离开中国,自从两星期前见到你以后,对时间的概念记不清了,不知今天是星期几,是几号都记不清了。自从上次谈话以后,我看了一些你亲自培育的戏,也读了剧本又加以研究,我感到好像进入了不同的世界。”

江青:“你只知道一个方面,你总想和我谈文艺,这只是整体的一个方面。你同样板团谈了就行了。”

维特克:“有机会同样板团谈谈很重要。他们十分具体地告诉我,在江青同志领导下如何创造新的英雄人物,这一切具体例子非常重要,可以帮助我了解政治和文艺革命是如何实现的。这对我有很大帮助,是你给我的机会,因此我十分感激你。”

江青:“你是个很聪明的人,会了解我在这方面付出了什么劳动,所以这方面不再同你谈了……

“谈谈计划吧。我不了解你,但对你的印象是好的。我读了一个材料,说邓大姐已经见了你,我的飞机已准备起航,但留下来了。如不见,显得我骄傲、自满。所以临时组织了戏请你看。晚上回家,我想应该对你尽点义务。我还是起航,在这里休息了三五天,是绝对休息,记忆力有了很大恢复。这以后知道你要写一本斯诺那样的书,我就有点担忧,有点替你着想了。当然也是为了对中国

人民负责。我见了你五天以后替你着想了。你到底想写一本什么书？是本浮光掠影的书还是有分量的书？”

维特克：“我确实希望写本书，描写文化和政治，文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的书。如可能，想写本关于江青同志个人在改造文艺方面所起领导作用的书。过去外界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大歪曲，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误解，全然忽视文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，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方面意味着什么。”

江青：“不仅是文化革命，是一场伟大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大革命，总之是一场全面内战。我不是对你说了吗？我为你着想。斯诺比你有优越的条件，因为他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。此外还与周恩来和其他老革命者谈了话。而你呢，最老的是邓颖超同志。邓大姐工作历史长，但工作角度我比她宽。我为你这本书在做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。这段历史可以生动地告诉你，可以使你了解长征和现在。但我不强加于人，你如不喜欢军事，我们就不谈，你愿谈什么就谈什么，你问的其他问题我没有准备，但我们可以漫谈。”

维特克：“你刚才谈的都很重要，至于谈什么和怎么谈，可以让你来决定，军事也好，其他也好。你可以谈延安或上海时期，革命怎么进展的，还有你一生的情况。”

江青：“如果你了解我的历史，那谈起来长了。我建议先不写我，而写中国革命的书。如有时间再写我。当然你也应该对革命过程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有所了解，不然我们怎么能保持革命青春，但必须加上革命。”

维特克：“自从我来华后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，特别是文艺方面了解得很充分。江青同志的作用在国外受到很大误解。对此我感到很难过，我想在今后的作品中予以纠正。

我不是指外国人反对你,而是不了解你,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你。因为在国外材料很少。我认为我了解中国,我十分尊重中国的过去和现在,我感到你个人这方面的情况,应向外国人做出澄清。我愿做些事情,对此予以纠正,我对在外国介绍你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很感兴趣。我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,在这张白纸上可以写任何东西。"

江青:"我在过去起的作用也是很微小的。我是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,我21岁就一举成名,但我不要,我要找党。我受到政治迫害,外面受国民党的公开迫害,党内受坏人迫害。我是无名英雄,甘心做无名英雄。"

维特克:"我相信,江青夫人,你长期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斗争,你也为此作出过很大的贡献,这些都是我非常想了解的内容,我相信这都是非常有趣的。"

江青:"今晚能否谈解放战争时期?因为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,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,不会枯燥的。不仅为你的书,也要为中国党、中国军队、中国人民。我好长时间想谈,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。别的问题,不瞒你说,广州的同志又搞掉了我两天时间,给1500人作个报告,给干部作的。我在这里是保密的。因为群众一发现就不得了了,我就休息不成了。"

这时江青站起身来,走近那张长方桌。那桌上原已摆上三张大地图,还有教书用的长木棒。她拿起教棒,又叫服务人员摆好录音设备。

江青:"先给你看看全国的形势图,看看三年半解放战争的图,得到一个总的概念,然后给你看看陕北的图,这样就容易理解了。你看共三年半的情况我只用了这么几张纸(挥舞手中三张半纸).

而他(指张参谋)用了好多纸。但我感到累,因为好多年没谈这些事了,要好好回忆。”

维特克:“希望不把你搞得太累,我知道你正在这里休息。”

江青:“这对我也是一件愉快的事,多年来我一直想做这件事。这个战场的情况除了毛主席,只有周总理、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全面地向你介绍。此外还可把全国的情况向你作个大致介绍。先看看不同阶段的地图(指地图),这是解放战争初期、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形势图。

“解放后我经常下乡,1951 年下乡两次,为《武训传》连下乡到组织文章、自己写,花了八个月时间。我们还是让它上演,但一个批评,他们就收回去了,一篇调查报告,他们就不吭声了,解除武装了。

“1951 年还搞了三个月土改。

“日本投降时,敌后大部分国土在我们手上,不是在国民党手里。抗日战争主要是八路军、新四军打的,蒋介石躲在四川省峨嵋山。

“我准备送给你地图,通过这些图可以了解事件的发展史。要了解全国的情况,回国后还可看毛选。毛主席写了许多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,在第二、三卷可以找到,如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、《论持久战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联合政府》等。抗战结束时,我们有一百二三十万军队,老百姓 1.3 亿。蒋介石靠美帝用飞机、军舰运兵,来抢地盘,敌人 430 万,敌占区人口约 3 亿多。

“你知道蒋介石有个绰号吗? 老乡管他叫‘运输大队长’。当时美帝出面调解,所以有个三人小组。双方都争取时间,我们也要跟他们和谈,我们的毛主席到重庆谈判,结果双方签订了‘双十协

定'。但毛主席到延安刚下飞机,蒋介石就撕毁了协定。很清楚,我们是要和平的。"

维特克:"外国人都了解这件事。"

江青:"所以我就不阐述了。(看图)看这三张形势图,130 万对 400 多万,我们采取的战略方针是毛主席提出的积极防御。战略上敌多我少,战役上我们是多数,几倍于敌人,我们一定要吃掉它。所谓'歼灭'不是肉体上的,而是解除武装。有些人死了,多数是俘虏,我们的俘虏政策你是知道的。"

维特克:"如果我说得对的话,你们不杀他们而是改造他们的思想,让他们认识错误,支持共产党。"

江青:"不完全这样。如果他要回家就给路费,留下的就参军,绝大多数不愿回去,因是抓壮丁抓来的,回去后怕再被抓,另外他们还是有些政治觉悟。他们只要求给一顶帽子。(看到维做记录)不做记录不是更好吗?"

维特克:"我知道不能用录音机,所以拼命记。"

江青:"记录很累,记录时不能听到我讲的每一件事。"

维特克:"你能否给我录音带?"

江青:"可以。我不是说过吗? 录音也是为你准备的。

"在战略防御阶段,我们主动撤退了一些地方,这并不是说我们被打败了。如涟水战役七战七捷,歼灭敌人 5.6 万人,但毛主席下令往东撤。在延安也是主动撤。主席是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的,而是保存有生力量,抓住有利时机,歼灭敌人有生力量。当时也有很大的争论,虽然还不能形成一条路线。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。撤退延安,当时不肯,以后怕坚持,要到河东去,认为那里安全,毛主席驳斥了这种观点。因为敌人是两个拳头,一

个在华东，我的家乡被打得稀巴烂；另一个在陕北，它直扑党中央，多9倍人，他们30多万，我们2.5万。毛主席说，敌人有腿，我们也有腿，我们的腿比他们更长。这是一点。另一点是中小城市丢给它，对它是包袱。敌人为了保卫大小城市就要分散力量，而我们的力量是集中的，你懂吗？不枯燥吧？”

维特克：“很有趣，我虽不是军事家，但从你那儿学到很多东西。”

江青：“那时我们是内线作战，也就是说，在根据地打。敌人打仗像瞎子，因为群众不向着他们，而向着我们。我们大部分地区是经过减租减息和土改。

“抗战以后，国民党有三次反共高潮，它原来供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军费，后来不给了，要饿死我们。1939年开始不给东西，我们就上山开荒，我也上山开了半年荒，手上有六个老茧。毛主席提出‘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’。当时对女同志优待，例假休息两天，他们让我留在家里洗衣服，我不休息，坚持上山，顶一个中等劳动力，我不甘落后于男人。国民党想饿死我们，围困我们，结果我们吃得比过去还好，穿得更暖。你去过南泥湾吗？”

维特克：“没有，我读过，那是自力更生的模范。”

江青：“我去过那儿，在那里开荒。后来我肺部有问题，大夫不让我纺线，所以我织毛衣，一年上交十件毛衣，利用业余时间。社会上也织。男的种田，女的织布，实际上女的也种田，我就种田。”

维特克：“哪一年？”

江青：“1939年。1939年上半年开荒，上山穿大衣，下山穿单衣。别人比我做得更多，我不过是其中之一，没什么特别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太谦虚了。”

江青: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(看图)这张图是关于战略反攻的,从1947年7月开始关于每个地方怎么打,消灭多少敌人,都标在这些图上了。这些图是为你准备的。战略反攻时我军300万,敌人只剩290万,它处于劣势。毛主席采取中间突破,插入敌人心脏。二野从大别山,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向武汉进攻,一边武汉,一边南京,敌人无法招架。1948年底蒋介石要同我们和谈,我们也和谈,蒋介石名义上下野,李宗仁上台,蒋介石实际上掌握实权。谈判结果签订了和平协定,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不签字,国民党谈判代表回不去了,都没回去,张治中、邵力子、章士钊等都养起来。张治中三上延安,是他的资本。有一次毛主席出外巡视,他也跟去,那年是1958年到1960年中的一年。

“西北战场,毛主席坚持西北战场,指导全国。党中央分成前委、工委、后委,这张图标了(敌人)从进攻到完蛋的全过程,每个战役的数字都有,我就不详细说了。如果你同意,我们休息一下,然后吃饭。饭后再介绍西北战场的情况。”

维特克:“能否给我这些图的复制件?”

江青:“这些图就是为你的书画的,都是给你的。你看我把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都请来了。他也是跟我一起,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坚持在西北战场的。”

维特克:“那好,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的解释和图联系起来了。”

江青:“今晚先把这个讲完,先讲三年半解放战争的概况,然后重点讲西北战场,这样可以讲得更生动,这就是我给你那本书所做的钢筋水泥的基础,工作非常累,因为得反复核实,拿出根据,别人驳不倒,这是历史,不能歪曲。”

维特克:“对任何提供的材料,我都很感谢。”

江青:“我告诉你的材料斯诺没有,今天我给你讲的比给斯诺讲的要深。我给你的这些材料很扎实。我搞了那么多样板戏,我自己没有实际经验,能帮助他们吗?我读了大量军事历史,不管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,甚至被歪曲的,我都读,单华北军区的历史材料就一大堆,我都读了,还到地方去调查,每个戏都要去调查。”

维特克:“经过军事研究,再打仗你们就容易得多了。”

江青:“一般人都知道怎么打仗,珍宝岛的战役就是没有打过仗的人指挥的,会打仗的人牺牲了,不会打仗的边防站站长出来指挥,只二十几岁,不满30岁,是我们党‘九大’代表,指挥得很好,叫孙玉国。”

4.饭前饭后

这时已到晚上9点了,江青站起来,拉着维特克的手说:"哎哟,说了这么多话,累了,也饿了,休息一会儿,咱们该吃饭啦。"

江青:"今天请你吃广东饭,中国有句老话:吃在广州,穿在杭州,死在柳州,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,而广州人特别会吃。这是盐焗鸡,味道不错,还有清蒸鱼,这种芥兰菜只有南方生产……你最好同群众接触接触,到越秀山去看看,我现在不能去了,否则成了展览品了。我在这儿必须保密,因为广州军区要为我的安全对中央负责。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,会给我保密,所以我请你到这里来。"

维特克:"希望你有时间好好休息。"

江青:"对,我应好好休息。但我怕把电报和文件压得太久,怕落后。我应有责任,我在这里同你谈话,我对广州军区的讲话已经经过政治局批准,我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。"

维特克:"我相信。"

江青:"当然我们不是从早到晚都很严肃的,不是这样的。过去当我能同主席经常在一起的时候,我们谈各种问题,经济、政治、文艺等等,我们从来不枯燥。你一定知道毛主席很会游泳,也很会

打乒乓球。”

维特克:“这方面的照片我都有。最近我买了几幅毛主席打乒乓球的丝织画,我想带回去送给我爱打乒乓球的朋友。我知道毛主席早在1917年时就写过关于体育的文章。”

江青:“那时他的观点还不是马列主义的。毛主席对自己做过分析,开始他信孔夫子,后来他信资产阶级,以后感到这些都没用。五四运动时他是个领袖,带一个代表团去请愿。北洋军阀的总理叫靳云鹏,他拒绝见代表团,但代表团一定要见他。进去了,毛主席说过当时出来一个人,这个人连话都说不清,后来这个人说,他就是靳云鹏,这个名字还得查一查。”

维特克:“这录音了吗?我怕丢了这一段,我可以记录吗?”

江青:“不需要,有人替你记录,你知道我们为你负责,为中国人民负责,为世界人民负责。不讲假话。”

江青:“二七大罢工时,毛主席去长辛店。他是第一个到安源煤矿去的,去了好几次。他有个弟弟叫毛泽民也去过那里。毛主席搞工人运动、农民运动、学生运动和士兵运动和其他各种工作。他常说,他是个老师,开始不会打仗,但是后来蒋介石杀人,没有别的办法,只好拿起枪来。开始老打不了胜仗,后来总结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和建立根据地的政策。不存在天才的问题,只是有些人更聪明一些。当然也可以说天才,但出生后要经过实际经验和锻炼。对不对?毛主席有丰富的斗争经验。”

维特克:“对。经验非常重要,一段时间后要总结经验,然后回到实践中去。”

江青:“要回到实践中去。”

维特克:“通过访华几周中我体会到这是十分正确的。我参观

过业余体校和艺术学校,我看到那里的孩子们也接受正规教育,提高水平,当然大学就更强调实践了。”

江青:“帝国主义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,我们能。当然在总结经验时要提到两个方面,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。(见维忙于记录)别担心,有人替你记录,只要你好好听我说,并放松些就行了。”

维特克:“我现在已经放松一些了,我在考虑刚才江青同志讲的内容。”

江青:“有像你这样一个女作家是好事。”

维特克:“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?”

江青:“不管你的书写得全面还是不全面都可以反映中国革命,总之你会尽最大努力写成有分量的书。这对中国人民有利,也对其他国家人民有利。”

维特克:“我现在已认识到这一点。”

江青:“举个例子,战略上我们以少胜多,在战术上以多胜少,这个原则给世界人民带来希望。给全世界带来希望,我会更具体地谈这一点,这样你就可以懂了。当我们初到延安时(那时我还不认识毛主席),毛主席到处作报告,因为那时有人要封锁他。一听说主席要作报告,革命青年就设法搞票去听,不管地方多远也要去。”

这时江青突然站起来,举起酒杯,对着维特克:“来,来,来,我们大家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!为你的健康,为你那本书顺利出版而干杯!

“听说一跟你谈战争,你就感到枯燥,一会儿我再跟你谈这个问题时,我想你不会感到枯燥了,因为就像写小说一样,真实生活就是那样的。”

维特克:“这很重要,因为那时每天都要作出决定。”

江青:“这也是中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,虽然遵义会议也是个关键时刻。洛川会议是个关键,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都是关键。这些都在毛选中有。要是那时没有坚持在西北战场而撤到河东去的话,那我们就会被像赶鸭子那样赶出来,被敌人消灭。毛主席带头坚持在一个战场上,而且指挥这个战场,指挥全国。当时周恩来同志是他的得力助手。周恩来同志原来还是党中央军委副主席,后来彭德怀担任一野司令员。所以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,周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代理总参谋长。他(指张参谋)对这个就不清楚了。”

维特克:“你1933年入党,作为一个青年,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?”

江青:“责任很大。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。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。因为穷,几乎给流氓骗了。当然他不能骗我,但也欺侮我。”

维特克:“什么样的流氓?”

江青:“有一次我弄了点钱,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,是个日本船。我的朋友送我,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,让他在船上照顾我,因为我晕船。我坐过三次海船,还爬过崂山,爬山我是老虎,坐船是狗熊。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。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。我晕船,吐。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,他就起坏心了。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,我们开旅馆去。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。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,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。如果没有人来接我,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。那是我当时的想法。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,因为要住那个旅馆,先得交

15块钱的押金。所以我就绝望了,总向外边看,也不晕船了。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,提着我的小行李,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,我没有理他。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,我决心叫黄包车,就在这时候,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,我什么都忘了,高兴得跳起来了,把那个坏蛋也忘了。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。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。"

维特克:"你逃掉了。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,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。"

江青:"文化大革命期间晋东南打得一塌糊涂。有一次,我开完会后读了一个文件,总理叫我休息,在人大会堂。突然间许多人拿着地图等东西进来。郑维山和他那一伙,说现在我们有权利开枪扫荡,那时两边都有几万人。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,当时还不知道。我说,那怎么行,两边都有几万人,不考虑人民的生命财产怎么行?他们说,我们现在宣传没用,要派坦克,挖战壕。我说,我要派比你们更多的军队,但远离现场,在坦克上装扩音器。当时总参的副总参谋长也在那里。吴法宪说:啊呀,江青同志你也知道怎么打仗呀。我说:'我跟随毛主席几十年,连这点事还不知道?不能开枪。'总理支持我,半夜里总理打电话给我说,你的办法很有效。这以前榆次县开枪打起来了,但我不知道,是突然袭击,我1967年9月5日的讲话把这股风刹住了。"

维特克:"你刚才讲的情况对理解你9月5日的讲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。"

江青:"因为陈伯达的破坏,那次讲话是分好几次讲的。主席当时不在北京,在外地视察。所以他们动员了一些人层层包围中南海。"

维特克:“最好能把你的提纲给我,因为我只作了简单的记录。”

江青:“我只能大概地告诉你,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,具体日期还要核对。你应对你们的读者负责,所以你要知道年、月、日。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纠正呢,因为我要核对数字,不应该谬误流传。比如说,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,那是假的,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,那是假的。”

维特克:“我知道那是假的。”

江青:“那完全是假的,完全是王明捏造的。当时是有人反对的,项英就反对,他甚至打了个电报。他是个叛徒,那时还不知道。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,毛主席回电说,‘我学孙中山’。”

维特克:“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15年了。”

江青:“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,约30岁。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,是她要求离婚的,我不愿和你讲这个。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,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。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,非常固执,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,不关心毛主席。”

维特克:“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?”

江青:“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,她马上就要进去,毛主席不愿意。她自己的家是地主,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,当时毛主席不知道。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,我不太清楚,也不问毛主席。你书里不要写这些。”

维特克:“不写。这和革命没有关系。”

江青:“她什么工作也不做,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。这是很大矛盾。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,给老百姓,现在我们有她生

的一个女儿,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。她要求去苏联,让她去了,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,非常艰苦。她打孩子,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,把她关起来了。她本来有个男孩,毛主席很喜欢,她也丢了。毛主席说,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。"

维特克:"什么?她有个男孩?"

江青:"她把那个男孩放在一个农民家里,自己到莫斯科去了。她在莫斯科神经失常,被送到精神病院。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。"

维特克:"我知道。"

江青:"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她,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。她还活着。她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。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。他们还用'电疗'治疗。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,生活很艰苦,她感到很烦。她在莫斯科说,我是休养来的。但苏联人说,不劳而获是不行的。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的。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、李讷是我生的,他们都随我的姓。"

维特克:"杨开慧被杀害时,毛主席还有一个妹妹也同时被杀害了,是不是?"

江青:"我不清楚。总之,他有一妹妹也牺牲了,不是亲妹妹,是堂妹叫毛泽健。有个展览,看了就知道她怎么牺牲的,你也可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。"

维特克:"我愿去。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?"

江青:"是的,她随我的姓。"

维特克:"谁把她带大的?"

江青:"她母亲在苏联,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,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,然后找到这个孩子,她不愿意跟她妈

妈,愿意跟我们。她早就结婚了,现在有两个孩子,她学自然科学。李讷是你的同行,学历史。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,是我当儿子养大的,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,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,我不大清楚。他是个造反派,参加过武斗,他还没有结婚。李讷比他大半岁。"江青离开房间,过了一会儿又回到桌边。

江青:"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?哈哈,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,从前呀,我年轻的时候,可是富于感情,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。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,我可不背,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。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,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。我最喜欢上海,你们外国人说是冒险家的乐园,有点道理,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。那真是非常有味道,我还唱哩,背给你听听……"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:"我呀我的小妹妹哩,舍也舍不得离……咿呵呀嗬唉……哈哈,哈哈,哈哈哈。"

江青娇笑着说:"有意思吧,是不是?"

饭桌上的人,尤其是几个女同志,你看我我看你,大感惊愕,老陈不敢抬头看,偶尔用眼睛扫了一下江青:她可是得意非凡,脸不改色。

江青:"我一到上海呀,男朋友可多去了。喏,就是追逐我的人,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,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。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,现在又被打倒啦,哈哈,还是不说他们吧。有趣的一次,是你们美国人,是一个水兵,也许是喝醉酒了,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,向我迎面走来,他站在我面前,挡住我的路,向我敬了一个军礼:两脚一并,咔嗒一声。我回头想走开,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,双手也伸过来了,哼,想占便宜!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。他

还是笑嘻,又是咔喳一声,敬了个军礼,还说对不起呢。你们美国人,还是懂礼貌的……"

坐在桌旁的人,都瞪大了眼,真不知道她还要说出什么来。江青毫不介意,继续谈笑自若。

我心里感到十分烦躁,走到室外,仰望天空是黑沉沉的,没有星光,没有虫鸣,心中有点茫然若失。室内还传来嘻笑喧嚣之声。只好往远处再走走使自己能呼吸一点清新的空气。

饭后维特克从洗漱间走出来,一手拉住我说:"Miss 张,我对战争的事听不懂,很难懂,尤其是中国这么复杂,我感到很困难。"

"你可以提出来,请江青夫人不再谈战争了,我想她也许愿意对你谈别的,而且你的时间有限,后天就要离开中国,是不是?"

维特克:"是啊,学校要开学了,我还要讲课。"

江青吃完饭,带着维特克走进饭厅旁边的娱乐室,好大一间娱乐室!有台球桌、乒乓球桌、电视机、电影放映机等等,十分齐全。江青很有兴趣,要打乒乓球,高声叫唤:"小陆,陆秘书快来。"原来她要和年轻的陆秘书对打。她以胜利者的姿势在表演。打过一会又喊道:"小张,小张你会打乒乓球吗?来来来。"

我只好拿起拍子,连忙说打得不好。江青飞快把球开过来,我无意地把球削过去,不知怎么地,江青却失了手。我很抱歉地说:"江青同志,我第一次和你打球,我不会送球,不知道怎么……"江青:"什么?什么?你以为你能赢球吗?做梦吧,你哪是我的对手?"我开过球去,江青连续凶猛扣杀,如临大敌,把我吓出一身大汗,气喘嘘嘘。江青把球拍一扬,大声笑道:"你真不知道吗?和我练球的是第一号种子。"

5.“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”

饭后,大家又回到客厅。我悄悄走到江青身旁说:“刚才维特克女士向我表示,她听不懂战争,希望你能讲点别的,有关你自己的事。”

江青坐下,慢吞吞地对着维特克:

“我讲的战争故事,不是非常有趣吗?你不愿意听?这就是我的事呀。西北战场的战争,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。”

维特克:“江青夫人,我非常有兴趣,只要是关于你的一切,我非常愿意听,听不懂,我可以学,是不是?这是你刚才对我讲过的……”

江青:“这就对了。(指图)这个图是毛主席的行动路线图,当时中央和野战军不在一起。那是1947年,斗争很尖锐,斗争从1946年开始,到‘双十协定’撕毁后斗争更激烈了。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,我们主动撤离一些城市,留给敌人,这样敌人背上包袱,而我们的主力就有了主动权。我们集中主力,敌人不得不分散力量。我们尽可能在内线作战,也就是说在我根据地作战,诱敌深

入,然后指挥敌人到一个地方,搞个口袋叫它钻进去。现在谈起来很容易,但当时转这个弯很不容易。那时撤离张家口不容易,撤出延安也不容易。很多人不愿意,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。当然也有坏人捣乱。中央那时决定要撤到后方去,那个决定是在王家坪做的。有些好心同志动员我去向主席讲讲,留在这里多危险呀,我也很傻瓜,就去说了。毛主席说,你是胆小鬼,你就走。我很冤枉,这不是我的意思,我是坚持留下来的唯一女同志,我认为在艰苦的战争年月,应该有人照顾他,应该同甘苦共患难。开始毛主席和我带着李讷行军,李讷与你同岁,带孩子行军以示坦然。李讷当时六岁,白天还好,夜里行军孩子睡了,就不好办,软了,甚至几个人都没办法对付她,更甭说一个人了。后来我就求毛主席,带着孩子不行,后来就让她与邓颖超同志一起过去,所以李讷一直叫邓妈妈。我事先做好政治工作,她答应过河,但过去后,睡醒一觉,哭起来要回来,我就跟你讲这么多。

"撤退以前,敌人对我们做所谓战略轰炸,动员约 50 架飞机,都是美国的 B24、P52,都是轰炸机,一个人也没死,我的孩子还在防空洞唱歌。炮火已看见了,所有人都走了。当时敌人两个拳头进攻,一个兵团叫刘戡,有七八个师,另一个兵团叫董钊。两个拳头都向着延安。在宝塔山上,天已经黑了,我们能看到炮火,敌人距延安只有 15 华里。我们从飞机场穿过,还唱着军歌,你感到枯燥吗?刘戡是二十九兵团的,董钊是一兵团的,后来这两个都被我们打死了。毛主席那时有一辆吉普,第一天宿营,汽车伪装不好,车被子弹打穿,从此丢了汽车。在那个地方搞伪装很困难,敌人的飞机俯冲,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搞防御工事,他们往下看到有东西就轰炸,连续丢了三个这么大的炸弹(用手作比),一个是穿甲弹,

一个是爆破,一个是燃烧弹,都是美国人送的。我才不怕飞机哪,躺下就行了,扫射没有掩体物,危险。敌机轰炸很厉害,一次孩子找不到了,不知道哪儿去了。轰炸过去后,李讷好好地在老百姓家里玩呢。李讷与李敏的名字是对着的,'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'。"

维特克:"好名字。个性是否符合?"

江青:"不完全,李讷像你一样是学历史的。在学校是全五分的优等生,越学越蠢,所以我把她赶到乡下去,后到军队造反去了,叫她做了军报负责人,她说不愿当阿朱别依,又造反,到乡下去。林彪集团迫害她,差点没把她绑架走,绑走了另一个像李讷一样戴眼镜的。李敏也是造反派。对李敏我尽量避嫌,她是'九一六'的头头,国防科委的。去年到青岛我见了她,又是罪名,罪上加罪了,我只好都不见。"

维特克:"为什么叫犯罪,什么罪?"

江青:"他们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。王秉璋是林彪的干将。其实她没告谁的状,她讲了聂荣臻的事,我说聂荣臻同志是保护对象,是爸爸保护的人,我们都要保护。但她回去后,大家都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。李讷去军报时,说李讷夺了他的权,因为军报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阵地。"

维特克:"他们是谁?"

江青:"他们是指林彪一伙。总之这两个孩子跟随父母干革命。我说男孩子更好。我的女孩子吃醋,说我偏心,重男轻女。家里事谈多了没意思,还是谈西北战场吧。

"敌人在西北战场是23万人,我们的军队是2.5万人,包括两个纵队,八个野战军旅。纵队司令一个叫王震,一个叫张宗逊,都是一野的,一野的司令员是彭德怀。我们撤离是主动的,有计划

的。每天夜行军,很冷,冰有一尺多厚。我们是1947年3月18日下午6点开始行军的,每天有记录。19日我们住在刘家庄,吉普车中弹。3月21日到高家涧,每天夜行军,毛主席在这里组织青化砭战役。这时毛主席决定把中央分为前委、工委、后委。前委为毛主席、周总理、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(陆定一不是好人);工委负责人是刘少奇,他是个坏人,你已知道了;后委负责人是叶剑英同志。那时周恩来同志也过了黄河去安排这些机关。毛主席向西跟敌人周旋。每天夜行军,我们与敌人隔一山,叫隔山行军。中央机关代号'三支队',我是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。中央机关有四个大队。每天夜行军,十几岁的青年特别想睡觉,甚至站着都睡着了,我有匹马,小通讯员拉着马尾巴走走就睡着了。每到晚上3点就想睡,条件反射,一到3点就支持不住了。把所有革命歌曲都唱了,不让自己睡着,以免跌下马来。因为我要下了马就成了别的同志的包袱了,所以一直坚持在马上。我有高酸胃炎,行军中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,变成了低酸胃炎。这里要提一个人应该纪念她,就是斯特朗。斯特朗要求与我们一起行军,由于她年纪太大,就劝阻了。全国解放后她又回来了,这说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没有间断过的。

"3月31日到邱家坪。每小时行军有10分钟休息。休息时我看见警卫战士不仅戴国民党的帽子,还戴国民党帽徽,我非常生气,说'摘下来'。我从来没有戴过国民党的军帽,毛主席也没有戴过,我只是戴八角帽。为戴这八角帽子还大吵了一次。有一次我戴了好几天了,别人强迫我摘下,我非常生气。在延安党校别人要我取下,我大哭了一场,后来只好组织上服从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共一合作就不能戴八角帽。"

维特克:“为什么他们要你摘下这种帽子?”

江青:“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者,他们说既然国共合作了,就应该戴国民党的帽徽。他们没想到我们是共产党员,八路军、新四军不同。当时党校校长不是康生同志,而可能是罗迈,就是李维汉,他不是好人。咱们接着谈帽徽的事。战士们说他们不敢,我说国共都打起来了,内战已经爆发了,你们还不敢?我负责。大家把国民党的帽徽摘了,生气地扔了,但行军中找不到红星来代替。那时警卫部队属于正规军,中央警卫部队不到两个排。

“这以后都是和敌人隔山行军。严寒,非常冷,我们向三边走,中间休息10分钟,战士们都得踏步。我穿皮衣、皮裤、皮大衣都冷得发抖。做饭的同志拿小瓶酒给大家每人喝一口,我一喝浑身都热起来了,但不久又冷了。每天傍晚行军,拂晓宿营。

“4月5日到达青羊岔,接近三边了,这是古战场。三边有三宝:咸盐、皮子、甜甘草。

“4月9日开会,毛主席向全党发出通知,即《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》,指出蒋介石占延安和陕甘宁边区,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,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。

“《通知》号召全党全军坚决以战斗精神保卫和扩大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。这时毛主席改名李得胜,周恩来总理改名胡必成,就是一定要胜利,一定要成功。中央机关改为‘九支队’,还是四个大队,中央后大队是其中之一,我是这个大队的政治协理员。

“4月12日到王家湾,距敌人只有20华里。在这里我们住了将近两个月,直到6月7日才走。几个人挤着住两个窑洞,我和毛主席住里面,总理、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住外间。他们一开会,我

就到驴棚里。有好多虱子,别人都知道怎么抓,但我不知道。我更多时间是在做群众工作和找别的工作做,所以长虱子。那张照片说明毛主席怎么接近群众。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。在王家湾我又瘦又黄,肩上老肿,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一天做群众工作回来,毛主席说,啊呀,不得了,警卫员把炕沿揭开,发现好多臭虫,臭虫把我咬肿了,吸了好多血,后来我们把它的大本营消灭了,但不可能全消灭,因为那个地方又有了。当时在中央有斗争,即陆定一老要到河东去,任弼时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意他,但任弼时同志是个好同志。他们一直吵架,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毛主席总对我生气,我不知道怎么好,但我感到气不是对我发的,逐渐也就习惯了。在王家湾开始组织几个战役。羊马河战役全歼敌整编 135 师,俘虏旅长以下 4000 余人。5 月 4 日蟠龙大战,全歼敌整编 167 师欠一个团,俘敌正副师长以下 6700 余人,是胡宗南的嫡系,缴获白面 1.2 万多袋,军衣 4 万多套。这时毛泽东主席曾派周恩来同志,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,到蟠龙祝捷。在王家湾毛主席写了《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》,指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,蒋介石政府的强大,只是暂时表面,其进攻是能够打败的。中央直属支队从一开始行军就有两派,一派坚持相信毛主席的指示,一派认为敌人力量强大。我是这一派的头,那一派认为蒋介石地大物博,人口众多,又有帝国主义帮助,我们地区很小,尽在山沟里转。我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,马克思强调改造世界,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同样的东西,不论是棉花还是铁,是钢还是别的东西,在不同的人手里效果不同。蒋介石的人打仗没有目的,他们只是国民党的炮灰。他们虽然东西多,但到头来还得送给我们,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。虽然我们人口少,但一个顶一

个，有时一个顶十个，所以我们必胜。当时两派辩论非常激烈，在中央直属大队里，人家还是瞧不起我，这个斗争一直到河东。

“6月7日到小河，这时敌人向我们运动了，我们住了很长时间。那天下大雨，主席不进窑洞，看到每个战士都宿营以后他才进，也没有雨衣，只有我有件雨衣。6月8日这晚的行军可以描写一下。从小河向田茨湾走，都是山，下大雨，走了一整夜，脚下几十里，实际只有几里，因向导迷了路。国民党军队胆怯，他们宿营在山上点篝火。我不想给主席和他的警卫员增加负担，故意落在后头，在马上不下来。因为我下来就给别的同志增加负担。很多同志说山这么陡，多危险，同志们把我拉下来。我们怎么行军呢，我们手拉着手，排成一行，因为什么也看不见，又是风又是雨。扑通，我的头碰到一个同志背上。扑通，另一个同志的头碰在我的背上。连说话也得小声，因为敌人离我们非常近。天还不亮雨小了点，前面传口令说毛主席找我，在山边等我。行军以前我求毛主席同意了穿我的雨衣。我穿一件斗蓬，是战利品，是日本大衣，可当雨衣穿，但一着雨斗蓬越变越沉。我告诉毛主席，这可以当雨衣，你就穿我的雨衣吧，你一定要穿，否则要感冒的，我怕他感冒，他同意了，那天穿上了我的雨衣，这是我的胜利。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，拴在皮带上，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，倒水给主席喝，给我喝，再给警卫战士喝，都在一个杯子里。天亮了，休息时找破窑洞。人很少，周恩来同志笑着问我怕不怕？我说这算什么，还有200多人，还有枪，我在白区工作都是单独一人，有什么怕。9日黄昏到田茨湾，这里住一周，敌人退却了，不敢再接近我们。6月16日又回到小河。敌人到了王家湾、小河不敢前进了，刘戡住在我们住的窑洞里。”

维特克:“你们为什么又回到小河?”

江青:“因为敌人已撤退了,我们要去坚守,我们去慰问王家湾的群众,帮助他们坚壁清野,帮他们撤退。还是有些老百姓给国民党抓去了。王家湾的老百姓到小河去要我们回王家湾去。他们哭着说待我们不好,我们说怎么不好,他们说没让我们吃白面。白面是陕北最好的饭了。行军前王家湾附近老百姓到我们窑洞里都要跟着走,其实我们已安排政治部负责这项工作了。他们一定要跟我们走,因为当时群众很恐慌。有个还乡团的老头,儿子在榆林,见了敌机就鞠躬,他藏了很多粮食,后来老百姓给他上了手铐带走了。谁想到他藏了这么多粮食,过去谁也不知道他这么反动。”

维特克:“窑洞是给你们准备好的,还是房主让给你们住,部队住后房主再回来?”

江青:“他们给我们腾出来的,因为已经土改了,农民分得土地和窑洞。我们住在一个贫农家里,他有三孔窑洞。这家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,他们自己用一个窑洞,给我们两个。我们每人一块床板。我们采取了下面的措施,我们一部分向东(佯动)把敌人往东引,并有中央警卫队派出小分队到安塞打游击,这是敌人心脏。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游击队。有个后家沟,我去过。当时我们要分散,必须找住处,所以我去了,地形很有利。一个人俘虏了七个敌兵,这一定是真的。我见过这是真事,报纸登过。山沟里有个地方像地道,两个山连在一起。一个民兵干部,看到山沟里有七个敌人,都带着枪,正赶着老百姓的牛羊,他看到敌人抢老百姓的东西很生气。他很勇敢,喊缴枪不杀,然后又轻轻跳到沟的那边变个声调,喊缴枪不杀,敌人吓破了胆,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,就举手投降了。一个人俘了七个人七支枪,还缴获了许多东西。这是一个典型的

故事,可写小说。敌人很多得了关节炎,因为他们不敢睡窑洞,睡山顶上。我们一直睡窑洞,游击队也住窑洞,谁愿睡山上。

“群众不向他们,为我们保密。他们分析这个军队有几多:短枪多、马多、手电多、皮袄多,此外还有个女的。他们分析了一阵后,看到毛主席:啊,这是主席。为替我们保密,他们从那时起就称毛主席‘他’。所以毛主席的代号是他。不管你怎么说,他们不说话,就说他。群众就这样替我们保密。他们见了我什么也不问,如果谁问‘他’是谁,他们都不说。敌人打瞎子仗,因为群众不在他们一边。而我们对什么事都很清楚,因为群众在我们这边。上次有没有给你说过毛主席为什么能同时指挥两个军队?群众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条件。

“开始你认为谈军事很可怕,现在不觉得那么可怕了吧?你看我不是走过来了吗?

“我住在这儿你应保密,因为这是边界,广东省负责同志要对中央负责,我不在乎。上次我是4月份来的,一下飞机腿很不舒服。那时人不多,我就下车走走。不久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,他们喊呀,喊呀,糟了,我被发现了。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,都是中学生,他们后来走了。事后没有人传我在这里的消息。‘五一’我公开露面了,报纸也登了,这以后香港报纸才报道了这个消息。群众会保密的。

“我们在田茨湾住一个星期,那里有7户人家。我在那里做过群众工作。有一件事印象很深,有个雇工,分到30垧地,一垧是3亩,但还是个雇农,他没有牛,没有农具,什么也没有。陕北群众生活很苦,不出棉花,一年收获的粮食2/3花在穿上面。他们没有见过这种线,我们纺的,群众看见我头上扎头发的线高兴极了,因为

当地群众都用羊毛纺线,他们习惯用羊毛线。结婚的妇女梳髻,未婚的梳辫子,女的见我老摸我,摸一身虱子。陇东的妇女很漂亮,我们去过的地方的妇女都很漂亮。"

维特克:"他们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?"

江青:"都是汉族,我们没有去过少数民族地区。根据她们的习惯,妇女总爱在脸左或右边留一撮头发。我们住的那家有个姑娘叫兰兰,他们还有个女儿叫桂花,桂花的父亲是个招郎,实际上是长工,土改分给他很好的窑洞不敢住,怕老丈人。

"地主讨了许多小老婆,实际上都是奴隶,解放后每个小老婆都分得了一份地。

"6月16日从田茨湾又回到小河,一直住到8月,约一个半月。这个时期我们一野先后在陇东、三边打两个战役,这两个战役给宁夏、青海马家军(马步芳、马步青、马鸿奎)以沉重打击,收复了陕甘宁边区西部广大地区。这时全国各战场取得重大胜利。我军经一年作战,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,共歼敌正规部队97.5个师,连同部分非正规军共112万人。"

维特克:"你们对这些人怎么办了?"

江青:"多数补充到我们军队。首先进行思想教育,然后通过忆苦三查,他们不愿回去了,让他们回他们也不回,因他们的家乡还在国民党统治区,他们愿跟我们军队去解放自己的家乡。他们打仗都有个明确的目的,解放自己的家乡,推翻土豪劣绅,分土地报仇。大多数国民党的兵都是劳动人民。他们是给绑着抓走的。"

张参谋:"俘虏兵什么也不要,只要顶帽子,就参加我们部队打仗。"

江青:"边区人口很少,前方需要补充,所以俘虏经教育,一周

以后他们就上前线，打得很勇敢。那时我们军装不够，所以供不起军装，只给他们一顶帽子。我们的战士打仗时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。”

维特克：“上边提到的三马和你们行军有没有关系？”

江青：“有关系。他们非常顽固。比国民党的兵更厉害，更凶。我们把他们的后方扫荡以后他们就没法了。他们有很多骑兵，行动很快。”

维特克：“红军去过的大部分地区都得到支持，他们为什么反对红军？我记得在《红旗飘飘》里读过三马的事。书里说他们也支持红军。我不明白他们反对的基础是什么，他们是反对汉人还是由于宗教或其他的原因？”

江青：“什么都不是，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，这是个阶级关系。不是所有的回民都反对我们。三马的军队是向着蒋介石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他们是不是和国民党合作？”

江青：“他们有关系。”

维特克：“国民党给他们军事装备？”

江青：“他们不太听话，他们要独立，是杂牌军。国民党给他们一点东西。因为国民党要控制他们，所以要独立。宗教是次要问题。他们军队的头子是反动的，都是大资本家。

“《红旗飘飘》不都可靠，读时要小心，要分析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把《红旗飘飘》当参考资料。”

江青：“不行，不行。”

维特克：“当参考资料也不行？”

江青：“比如有个作者叫王超百，是国民党特务。他给《红旗飘飘》写了许多文章。有的是别人写的，他拿过来自我吹嘘，有的歪

曲历史,你必须非常小心。当然我们不是全盘否定它。我没有把《红旗飘飘》那几本书都读完,我读到中间就发现这些问题。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懂了。'胸中自有雄兵百万'的作者闫长林曾是毛主席的警卫员,我认识他。他没任何写作能力,根本不知道怎么写文章,他请了报社的人帮他写。他有的地方写得好,有的地方不真实,因为别人替他写的,如小河向田茨湾行军,明明敌人在山上宿营,但他说山底下都是敌人,其实敌人都在山上有篝火,这不真实。他对我个人报道也不正确,说我给主席做鞋,实际上我做政治工作,在争论中我是一派的头。他也知道我在那里是做群众工作的,他不提这个,而说我给主席做鞋,我从来没给主席做过鞋,这是歪曲。"

维特克:"可能他有偏见。"

江青:"他是我的部下,他对敌人估计过高了,害怕他们,否则他不会那样说。很清楚,敌人在山里,我们周围山上都是敌人,但敌人不知道我们就在山腰,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下山抓我们了。我们只有二百多人,敌人怕我们。闫长林描写的事实刚好相反。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小例子。"

维特克:"因为我们材料很少,很难区分正确和错误,所以有什么材料,就信以为真。这也可看到材料少的后果。除非有材料证明,那是错误的。"

江青:"主席在《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》一文中总结经验时说,97.5个师112万人的战果就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的基础。毛主席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决定召开前委扩大会,也叫小河会议,专门讨论和布置了全国战略反攻问题。第一年是战略防御阶段。前委实际上是中央机关这时将代号改为九支队。中央警卫团

改为三团。8月1日以后开始行军，沿着这条路走(指图)，这是急行军，一般来说每小时行军10里。这次走的路更多，8月13日经绥德没有停到延家岔，8月14日离去。15日敌占绥德。这次行军，前有7个师拦截，背后和左边也有敌人。形势看来很紧张，敌人是'赶鸭'战术，要把我们赶往河东，那年比较旱，但一开始行军又下起雨来，老不停。敌人非常残暴，所到之处，鸡犬不留。因为旱庄稼很矮，敌人放牲口去吃。我们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，帮助群众藏了很多粮食和其他东西。8月15日后还是急行军。8月17日到达白龙庙，当天中午到佳县城下，这是个有名的地方。我们坐在一片沙果林里休息，我买了沙果给主席吃。当时的敌情是，一路敌人从吴堡来，另一路从榆林、横山来，逼近米脂，是敌人的主力军。他们打算夹击一野，逼一野和中央机关渡黄河。根据张参谋的记忆，主席在那里开了会。敌人距我只有15华里，那时谁也不知我们应向哪个方向走，是从东往西还是往南。机要室一个人端一碗饭说要到河东去吃，胆小鬼。敌人离我15华里时，毛主席突然下令直插佳芦之间，中午开了个会。敌人以为我们到河东了。毛主席命令直至白龙庙。那时白龙庙一段佳毛河涨水，潮很高，但是我们的战士还是想出了办法，他们把白龙庙拆了，很快就把桥搭起来。过了河，又拆桥，敌人过不去了。全队安然渡过去了。这不是主力，是中央机关。敌人以为我们到河东去了，他们一直想赶我们去河东。8月19日到梁家岔，主席亲自到前方用电话指挥作战，部署沙家店战役。有一个电影描写这一战役，但由于作者缺乏战斗经验，所以没有描写战斗，只写了粮店和后勤工作。电影拍得不好。梁家岔是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打榆林是彭德怀的意见，毛主席勉强同意了，但打不下来。毛主席命令部分部队佯攻榆林，叫主

力悄悄退回,然后把部队布置成一个口袋,攻沙家店。国民党主力36师是军建制。我们2万多人埋伏在沙家店,仅沙家店一战,全歼整编36师(胡宗南的主力)。胡宗南的师部和123旅全军展开追击。沙家店战役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反击的开始。西北战场发生了急剧变化。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反攻的开始也就是反攻阶段的开始。8月23日到朱官寨,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,没东西吃,吃干豆角,干豆吃了胀气。日子不长,大家情绪很高。毛主席写了《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方针》,规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:'举行全国性的反攻,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,将战事引到国民党区,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。'在这里前委机关代号改为教导旅,总理兼旅长和政委。9月21日动身走了。23日到神泉堡。前委机关住这里。毛主席到佳县时,群众看到很激动,都流泪了。因为他们遭过敌人的蹂躏。8月18日到谭家坪,参观了峪口造纸厂。群众见了还是哭,仍说'他'。10月21日走南河底,游白云山。29日到吕家坪。我从佳县过河接李讷,骑马到双塔附近山西的三交。这时邓大姐也到别处开会,只有一个女保姆,还有后方机关。11月1日回神泉堡,与主席登上佳县城墙看九曲黄河,并向西看延安,对延安很留恋,但那时已要去指挥全国战斗了。我们在神泉堡住十几天,主席写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》(双十宣言)、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命令》。在双十宣言里,主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。中央直属队作了忆苦三查运动。四个大队,三个大队的领导都垮了。我们这个队,我是协理员,我们很厉害。让下面先查,最后我忆苦时,战士们都哭了。11月14日转移,从阎家峁到乌龙铺、申家岭、杨家沟。乌龙铺群众看到毛主席,一拥而上。在这里住了将近四

个月，有很重要的文章和会议。中央于12月25日——28日召开了扩大会议。毛主席在会上作了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。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口述，我记录的。这个报告是打倒蒋介石、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各方面纲领性文件。在此期间，全国各野战军先后进入新式整军运动，即忆苦三查。各解放区土改运动蓬勃发展，革命进入新高潮。为了使党的路线政策深入贯彻，毛主席在杨家沟还写了一系列光辉文献，都在四卷内。

“1948年春我党我军经过新式整党整军后，在各战场展开强大攻势，战争中心转移到蒋管区、华北地区，已把晋察冀、晋冀鲁豫、山东渤海区连成一片，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。正在这时，西北野战军攻下宜川，一野主力也打到蒋管区，打死刘戡，29军的头。这时毛主席与中央机关坚持陕北的目的已胜利完成。经中央决定，前、工、后委又合起来。3月21日离开杨家沟，到河北平山西柏坡。3月21日到吉徽店。23日经川口渡黄河，经碛口到寨则山，到双塔。3月26日到蔡家崖住了一周。4月4日到苛岚，这时又坐吉普车了。4月5日到神池。4月6日到代县。经过繁峙到伯强庄。下雪，差点过不了山。因五台山是很高的，大雪封山，如果那天不过山就要再拖到第二年化雪后才能过。就在这里主席写了《再克洛阳后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》，主要规定了我党、我军在解放城市时的政策。1948年4月11日过了五台山。上山气压太低，下车后一步也走不了了。一过山呼吸就好了。雪很深，踩下去一步还退一下。最高处不止3000公尺，过的地方有3000公尺高。毛主席身体很健康，他下连为了帮助我。4月11日经过五台山，到杨林街，浏览了五台庙。庙非常大，走不完。13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。敌人飞机又跟上来了。大轰炸有内奸用电台指挥

敌机轰炸。每个炸弹有 25 磅,5—10 个捆在一起。18 日到达花山,敌人盲目轰炸,对山上的白杨树也扔很多炸弹。毛主席在花山写两篇光辉文献。1948 年 4 月 18 日,周总理到西柏坡打前站。毛主席 5 月 27 日到达西柏坡,即今天的平山县。毛主席在西柏坡住了十个多月,写了大量光辉文献,直接组织指挥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。召开并亲自主持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,制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的基本政策。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,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纲领。1949 年 3 月 25 日毛主席离开西柏坡经保定到达北京,并在西郊机场检阅了部队。

"着重讲一下三大战役。主力决战,只给数字。辽沈:歼敌 33 个师,47.2 万余人;淮海:歼敌 5 个兵团 56 个师,55.5 万人;平津:连消灭带起义,第 39 兵团,52 万人,共歼 158 个师,154 万余人(正规军)。这时敌军 290 万,我们 300 万军队。国民党要求和谈,蒋介石下野,李宗仁上台。但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。毛主席 1949 年 4 月 20 日下令,向南方和西北进军,坚决、全部消灭蒋匪帮,提出保卫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。4 月 21 日,百万大军下江南。4 月 23 日解放南京,全面进军,风卷残云,消灭 190 万正规军,另 98 万土匪。起义的有 120 万。至此除台湾外全国解放。1949 年 10 月 1 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毛主席当选为国家主席。"

维特克:"现在感到越来越清楚。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为一个外国人服务。"

江青:"为中国人,信任你,相信你能写好书,我不信一个女同志不能写好书。"

维特克:"我原则上相信这点。"

江青:“你到联合国代表团去要求,谢伟思也介绍你来。见你以后,你给我印象是好的,你对中国人民友好,对世界革命……你不仅是个好的美国人,也是个好的知识分子。”

维特克:“这是我最大弱点。”

江青:“人是变的,但天不会塌。希望你逐渐进步,千万不能骄傲。‘谦虚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’。鲁迅讲:‘我经常解剖别人,更多的是解剖自己。’你对鲁迅看法不正确,可以举例子,反对托洛斯基。有西北战场的经验,才可以理解主席长征和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河,那是为了甩掉强敌,其中一次在贵阳,两边强敌,毛主席出其不意,中间插入。我没有长征经验,但在西北战场跟随主席,知道如何对敌调来调去。”

维特克:“也许当我整理加工这些材料后,发现问题再来请你澄清。这些不仅够一本书,而是够几本书的材料。”

江青:“你知道我不是光搞文艺的了吧!”

维特克:“任何人不会像江青同志文艺上有才能,在舞台上能表现。有革命朝气的人不会是只搞艺术的。我开始从表面,进入肉,现在进入骨头了。”

江青:“今天重头戏过去了,以后开神仙会了。今天9个小时多了,我也要睡大觉了,明天游泳后再开神仙会。”

维特克:“你把解放战争战略阶段一步步谈了,很清楚,下步你怎么谈?”

江青:“鲁迅,延安文艺座谈会。你还想了解什么,我可以重点告诉你。一生虽不长,也够曲折复杂了。你想了解的30年代都可以谈。”

维特克:“谈王明路线是很重要的。”

江青:“十次路线斗争,平均五年一次。陈独秀、李立三、瞿秋白、罗章龙(包括王明路线,但又是单独的),王明路线最严重,四年,他在莫斯科遥控,派人到根据地里全面夺权,对于这些情况你不知道怎么行?我是王明路线中期入党的人,他那货色我都遇到了。我对王明路线有深刻印象。从高岗、饶漱石、彭德怀、刘少奇到林彪,我都可以对你说得很清楚的。”

维特克:“在今晚的长征中,江青同志仍是走在前面。”

江青:“很少谈这么长的话。”

维特克好像突然惊醒了似的,赶紧跑到大桌子旁边,抢起那些地图:“这些都是送给我的吧?江青夫人,对于我这真是太宝贵了。”

江青:“是送给你的,不忙拿吧,我让人给你送去。你拿着不方便。”

维特克:“还是我自己拿走好,这些对我了解你的讲话是非常有用的。”维特克双手紧紧抱着那几卷地图,走出门外,登上了汽车。

6.“我是轮人之女”

我们回到了广东省迎宾馆，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。一天下来身体疲乏至极，但我却毫无睡意，头脑也格外清醒。这间没有空调的大房间，一阵阵闷热向全身袭来，我把两架电风扇都打开，躺在那张大的红木躺椅上。真想安静下来，但怎么也安静不了。这一天多么漫长呵，简直像是过了一年啦，其实早上才离开北京，可是好像已经历过多少事。我想要挑出一件事来认真想想，可头绪太乱，不知从何处想起。我觉得全身烦躁不安，站起来对着风扇吹着，身上还是不断冒着汗水。这时听到轻轻叩门声，住在对面的小俞和老陈轻轻推开门闪了进来，像是怕什么人瞧见似的。

小俞马上说开了：

“张大姐，我怎么觉得江青好像神经不大正常，今晚她的表现太奇怪了。”

老陈长吁口气说：

“不是说周总理只让她谈文艺吗？今晚又谈上战争了。她又根本谈不清楚。她还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斗，真有那回事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,她还指挥打仗?”

“真不知道最后如何收拾呢?维特克后天就该出境了,她要赶回去开课的。谁该管这些事呢?”老陈有点着急了。

“张大姐,你怎么不说话?你觉得今天的谈话怎样?看来还要谈好几天哩。你们来时,周总理有交代吗?”

我说:“有非常明确的交代:只谈一次,只谈文艺。我已经转告这位首长。不知为什么,她显然很不高兴。”

“维特克的机票已全部订好了,她要赶回去教课,后天一定要到香港的。”

我接着说:“我知道,也着急。但看样子走不了,你没有看见江青那架势吗?以后恐怕还有不少麻烦。”

“维特克表示过几次,她对战争甚至政治都不感兴趣,可是当着江青的面,她却不说,这人也真会顺杆爬。”

“我也觉得她过于机灵。今晚在洗手间她还说不想听战争,可是转过脸又对江青说有兴趣。随她吧。”

“有机会你提醒一下,我看谈话也太随便了,简直是内外不分。”

“我会提醒的,但很难办。我们谁都不知道她会出什么花样。还带来个参谋,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。”

“你们从北京来时,不知道这些事吗?”

我摇摇头。没忘叮嘱他们,在这里你们言行要小心点,隔墙有耳呵。

老陈、小俞默默退了出去。

我刚刚又躺到那张大躺椅上,极力想回想江青今天讲话的所有内容,江青的动作表情,想弄清楚她到底要怎样。

又传过来叩门声，进来的是翻译小沈。她一进门就嚷嚷开了：

“老张，江青谈的都是什么呀，怎么这样没有水平，连美国水兵调戏她都津津乐道。还唱小调哩。明天还要继续谈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我轻轻推推小沈，让她小声点，夜已深了，让别人听到这种谈话太危险了。我说：

“你看怎么办？行前周总理的交代你也听到了，我今天一到这里，我已全部向江青转达了。她显得很不高兴，把我带给她的《鲁迅诗选》重重地扔在躺椅上。我很难理解。”

小沈接着说：“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江青要在美国出风头，拉着维特克为她树碑立传嘛。可是她谈的话也太使人恶心了，简直是丢脸，丢中国人的脸！还乱吹牛。我看你应该给北京打长途，请示汇报一下，不能让江青这样胡说下去！太不像话了。”

“过一会儿我就打电话。应该及时让领导了解情况。但看来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，恐怕谁也管不了她。小沈，你对别的同志谈话，千万小心，万一传到江青耳朵里，对大家都不好呀。你看，明天她再乱说该怎么办？”

“哎呀，我看江青简直是疯了，什么西北战场是主席和她共同指挥的，瞎吹！许多话她都不该说的。老张，我明天少给她翻一些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想可以，有些少翻，甚至不翻。反正江青又听不懂，那位女士的中文水平又不怎么样。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部分对外影响。”

小沈鼓着嘴，有些顾虑：“另外几个人都懂英文，你知道她们怎么想呀。你没有注意？今天晚饭后，江青和维特克散步时，有意走到前边去，把你们全撇在后边，维特克鬼得很，她说我们这些人，像

克格勃跟踪盯梢的,真可恶!"

"少翻或不翻我看问题不大。反正江青听不懂,其他几个同志明天我们分头谈,看看大家反应如何。老陈、小俞刚才也找过我,她们对江青的谈话也很反感。"

小沈走了以后,我一夜没有合眼,江青这一天的所作所为太出人意外。她为了自己出风头,扬名世界,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向北京打电话,听听上边领导的意见才好。

好容易挨到上午 10 点,我给北京外交部打长途电话找到王副部长,向她详细汇报了昨天的情况,主要是谈话内容,并请示她如何处理。王副部长说她一定转达上级,但却没有办法让江青不说,她在北京也很难让维特克按时离境。

刚过 11 点,头天在机场上把我接走的那位警卫战士又来了,说是首长要立刻传见。当时我把礼宾司唐处长拉上,多一个人好帮着说话,并商量好一定要维特克如期去香港。

这次我们被带到另一个地方,据说是江青在这个城市的长住之处。进大门过了一座桥,向左拐沿着长满荷花的湖边绕过去,到达一处清静幽雅的所在,进了一所大园子。这儿有不少大树遮荫,在盛夏也有一股清凉之气。高大的白兰树长满小小的花朵,飘溢出满院花香。还有桂圆树、荔枝树。大院中有数座小楼,但却不见有人进出。我们穿过这所院子,过了一条小溪又进入一个圆形门。这里忽然见阳光灿烂。院子也很大,但只有一幢洋房在树丛中。这里种满各种花草。南国花城,四季如春。许多花我都不知其名。还有一股小泉水,过小桥有一座小亭。米兰、茉莉、白兰、玫瑰盛开,一阵阵清风扑来,我忍不住深深呼吸,多么美丽的所在。我忽然想起就在 1971 年美国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国,住在钓鱼

台宾馆，那里的花圃种满了玉米和菠菜。为了要让外宾看不到“文革”中那些荒唐的痕迹，我曾在全北京城四处奔跑，各公园也跑到了，却找不到一盆像样的花。那时说，种花花草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，所以只能种果树种庄稼。最后是在天坛公园的一位老花工家里，借去几盆菊花来点缀……举目再看看这所院子，恍如隔世，真像是来到桃花源中。我们走近的那幢洋房，也非常别致，四周都镶满了落地大玻璃窗，有一半却挂着紫红色的围幔。我们随着那位战士，轻轻推开门，又是宽阔的走廊，一直走到尽头，到达一间房子的门前。战士喊了声报告，把门打开，只让我一个人进去，把唐处长留门外了。我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大房子，中间摆着一个极大的鸟笼，像是从动物园搬来似的，足有十几立方米高大，鸟笼中还有一棵大树，鸟笼里饲养着各种小鸟，颜色鲜艳美丽，声音美妙好听，都被关在笼里飞来飞去。江青正在笑嘻嘻喂鸟儿玩。这间房只有一张大而舒适的沙发，无疑是预备给首长休息时用。我静静站在鸟笼边看，真是连做梦都难以想象有这样的奇观。全国都在乱哄哄，多少家庭被弄得妻离子散，多少无辜百姓在受罪，多少老革命干部在蒙受不白之冤，关进监狱。这里不是另外一个世界吗？真是奇迹呵！……

“维特克女士对于昨晚的谈话有什么反应吗？她的情绪如何？”

江青的尖声使我惊醒过来。

“昨晚在汽车上，她又表示对战争听不大懂，想听你私人的故事。”

江青：“我当然会给她讲的，忙什么，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。你应该告诉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指挥了战争。”

“明天,最迟后天维特克女士必须到香港,她的机票已订好,假期也满了。今天是否让她在广州附近参观一下,比如去佛山看看美术陶瓷,还有祖庙,这也是旅游点。下午4点以前可以回来,你还可以再谈或者回答她的提问。”

江青:“你说什么?去佛山参观,那么远下午能赶回来?我去过,走一趟得8个小时。”

“如果坐小汽车最多两小时可以往返的,下午准能赶回来。我可以陪她去。”

江青的声音突然提高了8度,近乎吼叫:

“你以为我没有去过吗?我说8小时就是8小时,你敢顶撞我?!”

我睁大眼看着江青,也吓一大跳。江青这样不讲理,真是万万没有想到。我不明白江青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。我倒心平气和地又慢慢说:“是三四十分钟的路程。佛山是近郊,我们都是去过的。不信你可以问问大牛。”

我说话时,那位健壮的大个子随卫人员大牛就站在江青身旁。大牛是山东大汉,为人十分耿直,我们见过几次。他对江青可说忠心耿耿,不离左右的。

“报告首长,老张同志说得对,最多需要40分钟。”

“好呀,你们今天都是怎么啦?围攻我呀?胆子不小呵,你要知道,围攻我的都没有好下场!”

江青向前走了两步,直逼到我面前,手指就要戳到我的鼻尖,右手叉着腰,来势汹汹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架势这样骂人的。我突然冒上一股厌恶的情绪,反倒平静了,又轻轻地说:“江青同志,这间房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你说话,怎能说得上是围攻呢?大牛同

志是你的卫士长,他和我们的工作,从来没有关系。”

三人沉默了好长一阵子,其实不过几秒钟。

江青立刻把唐处长传进来,吩咐说:

“维特克女士的飞机票一定要改期,有什么损失完全由我方负担,如果误了她讲课,损失也由我方负担。”

礼宾官平常训练有素,文质彬彬地、心平气和地婉转向江青陈述,这种事情很不好办,要涉及许多方面的关系。江青好像没有听见。

“把维特克女士的行期推迟6天,立刻给我去办。”

回到宾馆,我关在自己的房间里,午饭也懒得吃。很想集中精神,回想和分析一下刚刚发生的那一幕。许多疑问涌上心头,江青怎么就变成这种样子呢?凶暴蛮横,近乎没有理性,白的可以说成黑,毫无顾忌,唯我独尊。哪里还有一点点革命者的气味,简直是泼妇、疯子呵。又想到昨日她对周总理的那种态度,这不是偶然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已开始6年了,听到过不少关于江青的事:她说一句话可以置人于死地,可以抓进监狱。阿甲就因为她一句话就被关了好几年。孙维世也是被她害死的……另外呢,如果肯听命于她,也可以飞黄腾达。这些天看到她的行为,叫人如何能得到一点点平静?

江青的欲望是无尽的,长久以来,她的权力欲一直在心里燃烧着,只是等待时机。当有一天,她的权力达到一定高度时,就会不顾一切去掠夺并占有更多更多的东西,于是变得疯狂,有时甚至失去理性。这真是人性中恶性膨胀的一种悲哀呀!

那样想着想着,我感到一丝丝悲伤,人呵人,社会造成的劣根性是难以消除的。同时我的心也平静些了,我清楚知道自己已面

对一场险境。但人是有良心的——也许就是党性吧。我的理智告诉我,应该如何来处理将要到来的一切。

维特克到广州的第2天,亦即26日,下午6点40分至27日凌晨4点,及27日下午,江青与维特克继续又谈了将近20小时,因为其中东拉西扯、吃饭闲谈也占了不少时间。而且江青讲话信口开河,毫无逻辑性。为了保持真实,我尽量不改、不删节。

江青:"今天怎么开始?"

维特克:"应该由江青同志来决定。"

江青:"记录的事你可以不必发愁了,我都给你办好。"

维特克:"我看到送给我的第一次谈话记录,搞得很好,非常满意。我今天少记一点。"

江青:"今天从出身谈起,其他什么30年代,延安都可以谈。

"我1914年出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。3月生的。哪一天不告诉,保密,怕人祝寿。我的母亲生了好几个小孩,但活下来的就一个哥哥、姐姐和我。另一个哥哥是另一个母亲生的。因为父亲打他,就闯关东去了。大哥也因为这个原因,去当兵去了。那是北洋军阀张宗昌的时候。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,那时我没有出生。到我三四岁时破产,房子也被人弄走。我家房子那地方很热闹。父亲比母亲大十几岁,我父亲60岁,母亲约40岁生我。父亲脾气很暴躁,这和他的经历有关。他做车轮,我是轮人之女。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,每天骂人打母亲,打我们。有一个元宵节有灯,我们那个城地主老财很多,灯也多,开始还看灯,后来因为父亲用铁叉打了母亲,把母亲小手指打断了,母亲背着我跑了。从此我学会走夜路。吃不饱,去找母亲。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为保护母亲,把牙摔碎了。另一件事是母亲在一家非常大的地

主家扛活，我没有东西吃，地主老财讨了好多小老婆，还是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听说佣人有个小女儿，要与我玩，我不去，但为了母亲还是去了。地主女儿有好多佣人服侍她。最初同我玩得顶好，我有两个小辫子，她抓住我的辫子，我推开她，拔腿就跑。当然我母亲被解雇了。那天母亲把我带到一个破落地主家里，有点亲戚关系。在炕上没吃东西，下着雨，母亲出去了。我靠在炕上等母亲，一动也不动。点一个小小油灯，等到后来睡着了，快天亮时，雨停了，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，就抱着我哭了。窗纸都破了，很凄凉。母亲给我个饸子，我咬了一口留给她，她也舍不得吃，留下来。

“现在说我在小学。我在县立女子小学，为地主老财女儿开的，像我这样的人很少，收我进去是装样子的。她们都耻笑我，说我穿的是旧衣服，破破烂烂。有一天比我大得多的姑侄二人耻笑我，我把那个姑姑当胸打了一拳，她就坐地上哭了。我立刻到校长屋里去，我告诉校长，不读书了，我打了人。校长替我擦眼泪说没事。因为我是勤学的学生，老师喜欢我。经过这样的事以后，我在学校不受气了，不敢惹我了。

“我不是告诉你，我从小有胃病吗？一是穷苦，二是走夜路找母亲，人们怕鬼，我怕狼，因为鬼没有见过，但狼会吃我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到处找母亲，找不见，我穿过青纱帐，狗咬了我的腿。我们那村都姓李。我母亲听到狗叫，想到我会找她，所以跑出来了，不然那次又要被咬。她把我背起来，一边走一边哭，到一个本家那里，给我吃煎饼，我吐了好长时间。还有一次也病得很厉害，学校在城里，我家住在内外城之间。天亮时城门开一点，傍晚时就锁上。有一次放学回家，低头走路，突然听见人声，抬头一看，一个老汉用扁担挑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。你知道，中国有悠久的历史

文化,有时也真够野蛮,如杀人把头放在城楼上示众。每次我遇到叫做清狱,都是杀无辜的。血淋淋的人头,回家把书包一丢,躺在炕上就没起来,发高烧。我的童年讲这么一点就行了。"

当时所有在坐的人,都不了解江青的身世,更没有听她自己讲过她的童年经历,这晚都饶有趣味地静听着。老陈和小俞坐在靠后边,正轻轻地说着什么,我回头望她们,老陈凑到我耳朵边说:"你听明白了吗?我都没法记录,没头没尾,一点线索都不清楚……"

这时江青回过头来瞪了她们一眼。

江青:"可能是1927年离家乡。北伐时我在天津。我母亲在姐姐家里,实质上是佣人。我很想去做女工,因天津有许多卷烟厂,那时纸烟用手卷,而且大都是童工做,但姐夫不赞成。姐夫是个小官僚,那时已经失业了,也穷了。后来与姐姐姐夫一起到济南。1929年念了一年艺术学校,也被人瞧不起,文化水平低,穷,衣服穿得破旧。这些你可能有兴趣吧。

"我们班三个女同学,我最小,学校设在孔夫子庙里,放学后到大殿去乘凉。大殿中间有一个很高的孔夫子塑像,戴一顶很大的帽子,前后有珠子做的帘子,两旁有七十二贤人,都是他的弟子。有一天晚上很热,我从大殿搬出来乘凉,那两个女同学求我帮她们拿椅子,因为她们害怕。我说我给你们打灯,你们进去吧。我给打开门,她们进去后,我把门突然关上,她们吓得不得了,我跑了。后来是男同学把她们救出来,她们提着马灯找我,找不到,我自己已跑回去躲在帐子里睡觉……好玩吧?

"这两个人,一个是教务主任的妹妹,一个是教务主任的老婆老朋友的妹妹。我在这里是很受气,演话剧要用普通话,我又是山

东话又是普通话，一开口她们就笑我，后来我就不说话，找一个对我好的同学，天不亮就起来朗诵。有一次实验演出，剧名叫《溯上悲剧》，是资产阶级的，田汉写的。教务主任让他老婆的妹妹排在星期六，星期天给朋友的妹妹，我演出是星期一，观众很少，我自己哭了，观众也哭了。那时是自然主义者。到化妆室下妆，校长来了，他站在门口叫我的名字，说我是很有希望的，能演悲剧。我那一肚子气变成眼泪，从另一个门走了。这就是我在艺术学校的情况，到处受气。

“我还要说说在青岛。可能是1931年到青岛的，很冷，潮湿。一到那里就注册旁听生。是我老师要我去的，将来要成立戏剧系，给我借了路费。我原不想去，想回家做女工。想得很容易，后来同学和朋友劝我去。我生长在海边的县，但到青岛第一次见到海，高兴得跳起来了。我们成立了海漠剧社，专门宣传抗日救国，在学校在工厂。最大一次旅行公演是1933年旧历年，利用农闲。为怕抓，就分头走，省吃俭用，我没有吃饭。到了第一个村，叫崂山湾，离青岛几里路。我们没有经验，敲一面锣叫人看戏，有的男的穿西装，也有的穿马褂，女的穿旗袍，反正老百姓看了不顺眼就是了。演完戏已是下午一两点，我们想买吃的，村里人派人拿了一块大洋给我们，说村子小，不卖饭，让我们走。到村外，我们坐下了。有些人出身是小姐、少爷的就不想干了。我说我们做的恐怕不对吧，得变个方法，我还不懂得用总结经验这个词。我建议到前一站王各庄先住店，说是游崂山的，先做群众工作再说，大家同意。到了王各庄先住店，我们展开群众工作，我做小孩的工作，教他们唱歌。因为日本鬼子到过那里，问日本鬼子好不好，要不要反对日本鬼子。他们喜欢我，就往家里拉。其他的人也去找我要我唱戏。唱

了一段,他们也高兴了。第二天为我们拉场子演戏。演的节目中有一个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还有一份讲演稿,说苏区的情况。观众中有沈鸿烈的海军,说我们演得好。我赶快跑到村外,把剧本藏在坟碑下面。要约我们去驻地,大家不敢去,我说我去,共去四个人。他们说国共合作如何好,他们还送我们回旅馆,又送吃的。原来这是上海暴动后跑来的沈鸿烈的海军,其中有共产党员,还有党支部。沈鸿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,后来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我们在这村住几天,走时群众都来欢送。我们到别的村子,没钱,饿着肚子到处跑。公共汽车在山口。都跑了,受不了,最后坚持的只有两三个人。知识分子下乡困难。挤上车子要票,说没有钱,车到青岛还给你,不干,旅客讲情,说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。下车到处找朋友还钱。这事印象很深,我一直忘不了。

"在青岛,主要听闻一多的课,也选读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。那时杨振声校长是中国第一本小说《玉君》的作者。还有女讲师,叫方令儒,都是美国留学生。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。当时老师称赞我,说我像谢冰心。还有个教员是男的。作家沈从文很欣赏我,要我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。最主要的写了个剧本,可能是1931年的下半年,标题是《谁的罪》,母亲生病,儿子是革命者躲出去,警察来抓,折磨母亲,儿子又回来看母亲,被捕,母亲死了。我老师赵太侔兼这课,叫我去。说你很爱写,你写的这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?我说什么叫共产党、国民党?他看我是个大傻瓜,就不解释了。老师认为我的剧本还是不错的,说独幕剧太短了,最好发展成三幕。从此我想,什么叫国民党、共产党?开始观察了。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,当时不知道。'九·一八'以后,我去请愿,他说我捣乱。他到树林,猜他一定是国民党。他是少数民族,他自己没读好

多书,我以后不受他接济了,自己找事做。他说李小姐,你写的强盗太斯文了,他骂人的时候你用的是'该死',其实强盗是不会这样骂人的。从此我不去听他的课。

"沈从文通过他妹妹沈舟舟找我,要我每周写一篇故事,他给我改。我就不去。他们知道我家里穷,想让我给他织毛衣,给较高工资,我拒绝了。我听说她在北京法国学校读书,学费很贵,每学期500大洋……"

我坐在旁边,真是越听越糊涂。她在青岛一会儿是女师附小,一会又是艺校,老师怎样都扯在一起了?开始听来是,但是过后再一琢磨,江青说家史也好,学历也好,都经过一番思考的。她描写一些具体细节虽并不动人,但可以让维特克从其中了解她的性格特点,她从小就培养出自己的革命性,至于拉到许多名人名作家,当然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,说明自己从来就不是个无名小辈。江青自己编织的故事并不美妙,却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,很难听得出头绪的。难怪老陈她们说没法儿记。

7.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

这一天谈话已换了地方。这里是一所较新的庞大建筑物，坐落在大院子里，大院四周种满米兰树、白兰树，栏栅是茉莉花，这些花夏天开得特别茂盛，随手可以采摘。当我们走进大楼时，一看屋顶好高，四周又是北方少见的落地大玻璃窗，除了门口放着四张椅子，是警卫人员休息的地方外，整个大厅，空荡荡的。忽然从左侧走出来一个身穿西式服装的女服务人员，她领着我们，走过长廊上到二层楼。又过了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大会客室，沙发摆在大厅一边。这间大厅四窗紧闭，室外的热气、热浪被完全隔绝了，使人有舒适感。

这会儿吃过晚饭，江青带着维特克及其他人，慢慢走着又转了几道廊子，来到另一间大房间。江青正要进入，参谋已经带着维特克先进去，宾主在沙发那边坐下。江青突然一声叫："小张，你今天给北京打长途电话了？谁让你打的？"

"这是规矩，我们随外宾去外地，是要每天向北京汇报情况的。"我回答。

“我的事不用汇报，向北京打长途是我的事，不用你管。以后不要再打了。”

转过身，江青走近维特克，立刻换了声调，微笑对着维特克：“这里空气新鲜，又凉快。我要生活在20℃至22℃的恒温中，这才不感冒，我不喜欢空调的冷气，所以需要常常换房子。我未来之前，这间客厅的空气和温度已经调换好了。”

江青对着维特克说的，又像自言自语。小沈正在左顾右盼，像是没有听见江青的话，也不翻译。她心里是对江青这种卖弄享受很反感。江青瞪了小沈一眼，也没好说她什么。

宾主相对坐下，江青又讲开了：

“现在说上海。到上海的第一夜，住朋友家，在一个剧社可能与苏联有关，上演《怒吼罢，中国！》，是进步的，苏联刚与我们建交。朋友请我去先施公司吃夜宵，有两件事印象很深。我是以群众组织的关系到上海去找党的关系，通过田汉找党。我知道有个‘春秋剧社’是左翼的。田汉住哪里不知道，只能通过社会关系，这是冒生命危险。头天晚上在先施公司吃夜宵，听下边吵吵嚷嚷，往下看好像有人打架，朋友说别看了，是野鸡拉客人。第二件是他们要我参加演出《怒吼罢，中国！》演一个角色，我不能不答应。每天找春秋剧社，我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，也听不懂，但很快找到春秋剧社。我到那里就说是北方来的戏剧工作者，要找田汉，把党的关系藏起来了，但这样也有被捕的危险。田汉有两个弟弟老三和老五。老三来了，这是很不好的人，但他带我去见了田汉。带到他母亲的家，什么路不记得。田汉叫我哪也别去了，就住在他家，要弄清问题。因他们认识我在青岛的一个同志，我说了这个人的名字，他们就信任我了。过了几天，田汉、周扬、阳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谈话，他

们说青岛现在中央知道了,要我放下关系,党的关系可以接上。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,当时有两个电影公司靠拢我们,还有剧社,问我上不上舞台,甚至问上不上银幕,我拒绝了。我要求做群众工作,基层工作。这样他们同意,叫我到北新'晨更工学团'。那里很荒凉,陶行知在大场办'山海工学团',他是很有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。重庆时他的地位与闻一多一样。大场很大,'晨更'与陶有关系。我们募捐,有时找陶。他对我很好,陶也是留美学生,学杜威的。他原叫陶知行后改行知。他在南京办晓庄师范是很有名的,他提倡思想自由。在他那里学习的有一批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,被捕时排队唱着《国际歌》被杀头,是很壮烈的。陶很爱护青年,我是被爱护者之一。'晨更工学团'是义务学校,主要教工农子弟,还办店员补习班。我去时,田汉派他的弟弟老五与我同去,他忽然间对我起好感,不顾那样的环境,老在屁股后追着,弄得大家都议论纷纷。田汉有个名字叫老大,这不完全因他是第一个孩子。而是上海流氓,龙头老大,码头二哥,插花三爷……直到老九,当时不知道。我冒险写了封信给田汉,请他把弟弟调走吧,我不能工作了,你是官僚主义。谁敢批评他呀,从此我倒了霉了,他弟弟是调走了,我的党的关系不给解决了。因我的关系都在他们那里。晚上我在街上走,很危险。碰上廖沫沙,他的妻子是我们一个老同志的女儿,他们住在小亭子间,有个小桌子,叫我睡在小桌子上。他诉苦,说风声紧了,有人要逮捕田汉,田汉已经搬家了,但他没有钱搬不了。我第二天清早就到大夏大学去。我到上海前一年那曾经是我党堡垒,但王明路线左得那样厉害,举着红旗去示威,大批学生被捕,并不都是党员,但党员都给搞掉了。1933 年夏秋之交,夏天去的,后来据说国民党特务在那里有几十,都有手枪。我去找一个

同乡女同学，她对我很好。我问她：我想向你借一点钱。她问：多少？我说20元。她说刚交了学费。但看我很为难，说还有饭费、零用费，借给20元。我回到廖沫沙那里，给他要他赶快搬家，但钱一定要还我，因为我是借的。结果从此以后，既未见他们，一个钱也未见，我怎么还钱呢？到中学兼课，教国语。一个钟头多少钱记不清了，除了车费都攒下来，我还了，我赌咒再不见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人。我在群众中定会找到党，党也会找我的。当时上海有文总、左翼作家联盟、社会主义文学会联盟、青年团左翼教联，都找了。我什么都做，凡是革命工作都做。

“红军北上抗日，募捐。1932年十九路军打了一仗，群众知道要抗日，不知道红军。五一、五四、五七、五九、五卅都要上街示威，飞行集会，飞脑袋去。1934年什么节日，可能纪念‘九一八’，这时我有党的关系了，党找了我，去示威，要我担任沪西区的指挥，临时交给我一队不认识的女工，尽管她们有的衣服比我穿得还好，但我这样子一看就不是女工。这儿演《婴儿杀害》，为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募捐。普通票卖二三毛，有的票五元十元，陶行知就买了好多五元十元的票，帮我的。剧目是《婴儿杀害》，还有《锁着的箱子》，演完从后门走了。去看示威路线，空着肚子，想到左翼的人平常去的白俄餐馆吃罗宋汤，想碰见熟人或向老头赊账。一进饭馆他们没有走，叫女主角的名字，把我抛起来，高兴地说你没被捕呀，告诉我前台要拉幕抓人了。陶行知请了二十几个教授去看戏，出来讲了话，他是名人。那天吃得最好了，谁都给我吃。

“第二天示威到泥城桥，带着的女工都跑了，后碰到公开关系，说是改到爱文义路去了，我赶快跑去，还是没有。我绕圈子最后在一个角上找到几十人。有个小孩，那是我学校的，包了个包袱里面

是传单和红旗，警察打散了，我装着看时装不走，等他跑了才走。有个刚从牢里出来的同志老王，同我一起从泥城桥到爱文义路。他说他被盯梢了，他让我先走，敌人认识他。我在上海不公开，是下层干部，既不是中央的又不是江苏省委的。先干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叫辆黄包车兜个圈回学校。回去后大家正在争吵，党是'左'的很厉害，共青团比党还'左'，后来才知道特务掌握了团的领导，他们提出'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'，宁左勿右。说你很勇敢，没有逃跑，我们再去搞飞行集会。我说不去了。讨论讨论两派意见。我们那地区很大，很好掩扩，相持不下，争论好几天。收到一封信，是斜的字条，说他在周家桥被疯狗咬了，住医院。说什么鸟身体不好，应立即住医院。教联的党团，坚决要我走，共青团只同意学校搬家，学校怎么搬呢？我认为教联意见正确，就走了，到北京。但北京的白色恐怖很严重，很难开展工作。我在北大旁听不要钱。李达讲政治经济学，满堂的听众。那时一个月花七元钱。北京图书馆是全国最著名的，我从朋友那里搞了借书证，带烧饼进去，一整天不出来。有几个月学会了脚踏车，尽闯祸。有一天我和赵丹、崔嵬一起骑车，赵丹在前，崔嵬在后，来了个流氓把我逼下车来，崔嵬、赵丹把他揍了一顿。后来教联党团调我，又回到上海。女青年会办很多女工夜校，当时都在我们手上。男青年会最反动。叫我到沪西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做教员，接上了党的关系，我能与学生同吃、同住，但不能同劳动，但有一个任务，也适合做党的工作，即做工人家庭访问。这时参观过一些中小工厂，大工厂进不去，因警戒森严。我的学生多数是内外棉的，纱厂、袜厂的，少数是烟厂的女工，过地狱般的生活。纱厂女工最高的每月收入十七八元，一般的十二三元，童工没有什么钱。怕工人偷懒，卫生间搞大马桶，

进去就恶心。6点上工,4点就得起床,走很远的路。我住亭子间,她们住后楼,前楼是课堂,因我睡觉不好,改卷子。袜厂的女工更惨,最高工资12元,断一根针罚1元。我有一个最喜欢的学生叫季月娥,一个月断8根针,大家就帮她。包身工更惨。工头到农村骗农民,烟厂有一排凳子,谁占了位子,就有可能当工人。有个黄包车夫的女儿去得最早,占了个位子,但工头介绍一个女孩来,把黄包车夫女儿的头发揪起来,一脚把那个女孩推到楼下,小孩就死了。这些工人很容易接受革命。"

那时我坐在旁边,全神贯注想听听江青的"革命斗争史"到底是怎样的,但几个小时过去了,还是云遮雾障、东拉西扯,怎么也听不明白。后来江青要整理记录,我又曾经再三阅读,始终理不出个头绪来。天知道维特克有多大本事能写出一本江青传来。

江青:"有一天我到上海兆丰公园给一个人送信。这是横的关系,不应该再联系了。他送我一本左翼刊物叫《世界知识》,他约我去愚园路吃饭我没有去。走的越界中路。外国人治外法权。兆丰公园附近都是别墅区,我赶快走着。黄昏了,听到后面有人骂,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,后面的人骂他,这时我被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,离开这条路,到一个派出所,没女看守,不搜身,只把《世界知识》拿走。天黑了,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。当时我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,罩蓝褂子,穿毛背心,秘密表格在衣角上,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,我大声喊救命,一个人也没有,警察回来了,那时国民党抓人抓疯了。赶快弄到野地里走,一个人叫我快走,另一个出来说好话,一装红脸,一装白脸。前面有水田,装着跌倒,把口袋的东西吃进去,这就什么东西也没有了。到区的警察局,关进栏栅里,两个特务打电话,听他们说抓到嫌疑犯,要黑牌汽车。当时明白不是因

直接关系，而是因那朋友而被捕。于是准备口供了。王明已是叛徒，我们有证据。我大哭大闹，把我关到市局，我说我是到兆丰公园看小孩玩的。那时特务捉一个人多少钱，监狱有人满之患，他们说我的朋友是共产党。我学一个同志的经验，装不认识字，我也装傻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装落后，什么都不懂，政治犯唱革命歌曲，我唱京戏。他们去女青年会调查，没有证据，本来一周就要放我，但有一个女叛徒，说我是装傻。当时有个著名的叛徒叫黑大汉，江苏省委的，两小时就叛变了，假装去欺骗这个女同志，暗号什么都是对的，叫她把秘密文件弄走，这里是租界，她的车突然离租界，到了南市，她就被捉到局里，原先还坚决，后来上了酷刑。黑大汉出卖了自己的妻子，后来叛变写了自首书。

“有一天几个学生来给我送东西，我以为是因为我的原因把他们抓到这里的。我就大闹，说他们捉不到真正的共产党，只能抓我们这样的女孩子，给我送东西的也被抓，我坐班房不名誉了，要失业了，你们索性枪毙我吧。这时一个大巴掌打过来，是黑大汉。他骂道，你这个小妮子喊什么，我认得你……

“后来女青年会来帮忙，陶行知组织了一大批教授来保我出狱……

“哎呀，总之那斗争是残酷剧烈，以后我又到了北京……

“1935年春夏之交，教联又去信要我到上海。因为剧联点名要人演《那拉》。我不喜欢剧联，但可以找党。剧联的人瞧不起我。我夜里不睡觉下功夫读剧本。我住的亭子间下面是裁缝，他夜里干活，我就读剧本。我一举成名之后，他们都对我巴结起来了。

“鲁迅在《申报》自由谈里称赞我，我没有见过他。他是看了我的戏。我演了《那拉》、《钦差大臣》、《大雷雨》，其实我不想当明星，

一举成名,电影老板都来找我订合同。但四条汉子,就是周扬、田汉、夏衍、阳翰笙搞分裂,想搞死我。你知道,中国有个女明星叫阮玲玉,和美国的嘉宝一样。但阮玲玉被迫自杀了。他们想逼我当阮玲玉第二。"

维特克打断了江青的话:"江青夫人,你和鲁迅先生有联系的,是否可以多讲点,这是外国所有人都想知道的事。"

江青:"'四条汉子'提出国防文学,这是典型的汉奸文学。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。这就是两个口号之争。于是他们围剿鲁迅。在上海,我也是当事人,被围剿的……

"30年代在上海,我是第一流的演员,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。我做革命工作,地下党,领导工人运动。最主要是领导文艺运动。那时候鲁迅是革命文艺的旗手。我想你一定读过鲁迅的著作吧,了不起呵,鲁迅对我是很赏识的,不仅对我的戏,对我的文章,对我这个人。鲁迅说我是个真正革命的女性……

"唉,真惨啦,在那个时代,鲁迅贫病交迫,他生了肺病,国民党迫害他,还有内部斗争,就是'四条汉子'围攻他。文化大革命通通被打倒!他们围攻鲁迅,也围攻我。

"1936年鲁迅病逝了,我们组织了上万人的大游行,也就是送葬的行列,我们绕着人多的大马路走,我扛着大旗,走在最前面。一排人手挽着手,昂着头,你想想看,那有多么神气。我一点都不怕国民党特务,走在最前面……"

江青越说越神气。但又一时接不上话茬了,忽然嘻嘻一笑:

"我想起来了,给你带来一些照片,当然不是我童年的了,青年时代的,也有我革命生活各方面的。唔,还有我自己拍摄的艺术作品。我是个业余摄影家,这里有我的摄影室、暗房,我什么都是自

己来做的,这就是陶醉在艺术之中啊,是非常有意思的……"

维特克:"我也拍照,但拍不好,我向你学习,江青夫人。"

江青从她身旁的茶几上拿起个厚纸夹,翻看着对维特克说:

"你看,这是土改时期的,我还牵着牛在耕地哩。这是在延安窑洞前边,窑洞里面的也有,这是西北战场,如果你的书上需要,我可以复制,都送给你,这是很珍贵的资料。而这两张是我的作品:这一张是庐山仙人洞,你一定读过毛主席写的庐山仙人洞的诗吧:

暮色苍茫看劲松,
乱云飞渡仍从容。
……

这是毛主席专门为我写的,许多人都知道。这另一张呢,是庐山风景。这首诗是我自己题写的:

江上有奇峰,
锁在云雾中。
寻常看不见,
偶尔露峥嵘。"

江青摇首朗诵,接着说:"我亲自拍的风景,亲自给你写上自己的诗。你看有意思吧,是不是?哈哈哈,小沈你给她翻译呀。"

突然,她声调一变,恶狠狠地斥责道:"小沈,我总觉得奇怪,我说了许多,你怎么翻出几句就完了呢?是不是偷懒?"

"英文译出来要简洁得多,首长。"

小沈毫不在意地回答。

清晨4点钟了,谈话结束。又过了多么漫长的一天呵!人人

显得疲劳不堪。大家的心里还充满了愤慨。

大家回到宾馆,走进我那间大套间,各自找个舒适的椅子坐下。这两天已成习惯,互相之间有了信任和了解,回来都聚在一起。宾馆还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些点心什么的作为夜餐。他们知道,我们总是半夜才回来。

小沈躺在那硬木大沙发上,一下跳了下来,她总是毫无顾忌的:"你们诸位听明白江青的历史了吗?她怎么连自己的父母家庭都说不清楚呢?老说走夜路找母亲,这是什么意思?还说我翻译少了。怎么给她翻译?为什么老走夜路呢?奇怪!"

小俞也接着说听不明白:"她的童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呀。"

老陈往常是比较谨慎的,这一次也忍不住发表一通议论:"谈自己的历史,怎么一点条理都没有?看来她是有准备的呀。在上海又是地下党,又是飞行集会,又领导工人运动,还是第一流大明星。我听了半天一点也弄不清楚。维特克能听懂了?能根据这些就给她写传?还说要将记录送给人家。我在旁边就没法记。"

小沈又插话:"我看呀,简直就是东拉西扯。只有一点是清楚的,自我吹嘘,牛皮都已经吹破了。她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?谁知道?以后还有两三天哩,老张,你知道她还要讲什么?看见了吧,她对我的翻译已经不信任了。明天你来吧,徐同志(这是外交部另一个翻译)。"

徐说:"我?还不跟你一样?她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话,谁也很难翻出来。"

小沈:"这真叫没辙。她的讲话向谁请示过了?她胡说八道,还指挥了西北战场,谁替她负责?"她越说越气,我只好劝阻。

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弥补,至于责任,只能由她自己负责。

七嘴八舌之间，她们感到彼此的心贴近了，几天相处互相也都了解，说着天已大亮了。

老陈最后出门，对我说："江青那首诗，你记得吗？我可是记了。留给你看看。"她从记录本扯下一页，交给我。

我走进卧室，尽管全身疲乏得像散了架，仍然毫无睡意。这几天已处于完全失眠状态。拿着老陈交给我的纸条，看见江青自己写的那首诗。这首诗是江青思想深处的自白。对她而言已经锁得太久了，现在已到了露峥嵘的时候了。这样的心声坦率露出来，她已毫无顾忌。而相反，怕别人悟不出她的意思了。

毫无疑义的是，江青确实在有计划地为自己树碑立传。她要制造舆论，在全世界树立自己是中国领袖人物的形象。她认准维特克是可以为她达到目的可用之人，所以才要大加拉拢，要给维特克资本，给维特克一些别人所得不到的材料。她不顾一切，以至泄露机密。而这一切只是为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吗？不是！她在谈话中没有逻辑，胡编滥造，但为自己辩白什么，歌颂什么，都是有安排、有意识的。而有时又明枪暗箭伤人。有些话故意说得不清不楚，这就可以让维特克去编造去发挥。

记得江青在某次谈话中说过："文化大革命"要打倒打烂的首先是国务院、官僚机构。刘少奇是自己送上来的绊脚石。周恩来、彭真才是主要的革命对象。并且说了不少党内高级领导者之间的许多分歧。今天拿出那首诗，明明是她心灵深处的自白，她是野心勃勃的！除了张春桥、姚文元之外，还有一帮人在支持她。否则她能如此猖狂吗？江青这个人会装疯，其实不疯。有时是泼妇本性的暴露，有时是以为自己已经登上了顶峰，很可以为所欲为了。

翻来想去，我感到心中作痛："文化大革命"这几年，已经搞得

天下大乱,国家民族都在倒退,如果有朝一日,这班人真的夺走了国家的大权,那真是不堪设想呵!……过去的历史又在我脑中闪现。1938年的江青,1947年的江青,1964年的江青,眼前的江青……时而交叉,时而重叠,这个人似曾相识又完全陌生。她是这样一个人:她渴望成为社会的中心,她一心想使自己跟着别人伟大起来。她那好出人头地的天性与她随口编造谎言的本事,真是相辅相成呵。

时间已经到了8月27日。江青的谈话看来已快到尾声,但并非如此,她每日下午6点左右才开始谈,每天请维特克晚宴,而且都说到半夜2点以后。

还是在那座大建筑里,每隔两小时换一次房,以便通风和保持恒温,坐了下来就开讲。

江青:"他们的领导骨干是叛徒、特务,革联成立了假党,不要我,现在才知道。过去党中央不知道,延安也不知道,文化大革命才知道。据说我离开上海之后,救国会也不要了,改为救亡协会。在这些群众组织中,骨干为叛徒、特务,但广大群众是好的。如七君子事件,我要去营救,到学校去帮学生搞抗日的爱国宣传。周扬他们是假党。当时他们要迫害鲁迅,我也是被迫害者之一,他们扣我许多大帽子,我不理他们,因为有群众,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剧协党团不要我,说我是托派等等。为三八节搞演出,票都卖出去了,事先也开过会,但到时候他们都不来。国民党也不让演,黄绍竑的侄女签字才让演出。我临时上台演双簧,我还发着高烧,还有个演员装醉,给我一拳。到延安后我要求组织审查两次,要他们那些人交代。周扬、胡乔木都保他们。在延安,组织上说,你的历史我们清楚。但我已是毛主席的妻子,需要群众了解我。所以第二

次到党校。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知道,他们都是叛徒特务、反革命分子。

"鲁迅在五四以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。他反对孔夫子是一贯的。他在五四运动后被北师大赶走,跑到厦门大学当教授,然后到上海,他自己说他 1927 年至 30 年是观潮派。31 年就不观潮了,而是拿起笔作刀枪。1933 年或 1934 年,陈赓同志到上海就住在他家。瞿秋白未叛变以前,同他在一起。当时鲁迅在上海的处境虽然不好,但他不仅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广大工人中,他的威信都很高,但他身边包围一群人,都是所谓左翼,大弟子丁玲、萧军、胡风,当面装出左,背后干特务。'四条汉子'说代表党组织爱护鲁迅,说托派要整他,实际是'四条汉子'要整他,国民党整他。但他临终都在战斗。

"1935 年党中央、毛主席、红军到达陕北,毛主席打下一个城市,就找报刊和书来读。为掌握情况,鲁迅的书随时都读了。'我的一封公开信'主席就看了,并推荐给周恩来同志,并说这人可有点性格。他长征时挑了很多书。我有主席的手体,是很珍贵的历史文献。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,有群众性、阶级性。而王明提'国防文学',这毫无阶级性。鲁迅坚持这口号,这就引起围攻。'国防文学'是地地道道的反共汉奸文学,当时在这个口号下,演出了《赛金花》、《石达开的末路》等。1935 年我回到上海时还有革联,组织了业余剧人协会,第一次演《那拉》、《钦差大臣》、《大雷雨》,我演女主角。当时演这类戏也是不正常的,但还是很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戏。演《赛金花》搞分裂,甚至要搞死我。我并不想做电影演员,但一举成名,电影老板来找我订合同。当时鲁迅尖锐批评他们这些,你想他们不要把他置于死地?如能接他

到根据地，他还能多活几年。像他这样的人无须入党手续，他是非党布尔什维克。所以对鲁迅要历史唯物地看，他前期是个激进民主主义者；中期观潮；后期起来作战，一直到逝世。毛主席说，鲁迅是伟大的英勇的旗手。”

维特克：“刚刚江青同志谈的党与鲁迅的关系，对外界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很有用。因为在这方面外界有很多模糊的看法。”

江青：“1933 年陈赓住他家。瞿秋白叛变前也与他接近。1935 年毛主席派人去接他，那时上海正围攻他。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事还太少了，学习也不多，不过所说的都是事实。当他们要搞死我时，舆论通通起来，就是《大公报》不表态，他们要逼我自杀，并放空气要绑架我。我认为不值一驳。那时我身体很坏，我薪水虽多了些，但我有家庭负担，我到供黄包车夫的饭铺吃馍，别人说我是怪物。唯一的嗜好是买书，书店的人认识我，我没钱，他们送书到家，以后再给钱。有时我还到当铺去当，真是没有法子。我那时的生活你们都不会理解的。

“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三次公演，都是成功的，但都赔钱。我从不揩男人的油。旧中国男女朋友一起外出，车饭费都是男的出，我不这样，有钱时抢着出，没钱时说，这次你出，下次我出。为了看嘉宝的《茶花女》，在第一流戏院，我到得比较早，等到朋友来时，我抢着买票，排了队要买票时，一掏钱才发现被人掏了腰包，这次只好让朋友买票了。看完戏又坐黄包车到处向朋友借钱。

“在坐的同志都没有这样的感性知识。我还要养家，一个母亲、一个守寡的姐姐，当时要有气魄才能顶住。我天天上马路，你要绑架就绑。群众动了公愤，见了我拉手送花。《大公报》有个女记者，她要我表态。在路上还碰见另一个骂我的记者，要同我拉

手，我说你用斗大的字骂我，我在这里等着你，我绝不离开上海。我本来要离沪，电影公司的合同没到期，加上这事更走不了。后来比较同情我的朋友说，你还是写，这才写了《我的一封公开信》。我被捕第一夜睡醒了，就想起苏联领事馆那面红旗，始终相信这面红旗中国会有，这样你就知道李玉和怎么创作了……”

8.批《武训传》评《红楼梦》

在8月27日晚,江青为了使维特克能了解她的全部自编的历史,谈话就变得更为杂乱、东拉西扯,在多处插进一些毫无逻辑的叙述。比如在此处,她把赫鲁晓夫痛骂一顿。还提到阿登纳访苏,苏联逼债诸如此类的话。从这些枯燥、混乱的谈话中,您可对江青自编的历史有个较为清晰的了解。

江青:"下面说一说到延安。我的信一出来他们没理了,不骂了,我可以走了。我是七七以后,八一三以前走的,到西安正是八一三。从洛川到延安是坐毛主席的车,当时不知道。一进城门,看见安澜两个字,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到延安诉苦,说有个党不要我,怎么也找不到党,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说,没事没事。

"讲一讲延安文艺座谈会,什么历史背景下决定开这个会呢?就是因为这些人也到了延安,他们从1941年开始,周扬带头,丁玲写了《三八节有感》,王实味写了《野百合花》。延安现在还比较落后,我们工作中有缺点,如果搞深井、梯田,那里是粮仓,但是开发很不够,这首先是工作做得不好,有坏人干扰。其次仅有点钱,支

援被压迫民族和人民。

“延安你已去过了,现在延安很不能令人满意,但比起我们在延安的年代那已好得多了。但周扬这伙人就制造反革命舆论。团中央还同时出一个墙报,叫《轻骑队》,那也是恶毒攻击我们党、军队和人民。他们原来住上海亭子间,到延安住窑洞,吃劳动人民的,但不下乡,不同人民接近,而干反革命勾当。我们那时演了《松花江上》、《火烧飞机场》,还有其他健康的节目,如《兄妹开荒》。这时毛主席认为问题得解决,开始调查研究,他与所有的人谈了话,我有的一块参加,有的没参加。我参加开幕、闭幕两次座谈会。毛主席的讲话,雄辩地把这批家伙驳得体无完肤。这个作品我个人认为不是单讲文艺的,哲学、政治、文艺各方面都涉及到,每读一次都有新的体会。如歌功颂德的问题,他们说他们是不歌功颂德的;写光明面黑暗面问题;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问题。主席说:描写黑暗者未必伟大,歌颂我们者未必渺小。

“历史背景是:王明回国,又带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,‘国防文学’就是他在文学方面的口号,这是斗争的继续。《论持久战》王明不登,封锁了。党校没有毛主席的著作,只有王明的《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》。主席打破封锁的办法就是到处作报告。我是毛主席的崇拜者,你不需要人崇拜?那没有学生听你的课。问题是对待崇拜的态度。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对我,也是吹捧我,我知道就坚持压下去。这是我向你解剖自己。”

维特克:“由于解释了背景,就能更清楚了解。”

江青:“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也应该谈一谈。王明提出‘一切服从统一战线,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’,这就要被别人统了。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,它表现在各个领域里,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,到现在还

在莫斯科，专门写文章骂我们。我们不理他就是了。

“我是坐着救护车进城的，那时没有自己的医院，搞不清敌人还是朋友，斯大林在世，他那里有个医院，我们出钱，长期包了几个床位，党组织把我送去治疗，我只有42公斤，全是骨头，那些教授很惊奇，这怎么能坚持工作呢？对于先治哪种病争论不休。最后还是先割扁桃腺，说不割掉老发烧，两边都烂了，手术较麻烦。我坐那里观察他，医生们说，你简直像个将军，英雄得很啦，割了半个小时。痊愈后还是不行，要养胖一点，送到黑海，住在雅尔塔会议的房子，休养个把月，呆不住了，要求回来。在路上听到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眼泪掉下来。在我的车厢里还有他们校一级警卫人员，看我流泪还不懂。到莫斯科，他们还要给我治疗。斯大林接见我们代表团时，接见我。我感到主席可能要去，在一块可不好，不要给主席增加麻烦。我回北京了。

“我到农村调查土地、阶级关系，主席批准了，但到上海饶漱石把我扣起来，这是高饶事件。饶是个叛徒，他包庇3000多有名特务。但那时还以为他是好人。他不让我下乡理由是特务多。他的公安部长说要我逛百货公司去。我说我是来逛商店的？要去你自己去。我坐在车上被带枪的人包围，不过不是公开对准。车子前面不是公安部长就是秘书长。陈毅同志说江青同志应会见一下文化界人物，我说中央没给我这个任务，如果华东局认为需要，也应请示中央。结果潘汉年陪我见了文化人。潘也是大叛徒大特务。后来好不容易争取，他们开华东局扩大会议，我列席就想赶我走。饶坐在我对面，说我是钦差大臣，我非常惊讶，觉得要赶我走。他们还把我整病了，我住在胜利大厦，他怕干部接触我，把我搬到他那里去。让我住没有暖气的房子，盖上所有的被子都冷，发起烧

来，他要请医生我拒绝了，多喝开水就好了。我争取机会到无锡，参加地委扩大会议，这样做一点调查研究。如什么叫永佃田、灰肥田，那里农民副业很多，单靠土地不行。我对蚕丝、茶叶也作了调查。四石米换一石蚕，农民才考虑，否则不愿。日本人在时把铁路两旁的树都砍光了，桑树、茶树恢复起来要五年，茶树可以采几十年。我后来又到上海，回到北京。

“1951 年毛主席到外地，看《武训传》我们俩人都不高兴，主席没有说话，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，主席不吭声。我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，中宣部文艺处有几个副处长，我去了就要成立电影处。这一年是进城后与文艺界交锋的一年。还有《清宫秘史》、《丽人行》。刘少奇说《清宫秘史》是爱国主义的戏，毛主席说是卖国主义的戏，因为替蒋介石卖国辩护。编剧的人很狡猾，戊戌政变与《清宫秘史》之间差很多时间。对《武训传》我到处游说，不能向地主、资产阶级磕头，要革命，没人理我。因为周扬、夏衍亲自主持这部片子，开电影指导委员会时，我只一票，我说对《武训传》至少要有个评论。周扬说，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，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不好？我把门一关就走了说：你搞你的改良主义好了。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有赞成《武训传》的。我带了材料到主席那里去，见了一面以后，他就看不到我。有天突然到我房里去，我满屋子都是材料。主席说，我到处找你找不到，你原来在搞这个。陈伯达、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，主席告诉他们《武训传》的事应引起注意。他们回到北京后，周扬大概觉得不好过了。

“武训是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，学校中只有一两个工农子弟。柳林镇的城墙比唐邑县大得多，那里的中学改为武训中学，当时那一带有几十万农民暴动，此起彼伏，太平天国的李开芳将军到过那

里。他们不歌颂农民暴动的领袖。好像人民的受奴役都是因为没有文化,兴了义学就什么都好了。这战斗前后用了8个月。直到发表文章,出小册子为止。周扬公开作自我批评。

"这中间还打了一仗,为《清宫秘史》,在电影局,我请两个历史学家去,老舍、陆定一坐镇,都围攻我,说第一这是民营资本家出的,第二是爱国主义的。他们说爱国主义的,我说是卖国主义的。我坐的前一排是艾青,他站起来说:江青同志你说这话要负政治上的责任。因为胡乔木已把刘少奇的话告诉他们了。我说我当然负责,而且还不是民营,是官僚资本的。张善琨就是汉奸,李祖永是官僚资本。我把香港电影公司推出去,又进来了。《清宫秘史》因为我这一票是有分量的,他们决定让两个历史学家去写评论,但没有发表。追查,说文章写出来了,在胡乔木那里,胡乔木说写得不好。主席每次开会就说,你们欠债,是指《清宫秘史》的批评压下来了。主席对周扬不下去土改很生气,说如不下去,要派两个警卫员押他下去……"

8月27日晚江青与维特克谈话有8个小时,从上海、延安至解放以后。听起来很是杂乱无章,但江青要把中国革命历史和她本身的经历联系起来,而且她始终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。她与所有曾和她有过接触的人进行斗争。我真难以想象,她周围的人都是"敌人",几乎没有她认为是好人的。特别让我惊心的是,她对于所有她认为不好的人,都一律戴上大叛徒、大特务、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。在那个年代,江青真是一言九鼎,她随口而出说谁谁是叛徒、特务、反革命什么的,那还了得,说不定这个人哪天就要横祸飞来,被关被押甚至冤死狱中。而那时江青的复仇心理达到了极点,在她心目中的大大小小、恩恩怨怨的人和事,她全不放过。她

变得如此暴戾,实在难以令人理解。江青垮台以后按可靠的计算,被她一言而获罪者近200人。在控诉中,有一个在30年代曾给江青作过女佣的女工,江青怕她说出自己的丑史,竟把这个女工关在监狱长达9年!江青一垮台。全国人民都对她切齿痛恨,同时又欢欣鼓舞,这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
江青:"今天给你谈《红楼梦》,你研究中国文学而不谈《红楼梦》那怎么行。我这里预备了一套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,这是最可靠也是最好的版本。"

维特克:"我一定会遵照你的意思,回到美国认真阅读,江青夫人。"

江青:"1954年山东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批评俞平伯《红楼梦研究》的文章,毛主席看了以后很重视,要《人民日报》转载,这下可惹了大祸了。《文艺报》不登,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大人物压小人物。毛主席写了封《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》,还开了一个会,我参加了,唉,这个问题你没兴趣,不谈了。"

维特克:"不但我有兴趣,世界上对中国文学关心的人,都会有兴趣。"

江青:"俞平伯他们这一派对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用唯心论的考证,脱离了历史,脱离了客观的实际,他唯心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俞平伯、胡适穿凿附会,把这本书贬低为一部恋爱小说,而我认为这本书是百科全书。曹雪芹从一个贵族 的角度来描写阶级斗争,涉及到二十几条人命,写了三四百口人。但真正的主人只有二十多个,其他都是家务劳动的奴隶,大小奴隶头子。我认为世界上十八九世纪的小说没有一部能够比得上《红楼梦》那样尖锐。俞平伯、胡适竟敢荒谬地、唯心地说,林黛玉与薛宝钗是一个人,还有

他们把十六回本、八十回本脂砚斋等统统垄断了。群众见不到，他们垄断了这些东西，然后说林黛玉与薛宝钗就是一个人，一回事。说那个注与曹雪芹的思想是一致的。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什么舅舅，又说史湘云、薛宝钗如何如何，反正是主观猜测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

“一百二十回本，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，前八十回是有注的。我为了要前八十回这个本子，向北京图书馆去借，借来以后挨了一顿臭骂啊。那些资产阶级权威，不许向外借，我借出来以后，请了很多人抄了一本，这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也是抄本，不是原本。他们垄断这种书，八十回本的注解是反动的。而他们说这与曹雪芹的思想一致。曹雪芹二十几岁就写了这本书，修改了十几年。《红楼梦》有个戚本接近于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。我研究过各种版本的目录，证明后头他是有稿子的，但是他没有后代，可能给人们借去失散了。他的后头写得非常悲惨，抄家，坐牢，讨饭，都有回目的。《红楼梦》的创作和它的历史背景有关，曹雪芹的祖父是当官的，曹寅的母亲是康熙的奶娘……

“高鹗续这后四十回，高鹗最大的功劳是什么？就是写贾宝玉出家，但仍写他中了举人，结婚又生了儿子后才出家的。如果高鹗后来中了进士的话，那贾宝玉也一定中进士。周汝昌写了一部《红楼梦新证》，他的基本观点也是胡适这一派的，但是他有一点好处，就是他拿出清宫的档案，这是比较可靠的材料。文化大革命中，我是点名保他的。这本书的资料值得看，他的考证方法可是不行。

“我举个例子说明俞平伯怎么穿凿附会。《红楼梦》中有一回叫《寿怡红群芳开夜宴》，他连谁坐在哪儿，谁怎样都画了图。说林黛玉、薛宝钗是合二而一。古人坐在哪个地方，怎么坐的他怎么考

证出来,考证得那么准确呢?他说就是那样。你看真是主观。这两个人地位、性格完全不一样,一个是尖端顶儿上的,一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。一个就是挖空心思怎么样害林黛玉的人,一个是天真烂漫地对待人。当然啦,林黛玉也是没有心计的,怕得罪人,怕别的什么。曹雪芹写林黛玉都是批评他。说薛宝钗都是好的,好什么呢?一个是说她美,唇不点而含丹,眉不画而含翠,眼同水杏,脸若银盆。中国那个时候算美,现在看来可怕得很。又说她罕言寡语,人谓装愚;安分随时,自云守拙。反正反过来复过去就是好。曹雪芹写林黛玉呢,他很细心,没有说林黛玉漂亮,他形象地写了林黛玉:两弯似蹙非蹙的笼烟眉,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,什么泪光点点,娇喘微微,什么行动如弱柳扶风。那是很形象的。写她们两人的房间呢?从刘姥姥的眼里看,说林黛玉的房子,哎呀,这必定是那一位哥儿的书房,尽是书。而薛宝钗的房子里是另一个样子,娇柔造作。听说贾宝玉有一块玉,她才做了个锁,原来是送到宫里考贤人的,没有选上,这样就看中了宝二奶奶的宝座了。而林黛玉从小是像男孩子那样培养长大的。这两个人完全不同,性格什么的都不一样,而且地位是悬殊的,一高一低。一个是寄人篱下,实际上是无产者,没有产业,当然不是说她的思想不是贵族的。一个家里是富豪,是皇家的商人。这怎么能像俞平伯那样子在他的《红楼考证》里说的,林黛玉就是薛宝钗,薛宝钗就是林黛玉呢?曹雪芹写贾宝玉也是非常不成材的,说他什么也不行。在第五回里,在林黛玉的眼睛里,贾宝玉并不是那么个蠢包。毛主席总是告诉我们全党,告诉我们的子女要看这本书,不要单看爱情故事,单看哥哥妹妹,要看阶级斗争,要看那二十几条人命。这几百个人都是吃乌进孝那样的庄子收来的东西,那些大丫头、管家的,得意的

时候都是很厉害的。但是一旦失宠马上就完蛋，就是死亡。我看过的小说不很多，欧洲的，包括美国马克·吐温的作品，是暴露的。这在当时是进步的，但写的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小资产阶级往上爬。狄更斯的《孤星血泪》就是写爬上去了的。斯汤达的《红与黑》中的于连、索里尔已经爬到军官啦，他丈人要给他买个贵族。而另一个贵族妇女与他有关系，写了封信，把他压下了，最后死了。斯汤达的作品我是有研究，特别是《红与黑》，这部书应该说是不朽的，文学史中都应占有重要地位，因为他写了欧洲当时的政治、经济情况，政教怎么斗争，写得很复杂。这部书可以提供我们了解当时欧洲的历史。

"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不是这样子的，他写的本身就是一群贵族，但贵族中出了这么两个叛逆：一个贾宝玉，一个林黛玉。贾宝玉就是怕人情世故，就是不愿意作官。书中有这样的话：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、武死战，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，便只管胡闹起来。哪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，只顾他邀名，猛拼一死，将来弃国于何地？他说还是做个老百姓吧。宝玉不愿意去读书，不愿意去应考，但在自己家里读书，他说其他书都是假的，只有《四书》是真的。作者总说他无能，总说林黛玉小性儿，行动爱恼人。说薛宝钗怎么大方，其实是薛宝钗手里有钱，她用钱收买人心，袭人就是她收买的特务。如果林黛玉和贾宝玉活到现在，也是大右派。但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，就是18世纪中叶，他们反封建那样坚决，是了不起的。在恋爱问题上，考试制度上等等。总而言之，他们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。

"如何看得懂《红楼梦》呢？头五回很多人看不懂，小说实际上是从第六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开始的。他说天上不是有一个太虚幻

境吗？在地上就搞个大观园，他说林黛玉是绛珠仙草，贾宝玉是神英侍者，他可怜这棵草，每天以甘露灌溉，所以绛珠仙草得了个人形，她下凡去要用眼泪来还神英侍者的恩情，这是浪漫主义的。但整个的既是浪漫主义，又是现实主义，头五回非常重要。这部书的作者，他在前五回反复交代，反复告诉读者，我想写的是什么。主要的人物在前五回都出来了。林黛玉、贾宝玉、薛宝钗是第八回才正式出现。但是前五回是总的介绍，人物都介绍了，不是像小说那样写法，这五回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主题歌——'好了歌'。这个歌是谁作的呢，是甄士隐，作者说，将真事隐去了，所以有个贾宝玉，甄宝玉，甄士隐后来家道破落，他晚年非常悲惨的，最后跟和尚道士走了。"

……

江青："另外有所说十二支曲子，实际上他还有个尾声，前头有引子，共十四支，十二支曲子就是十二金钗，金陵十二钗。另外，他游太虚幻境时，看见有正册、副册，这些册子都是很重要的……十二支曲子都是每个曲子一个人，我只讲第一支和第二支，这说明贾宝玉跟林黛玉是怎么样在恋爱问题上要自由，坚决反对封建。'都道是金玉良缘，俺只念木石前盟。空对着，山中高士晶莹雪；终不忘，世外仙姝寂寞林。叹人间，美中不足今方信。纵然是举案齐眉，到底意难平。'这个是第一支。第二支是'一个是良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，若说没奇缘，今生偏又遇着他；若说有奇缘，如何心事终虚话？一个枉自嗟呀，一个空劳牵挂，一个是水中月，一个镜中花。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，怎禁得秋流到冬，春流到夏！'这第一支曲子是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恋爱不成。这两个曲子是混合着写的。

"曹雪芹他并不想变天,他是想补天,他有一首诗说:'无材可去补苍天,枉入红尘若千年'。他不满意那种官僚制度等等。这部书是作者对封建贵族的一首挽歌。"

维特克:"江青同志真是个伟大的学者,多呆一天就发现江青同志新的才能。不知再呆下去,又会发现什么新的才干。"

江青:"曹雪芹不仅是伟大的作家,也是语言家,他的文字十分简练,你学中文,就必须读《红楼梦》。

"《红楼梦》我读过多少遍不记得了。大概10遍以上。到延安以前看了三次。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,看不下去,太惨了。毛主席批评我,你这个人不成话,一部书都看不完。不过说老实话,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,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。曹雪芹很博学,他对诗词歌赋、医药、绘画等都懂。"

维特克:"江青同志是否认为曹雪芹的多才多艺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?"

江青:"像他这样的文学家很难得,另外他引证的历史书籍、诗词歌赋都是惊人的。他描写人物很简明,历史知识很丰富。如《寿怡红群芳开夜宴》那一回,就在那一夜不知道引用了多少人写诗词,我考证了很久,才找出他引的是谁的诗。我是真考证,要慢慢查呀!他对中国历史很熟悉,前面讲到的'可叹停机德,堪怜咏絮才',这两个典故,一出在战国时代,一出于晋朝。贾宝玉不愿要功名,说只有林妹妹了解他,薛宝钗尽是胡说八道,说林妹妹从来未这样劝过他。有次贾宝玉还当面骂薛宝钗。曹雪芹写贾宝玉睡着了,袭人坐在他旁边绣鸳鸯荷包,宝钗去看望宝玉,袭人见她来了,赶快让坐。袭人说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,宝姑娘能否替我赶蚊子。宝钗就在袭人的位子上坐下,袭人就走了。宝玉忽然一翻身,在梦

中喊骂:什么混账和尚道士,什么金玉良缘,我偏说木石姻缘。宝钗听了很吃惊,但装着没事。他们母党合起来陷害林黛玉和好的大小丫头。凤姐是明的,宝钗是暗的。袭人也是暗的,她是特务,向王夫人告发宝玉与黛玉的恋爱。

"《寿怡红群芳开夜宴》这一回可以看出贾府的剥削。夜宴开始,要芳官唱曲,她唱了一支祝寿的曲,大家都说打回去,打回去,你把最好的拿出来唱。她然后唱《赏花时》,'翠凤毛翎扎帚叉,闲踏山门扫落花。您看那风起玉尘沙。猛可的那一层云下,抵多少门外即天涯。'这是刘禹锡写的。《洞宾呀》这戏是要吕洞宾下凡去渡一人上天。'你再休要错斩黄龙一线差,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。你与俺高眼向云霞。洞宾啊,你得了人可便早些儿回话,若迟啊,错教人留恨碧桃花。'这叫赏花时,谁的曲子呢?查了很久,查到明朝汤显祖。汤显祖是个大的贵族戏剧家,剧名可能是《黄粱梦》。'抵多少门外即天涯'是唐朝刘禹锡的诗,丞相府里的牡丹。当时唐代有两个京城,一在洛阳,一在长安,懂吗?汤显祖是引的刘禹锡的诗,曹雪芹又引用汤显祖。

"这一回小说写薛宝钗抽了个签,签上画着一枝牡丹,签下有一句唐诗'任是无情也动人',没有情,但也很漂亮。宝玉一面听芳官的曲子,一面喃喃说'任是无情也动人',但眼看着芳官。黛宝抽了什么签呢?《芙蓉》诗是:'莫怨东风当自嗟'。探春抽的签是'杏花',诗曰'天上碧桃和露种,日边红杏倚云栽,芙蓉生在秋江上,莫向东风怨未开'。探春结局较好。

"曹雪芹写林黛玉很有学问,写薛宝钗也是很有学问的。有一次祝寿,唱《醉打山门》,贾宝玉装着没有听过,薛宝钗说里面有个曲子很好听,词也很好。宝玉说:'好姐姐,你就给我讲讲吧。'这个

曲子叫《寄生草》,是关汉卿写的,她比但丁早多少年,比莎士比亚早300年。关汉卿的《窦娥冤》是了不起的,是个歌剧,大悲剧。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灾难。《寄生草》中有:'漫揾英雄泪,相离处士家。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。没缘法转眼分离乍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?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。'宝钗讲完,宝玉称好。黛玉说:还没打'山门',你就'装疯'了。说明斗争很激烈,彼此都是以学问来斗争的。

"《红楼梦》是讲不完的。你们不要认为我是红学家。我只是半个红学家。这场争论,涉及到对祖国的文化财富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,讲不完,讲不完,算啦,以后你自个儿慢慢研究。"

这时江青洋洋得意,兴高采烈拉着维特克的手,慢慢走到另一间屋子吃晚饭。

我们几个人又轻轻议论上了。不知是谁说的,我看江青讲起《红楼梦》来倒是真有一套。

"唉,你们没有看见她抄了一大堆纸,翻着在背那些诗词什么的。"

"这一套我还似曾听过,大概真是某个红学家讲过的论点。"

"别那么对她有成见,她整天没别的事,研究《红楼梦》也不坏。比她一心想整人可是好多了呀,看来她对《红楼梦》还真读过不少遍哩。"

晚饭后江青与维特克又坐下来,开讲。

江青:"我想补充一点,解放初,高、饶找人勾结林彪,想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,他当副主席。他们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一切照抄苏修,没有独立性,就是要卖国。现在看起来,林彪最狡猾,他不仅把自己掩护起来,而且有杀人灭口的嫌疑。如高岗活着,主席不

会亏待他。林彪派人与高岗谈话,威胁了他。杀人灭口没核实,不要去说,林彪是高一边的已核实。下边我就给你讲解放以后到现在的大事。”

江青这时叫她的副官把一个大而厚的皮包拿过来,看来像个百宝匣,她拿出来有16开本的文件,还有好几卷纸,她一件件放在她身边的茶几上,又在其中拿出一本,翻开来念。

江青:“1953年8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。1955年4至11月通过合作化问题的决议。

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,提出纲要四十条。

1956年4月25日至28日在政治局发表《论十大关系》。

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‘二百’方针。

1956年9月15日在党的八大,毛主席致开幕词。

1957年2月25日毛主席作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》的报告。

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。

3月开始右派猖狂进攻。

4月27日发出整风的号召。

5月发表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。

1957年7月1日发表《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》。这是反右纲领。

1957年2月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》。

3月开始猖狂进攻,大字报也有不少,这时毛主席有指示,反击右派。

……

“1958年有三次郑州会议，坚持抵制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单干风、自由市场。第三次尖锐指出是否还相信马列主义。就在那年，在广州开讲《政治经济学》。

“彭德怀也是自己跳出来的。中央原准备在北戴河开会，后改为庐山，我原在北戴河，毛主席派飞机把文件带给我看，看后我要求上庐山。没看到主席的文件，看的简报，下山后要我休息，就听说有彭德怀的什么十万言书，开始反右倾，我病了到广州休息。1962年恢复到投入战斗。

1960年8月毛主席提出鞍钢宪法。

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彻底撕毁合同，毛主席向全党发出自力更生的号召。

1960年8月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号召全国大办农业和粮食。

1961年1月13日至18日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，提出对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。

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。

1962年8月6日主席召开北戴河会议，作阶级、形势、矛盾的讲话。

1962年8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，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，刘少奇也在国际上提出‘三和一少’，国内提出‘三自一包’。

“这是建国以来的一份大事记，内容开得很详细，我就不念了。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有。斗争可尖锐哩。供你写书时作参考用。”

维特克非常紧张地在记录着，骤然停住笔

维特克：“江青夫人，这太重要了，你这是印好的，是否也可以

送给我呢?"

江青:"当然可以,这是为你准备的,喏,这里还有林彪的信、二月提纲……"

我坐在旁一听,真的吓出一身冷汗:关于建国以来所有事件的大事记,在国内还是保密的。林彪那封信在内部尚未传达,二月提纲也没有公开。江青要把这些都送给外国人!我如坐针毡,得想对策来制止。那张茶几正摆在我和江青之间。我随手拿过来,交还给副官,对着江青和维特克说:"这些材料还需要翻译,以后和记录一起再送吧。"

江青瞪了我一眼,也没说话。副官把那包文件拿走了,算解了围。江青又接着说:"你知道,这期间中国还有战争哩,比如抗美援朝。你是美国人,也应该知道。美国发动侵朝战争,越过'三八线',向我鸭绿江进攻。毛主席号召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,我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,毛主席连续指挥五次大战役,四个大战役我们都是全歼敌人,第四次战役彭德怀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,吃亏了。美俘我1万人左右。停战协定后我们遣返战俘,美国不遣。欠了我们的账……

"还有中印边界战争,那是苏联挑拨的,这些我也没时间再讲……"

江青这时指着放在她和维特克坐位之间那张茶几说:"这里是抗美援朝时五次战役的地图,还有图解,也是送给你的……"

我这时一听更像雷击了一般,也顾不得其他人都大为吃惊的神态,便起身把那位参谋拉到客厅外的走廊上。

我说:"老张同志,首长今晚拿出来的地图,我想也是你带来的吧?因为我事先什么都不知道,这是朝鲜的地图,怎么能送给美国

人哩?"

"我也不知道首长要送给美国人呵。"

"不管怎么说,这些图绝对不能送给维特克。"

"这是首长的吩咐,我没办法阻止呀?"

"如果要送,我们现在就去打电话请示周总理,他主管外事的。"

"首长的事谁敢阻拦,她发脾气怎么办?"

"首长发脾气我承担。如果把地图给维特克拿走,一切后果由你负责。"

我和参谋谈完以后,又回到会客厅,各人坐到原位上。

江青:"今天谈得太多了,打住吧。明日你穿上最漂亮的衣服,我们逛兰圃,拍照。"

参谋匆忙走近江青身旁,小声地解释什么,江青却用恶狠狠的眼神盯着我。

维特克正想起身告辞,双手去取茶几上的那些纸卷。

参谋赶紧走过来,非常礼貌地说:"维特克女士,这些地图里面可能还有些地方需要修改,你今天不要拿,以后……"参谋随即把那些纸卷拿走了,放在自己身上。

维特克用惊异的眼光投向江青。

江青迅速换个笑脸和维特克握别。转过身来对准我说:"好呀,小张,你真行!"

我赶快感谢老张,说:"你真够棒,这样做维特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是吧。"

9. 亲改记录 树碑立传

29日下午4时，江青陪伴维特克游兰圃，我又是第一个被汽车载到那里。江青这天穿着乳白色连衣裙，戴着金丝眼镜。随侍她的一群女服务人员，一律穿上藏青色裙子，白色上衣。她们手上拿着许多厚纸板，还有各种植物标本，全部高级专业照相器材已摆在一个亭子正中。兰圃里绿树葱郁，一进入这园林即使人有清新舒适的快感。记得10年前我曾到过这里参观，虽然也非常清新美丽，但10年来有了很大改进，树木多了，整个园林布置得也很有序，各色品种的兰花，大大增加，除了全国各地的名贵品种都有外，而且还引进了欧美国家的兰花，弯弯曲曲的小径错落有致。各色品种的兰花、盆景摆在路的两旁，芳香袭人。我又一次吃惊：在"文化大革命"的年代里，这里居然没有被破坏，而且还保留着如此美妙的所在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

江青抬头一见是我，瞪着眼就叫开了："我送给你的裙子呢？为什么不穿？我不是让你们都穿裙子吗？"我一听，原来是为这个呀，心里轻松一下，但看到江青凶狠的眼神，知道是要找我的毛病

了。其实穿不穿裙子的事，我就没想到，我已经有许多年都不穿了，也没想过要穿。那天李副官送来五条黑色麻绸短裙，分给每个人，其实谁也没穿过。没想到江青今天却因这件小事发那么大的火。

我只得抱歉地说："江青同志，我的皮肤过敏，怕蚊虫咬，所以没有穿。"江青吼起来："我都不怕咬，你就怕咬吗？……哼哼，笑话！"

我正发愣还想解释两句，李副官一见这样子，立刻过来拉着我轻轻地说："快走吧，我用车子送你回去，换了裙子赶快来。"

我坐上汽车之前，李副官打电话回宾馆，告诉所有女同志，通通穿上黑裙子。

这天整个下午在兰圃，江青完全是个演员了。她走来走去，有时是一路小跑，或者可以说是跳来跳去。总之非常活跃，简直像只蝴蝶那样。

维特克女士举着照相机，为江青拍了各种姿势的照片。

江青坐在亭子中的小椅子上，拿着厚纸板，服务员送上植物，她做标本，维特克从各个角度为她照相。

江青向维特克介绍讲解各种植物标本。

江青领着维特克穿行于各条小径上，并看着花盆上说明的文字，时时向维特克介绍各种兰花：品种、产地、名称、特性，副官随侍左右不断拍照。

然后江青在大牛帮助下，把自己那套摄影设备陈设安排妥当，为维特克拍照。关于拍照，江青的话更多了：

"我对照相是有研究的，也称半个专家吧。我时常发表作品的。当然不是用真名发表，不然又不得了哩。他们还要为我个人

搞影展,我不要。你看,现在是快近黄昏了,要拍逆光的,大牛,灯光!"

江青越说越带劲,她总是忘不掉贬低旁人:"你知道,我真操心呀,我们有个制造胶片的工厂,但质量不好,不过关,就是不出绿,我就得亲自去指导呀,唉,那个工厂在保定。

"他们那些什么照相专家呀,逆光就是弄得不对,不清楚,没有层次;有时是黑糊糊的一片,有时又显得那样红通通……"

我们几个人,跟在后边观察,江青今天是要让维特克看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:既是军事家、政治家,又是艺术家、摄影家,甚至是植物学家。生活多姿多彩。概而言之,一个杰出人物身上应有的全部特长,她一样也不缺少,甚至更多。

江青:"你知道,我还养猴子哩。猴子呀,最富有人情味儿,动物界中,除了人就数猴子最有灵性。你知道吗?猴子还懂得吃醋哩,那就是妒忌,这是动物最高级的感情,哈哈哈有意思极了。以前我养了一只猴,我时常抱着她。有一天她坐在远远的桌子上,我和一个孩子正开玩笑,你猜猜怎么样,猴子飞快跑过来,就用爪去抓那个孩子,嘻嘻嘻,那就是妒忌,也就是吃醋。"

维特克也跟着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维特克:"江青夫人,你的见识真是广博,而且对什么都有很高的洞察能力。我真是非常非常佩服你。"

江青:"我还养狗,狗是很忠实于主人的。我喜欢大猎狗,哈巴狗没有意思。我拿牛肉喂它,别人给食,它都不吃的,这是最好的狗,只能由我喂它,多么机警呵!"

"我怕狗,宁愿养猫。"维特克轻轻笑着回答,像孩子般天真,"猫样子可爱!"

江青:“猫只是好玩,没意思。对狗你不用怕,它认识自己的主人,但你必须每天亲自喂它才行。我还喜欢骑马,以前我有很好的马,很剽悍的,别人骑上去都得跌下来,只有我才能驯服她。你会骑马吗?如果你喜欢,改天我陪你骑。这里有地方骑马,只要你喜欢。”

这些都是江青要对世界宣扬的她的生活。

嘻嘻哈哈过了一下午,太阳落山了。江青与维特克话别:“今晚我请你吃山东菜。这里不是山东,但我有从山东来的好厨师,做我的家乡菜,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

我们刚进入兰圃时,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沁人肺腑,这会儿这股清香显然没有了。也许是夏日暑气吧,也许是夕阳的折射吧,眼前又变得是灰蒙蒙的一片,又一个夜晚开始了。

南方的夏夜,没有风,树叶纹丝不动。我们又来到那高大建筑物中。还是由女服务员引导我们走进一间大厅里。正对着沙发的另一边,有一长条桌,上面堆满了书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线装《二十四史》,还是用木匣子装好的。我随手翻开一本,是清代版本,在国内都已不多见了。还有重印的线装《古诗源》,新版 20 本精装《鲁迅全集》,线装新印的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,还有不少其他各种书籍。我们几人在桌旁浏览。

门外传来脚步声、谈话声。江青、参谋、副官和服务人员先后进入客厅。江青今晚穿的是宝蓝色西服,兴致勃勃。后边跟着的两个服务员手中端着一大茶盘的茉莉花、白兰花花球,另外还有些别的什么。

江青:“现在的室温是 20℃吗?我感觉有点凉,你们开放空调没有超过 20 分钟吧?”

"首长,现在室温21℃,过一会儿,可能还要升高一些。"

我们几人转过身来,立正候迎。其他坐着的人也都起立。

江青:"你们早来啦?你们看,这些书都是我预备送给维特克女士的,她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,没有一套《二十四史》怎么行。"

我们一听都有点吃惊,这样名贵的《二十四史》送给维特克个人?这是违反规定的呀。我想反正我已经把她得罪了,该说的我还是说吧,也不必顾虑了。

"江青同志,这套《二十四史》,国内也不多见了。按规定是不能送给私人的,你或者送给维特克女士所在的大学,也许更有意义。"

江青:"谁说不能送的?我自己花钱买的,你知道吗?我有的是钱,我爱送给谁就送给谁!"

"这是有关文物出口的规定,需要文物局批准的。"老陈轻声解释了一句。

江青:"谁的规定?周总理不是送给尼克松总统一套吗?周总理能送,我就能送。"

江青脸色一变,横不讲理。

"据我所知,周总理是用国务院名义,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。"小沈很认真地又说了一句。

我是刚从兰圃那一幕过来,不希望江青发火。只见江青眉毛一挑,正想发作,正好这时小俞陪着维特克走进来了,算是解了围。

江青立刻上前拉着维特克的手,互相亲热地微笑着。服务员快步走上前来,把那盛满鲜花的盘子送过来,江青高兴了。

江青:"这是茉莉花穿成的花球,你看还有小花环,你看还有白兰花,这样清香,这样洁白,美国有这些花吗?"

维特克:“也许夏威夷岛上有,我不清楚,不过不会有这么清香的花,真美,真可爱。”

江青:“这是我特意准备送给你的。在休息的时候,我很喜欢穿花球,每天换一个,你看穿在扇子下边香得很。”

江青手上拿着一把有精细雕刻的檀香扇,下边坠着茉莉花球,对维特克笑嘻嘻地说;

“这是我的檀香扇,送给你作纪念吧,这是新的,今年我才用。我用过送给你,才更有意义,是不是?这把扇子是特制的,比市面上卖的要精致得多。”

维特克甜甜地微笑着,接过扇子和花球,细细把玩。江青这时拿出几串小茉莉花,给我们几个人,“这是送给你们的,不然我就太偏心哩。”哈哈一笑。

江青又转过身来,取另外的东西。

江青:“维特克,你是我的朋友,我还要送你一些纪念品:这是特制的书签和裁纸刀。你看,这是不久前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漆器上的花纹,刻在象牙的裁纸刀上。这是竹制的,也有雕刻。这样的手工艺品,又好看又有纪念价值。而且是我自己设计的,特级技工为我雕刻。除了我自己,谁也没有哩,送给你,作为永久纪念。呵,还有这一套瓷制的小猫,送给你的女儿,是景德镇的产品。你看看多么可爱!你知道景德镇是我国出产瓷最好的地方,以后你应该去看看,那瓷窑有上千年的历史哩。”

维特克睁大媚人的双眼,惊讶和喜悦使她不断点头微笑。

维特克:“我该如何感谢你哩,江青夫人。我从来未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好客和慷慨的主人。我想世界上都少有。”

江青:“这不算什么,因为我们是朋友啦,长远的朋友。还是一

本伟大作品的合作者，是不是？哈哈哈……”

江青话音刚落，好像又想起什么，眉梢却紧紧皱着。

江青：“你看，那边桌上放着许多书，有《二十四史》，你当然知道的，作为中国问题专家，你应该有这么一套。这是我送给你个人的，不要不好意思，这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。我有的是钱，主席那么多稿费，用都用不完。她们（指着我们几个人）让我送给你们大学图书馆，我一定要送给你个人。还有这本《古诗源》，这本书是我挖掘出来的，要他们重印，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，极为重要。”

江青突然站起身来，转过头指着我说：“不要看她是我的部下，文化大革命前，她跟着四条汉子，是不是黑干将呀？哈哈哈……”

我正感到江青那古怪的变化多端的声音来得突然，于是我也冲口而出：“江青同志，我和谁都只是上下级和工作关系，扯不上什么干将不干将的。”

江青瞪我一眼，转过身来又嘻嘻地对着维特克，边走边用手指着书，一一告诉维特克。维特克时而惊讶，时而赞叹。她好像难以用适当的表情，脸部扭曲似的，忽然变得很难看了。

维特克：“我，我，我……”

江青一把抓着维特克的手，也觉出她脸部表情的变化，更特别显得亲热：“这不算什么，我喜欢你，我认为你将来会成为伟大的作家，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这些书我会告诉他们，给你装好箱子运回美国去。好啦，好啦，现在我们去吃山东饭。你知道，在中国北方，山东菜是最负盛名的。比如说吧，北京烤鸭原来是从山东传过来的，在清宫庭得到皇帝和慈禧太后喜爱，就在北京流传下来了，山东菜也很有特色，与广东菜、上海菜都不一样的。”江青说得头头是道，突然打住，说：“我在这里还有山东厨师啦，我们该入席了。”

8月30日晚饭过后，江青又一次接见维特克，是维特克听了江青数十小时谈话以后，又提出一些问题，希望江青补充或解答的。

江青："你问到关于话剧的前途，它是有前途的，在文化大革命前夕，我不仅搞京剧，也搞话剧。我原来想从话剧入手，后来发现不行。因为各剧院的骨干分子都是30至40年代的人，其中一小撮是国民党特务分子、叛徒。而青年人不会演戏，演得很生硬，现在剧团的人比过去在亭子间时阔气多了，不愿深入工农兵。第二个方面关于是不是要修改中外话剧的问题。得有修改的基础，如豫剧《朝阳沟》是写中间人物的戏，作者没有什么问题，他愿意自己改，现在已经在改了。话剧《杜鹃山》原是上海演的话剧，后来改成京戏。现在话剧作者又在修改。我听说有些话剧正在创作，我还提倡创作新的话剧。所以话剧的前途应该是好的，现在是个领导问题，都是叛徒特务，打倒了。我是提倡先写成话剧，然后改成京剧、舞剧，或者先写成小说，如老的京剧就是由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、《西游记》取材的。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我虽努力帮助他们改过许多话剧，比如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、《雷锋》、《南方来信》、《南海长城》、《万水千山》，多啦，但这批人没有基本功，他们搞了一套舞台腔，不下基本功，人家一听就不行了，又不愿意改，所以要培养新生力量。苏联也是这样，他们的战士写信问：还是那么胖，那么老的歌剧演员吗？我们的创作人员，既无生活又无创作经验，又未掌握这个艺术的规律。青艺把《杜鹃山》那一代的革命者写成叫化子，技术也不行，将一棵树的影子打在天幕上。他们拿着几百元一个月，又不失业又不饿肚子。到五七干校还照样拿工资，不过要向贫下中农学习。经过改造可能出点人才。《南海长城》我也帮助改，从文学

剧本到分镜头剧本都搞了,最后作者不干了,原来是个反革命。还有个戏叫《青年一代》,柯老主持的,我也花了点工夫,但还是先进的超不过落后的,有个电影可以看一看。为话剧我尽的力很多,换的人也很多,总之问题在领导。我们提倡创作新的,但不排斥修改一些有基础的剧目。《平原作战》就综合了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地道战》等特点,我帮着修改,亲自下地道。焦庄户的地道我也去过,现在已经改造过了,以前有些要爬着走,有人劝我别进去了,我还是坚决下去。现在的京剧都可以改成话剧嘛。此外,不是在特殊情况下,不去修改外国剧目。但30年代修改过两个,一个是日本的《婴儿杀害》,改得比他们原来的更革命。另一个是爱尔兰的《锁着你的箱子》,因为那时没有更好的剧本。这两个戏我都主演。我们演的《娜拉》、《钦差大臣》、《大雷雨》没有改。我演主角,表演时超过原来的剧作。其实资产阶级改得最多了。音乐也是这样,不是特殊情况不去改。特殊情况有两种:一是革命年代缺乏新的作品,民歌拿来旧瓶装新酒,甚至很下流的小曲也可以利用,这方面我搞得很多。我不是给你哼过吗?那也是可以改的。革命歌曲也这样,词好就留词,曲好就留曲。《黄河大合唱》曲好,它好的都保留。也有改得不好的,《歌唱祖国》把词改成社会主义的,他自己把词改坏了,曲子是模仿苏联的《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》。文学艺术是很细微的工作,不能掉以轻心。创作是个很难的问题,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没有再过问这个问题……"

维特克:"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?原因是二三十年代用话剧介绍政治内容是比较合适的手段,六七十年代有一定的限制,话剧也不容易,包含着角色的心理关系……"

江青:"苏联有'无冲突论'。我讲话剧有两类:一是不反革命

的,动机好的,可以改好。另一类动机不好,表达隐晦,这就难了。《战斗的青春》作者写来写去尽是叛徒,这次揪出来了。越剧我不敢看,女人演男人,但越剧剧种大。有一次我去看少壮剧团的戏,女人演男人,实在看不下去。越剧没法改了,这个剧种没法要了。有一个现代题材的越剧,女扮男装,穿了军服,系根大皮带,在台上扭来扭去,实在看不下去。有个剧本追了三个版本,作者是谁追不出来,文化大革命中自己跳出来了。总之,有许多剧本作者是好的,但缺乏艺术手腕,这可以改。但有的作者是不好的,他自己也不愿意改。有的根本连作者、作品在群众中一转瞬就消失了,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。我们的国家大,不缺人才,慢慢会出很多。中央是加工厂,不出东西,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算是中央出的,是我指导的,费了好大的劲儿哩。

"关于在中国公开上演外国电影、话剧、芭蕾舞、交响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,也曾有外国交响乐团来演出过。但更多的是内部观摩演出,尤其是电影……"

维特克:"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,我能预计到你会怎样回答。但这些问题是外国人很关心的,如交换问题,也就是文化交流。有些有艺术性的东西,还取决于艺术市场。我并不企图保护美国的制度。"

江青:"当然我们也要进行文化交流的,国际大范围交流,就发生矛盾,这个矛盾主要在我们,我们能拿出多少满足世界革命人民或同情革命人民的作品。它要是艺术的而不是说教的,这有个'盛名之下,其实难符'的问题,我绝不满足自己的工作,总要找点差距。"

维特克:"关于交流问题,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白毛女》舞台剧或电

影,艺术作品美,外国会欣赏,但他们从政治角度理解有困难。

"他们不懂政治和艺术的关系、政治价值、爱国主义精神。但像我这样,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,特别是我在中国呆了六个星期,我可以理解。一般美国人可以把这些作品当娱乐来欣赏,但政治内容不易理解。所以我想写现代中国文艺革命问题,以便使读者有基本理解,略微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。"

江青:"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有共同语言,只要有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,人们是容易接受的。你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来中国访问的时候,我就用《红色娘子军》芭蕾舞剧招待他们,我还亲自陪他们观看,喏,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演出的,他们都非常称赞哩。"

江青谈到这里显得非常的洋洋自得,但在她内心也有许多怨恨和烦恼。1972 年初尼克松总统来华正式访问的时候,外交部在接待计划里没有安排她的活动,当然这是毛主席的意思。最后总算争到一次专场演出《红色娘子军》,江青作主人,听说她为了这次出场穿什么衣服还煞费苦心。平常她爱穿一身军装,显得神气,但陪资产阶级的总统夫人就不那么合适。西装连衣裙,会使自己显得年青漂亮些,但在人民大会堂那样公开场合,又可能会太显眼。最后穿了一套上等料子的浅灰色毛服,她自我感觉庄重大方。她先在贵宾休息室接待美国总统夫妇,谈话很有风趣。这位总统问她如何把电影改为芭蕾舞剧的。在演出过程中,那位夫人常常赞叹演出如何成功,演出如何出色。江青心中当然十分高兴,觉得人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,就是顶讲究礼貌的。但在那期间有另一件事使她十分恼火:她本来要外交部安排一次午宴,由她作主邀请总统夫妇共进午餐,但都没有安排。后来由她自己决定,叫厨师

特别作了五样淮扬小菜，用自己的名义送到总统夫妇的住房去。总统夫妇还给她写了感谢信。接待组还把这件事上了《简报》，使她显得被动了：她这个反资产阶级的旗手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子献殷勤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那几年，国家处于完全封闭状态，所有中外文化交流几乎完全中断了，资、修当然不能进来，国内除了样板戏也没有什么可交流的。江青掌握着文化大权，要在国内外树自己的高大形象，不得不有所开拓。于是在70年代初允许西方交响乐团到中国来演出。大概她想到，交响乐对中国大多数观众来说，不大容易听得懂，即使有毒，对广大无产阶级来说也受毒有限。于是首先有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，不久伦敦交响乐团也来了。接着费城交响乐团也要到中国来，而且由美国最有影响之一的指挥奥曼迪率领。江青指定中央乐团一名指挥和文化部一名干部，专门选择并审查演出节目，反复商议，最后才决定，只能演出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等著名作曲家的古典名曲。法国著名音乐家德彪西的作品，也被认为是什么印象派不能演出。

待到奥曼迪和费城交响乐团到达北京以后，江青突然对演出节目提出异议，非要费城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（田园）。奥曼迪很不高兴，拒绝演出。因为这不是原定的演出节目，没有带来他自己的总谱。争持数日，最后那位中央乐团的指挥只得说明是江青的要求，乐团只得勉强演出。但奥曼迪和许多演奏家对这件事，都表示不愉快，怏怏而去。江青对美国的情况本来就了解很少，但非要表示自己的权威。当江青知道了奥曼迪和费城交响乐园在世界乐坛的地位时，她颇感懊恼，所以这次谈到国际文化交流的问题时，她就无法来吹嘘自己的这件事，于是把话题扯到

体育上去。

江青:“体育交流也是文化范畴的,美乒乓球来中国访问是很重大的事,这你很清楚的。后来你们美国篮球队来华友谊比赛,我亲自去观看了,美国人呀,身材真是高大,那么一跳,手托球就进篮啦。当然,他们的技术也很好,唔,可称得上技术全面。他们吃得也很好吧。我们的队员呀,体质不行。其实呢,对运动员我们也特别爱护,也受优待的。但历史遗留下的,身体素质不能与你们美国人比,交流嘛,我们的球队还是可以学习的。”

维特克女士对体育毫无兴趣,只好随声附和:“江青夫人,你的兴趣真是广泛得很,还抽出宝贵时间去看篮球比赛,我想美国球队队员们会感到非常之荣幸。”

江青:“唉呀,这是文化交流,我应该关心的,这么多年没有交流了,现在再把交流恢复起来,将来会有更多发展的。你能写出这本书,也对交流起到很大作用的……

“告诉你,我呀,不仅看了中美篮球队的比赛,而且在赛完球之后,我还接见了你们的球队,和他们在一起拍了照。我的个子只有他们肩膀那么高,哈哈,真有意思。

“我还告诉你一个秘密,许多人都不知道,美国游泳队来的时候,我没有公开接见他们。但我还是偷偷去看了他们的练习啦。你知道,我很喜欢游泳,我们也有很现代化的体育馆和游泳池。我是在游泳池旁边那间大房子里看的,你知道,那是很大的一面玻璃墙,整个游泳池的一面,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水中的动作,真是美呀,你们的运动员游得真好,姿势很美,速度又快,世界游泳比赛,你们取得许多金牌是不是?”

江青自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后,时常露面,又成了领导人,她就非

常喜欢在为数不多的接待外宾中露面,要在接待计划中插入她的单独活动,诸如接待晚会之类。对美国人更是特别感兴趣。那次美国游泳队来访,她也要出场接见,但接待单位因她的特殊身份没有安排,她大发脾气,只得在游泳池边去看。江青这个人常常骂涉外单位崇洋媚外、投降主义等等,帽子可多啦。其实在骨子里,她才真是洋奴思想十足的人。这次好容易抓到机会,对维特克捧得那么神神乎乎的,就是为了让她写本书来吹捧自己。

在第二天上午,江青为了还要说一些她认为重要的问题,最后一次接见维特克,这是唯一的一次安排在上午 10 时。

江青:"你问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否能避免?不可能,我们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,不仅国内有资产阶级分子,而且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。毛主席 1966 年 7 月给我一封信,其中说到: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(不可能全部)打倒右派。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斗争。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。他的话是英明的预见。去年 9 月林彪自己跳出来了。这封信上还有: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,我们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,很可能是短命的,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的革命人民都不会容忍的。

"至于在没有经过实际锻炼的情况下,新的一代如何经受锻炼?毛主席在这封信上已有预见。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第一次认真的演出。有些市(例如北京市)根深蒂固,一朝覆灭。有的单位(如北大、清华)盘根错节,顷刻瓦解。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,他们失败就越惨,左派就越起劲,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。左、右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吸取到各自的教训。

"去年是我党诞生 50 周年。十次路线斗争,平均五年一次。

王明路线最长，林彪只专政两天半，在庐山会议上，在培养革命的骨干方面来说，是很好的机会，不仅对青年，而且对老年人，只要认识错误，重新站到主席路线上来，人民都会保护。对青年人，今年上半年开了扩大的中央会议，批林整风。各大区的组我都到了，青年人必须学习，否则怎么批林？绝大多数的脑袋不是花岗石的，可以改变。我听了许多青年工人、农民、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的发言，都是好的。藏族、蒙古族都有优秀的女同志。中南组让青年、妇女先讲，讲得很好。上海王洪文很年轻，三十几岁。庐山会议上我们一个组，他跟着我冲锋的，他当过农民，在抗美援朝时打过仗，后来又当过工人，所以培养年轻人不是什么大问题。

“你还问到，关于文物保护问题。我们是保护文物的，文化大革命中还不断有新的出土，例如湖南马王堆的汉墓，2000年了，还保全得好好的，但是文物不能太多。过去东单、西单、东四、西四都有牌楼，因为妨碍交通，容易出事故，所以拆了，党内陈伯达，党外梁思成都反对拆除。他们说，你们到景山看看，北京饭店破坏了北京。我去年才看到，牌楼搬到陶然亭去了，要打掉。所以古董不能太多，要具有历史价值的才要。我们没有破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不仅依靠科学院，还有群众。这次长沙出土文物，靠群众，我们是从无产阶级立场、观点出发来发掘、研究。同时对于古老的文化如昆曲，现在没有人看了，也要保存，还有古曲牌都要发掘，还可以推陈出新，我在《红色娘子军》中运用了一段古典曲调，给南霸天祝寿时用《小开门》，对琼花和洪常青的主调中也用民族古乐器……”

维特克：“我在这一生中，从未在六个星期中学习、了解到这么多东西。对一般文化知识、政治知识和个人了解到这么多。我是

把你当作老师,在我了解中国方面,江青夫人起了很大作用。我为表示感谢,一定要告诉外界你的领导作用和伟大贡献。”

江青:“我想应该说,你是听得最多的,我从未同外国朋友谈这么多话。”

终于维特克女士飞回美国去了。

10. 谈话记录的是非

除了参谋,我们所有陪同维特克女士的人员,于当天下午坐上民航客机回北京。大家好像都松了口气,好容易挨过这恶梦般的几天。在机舱里我们都默默地坐着,而每个人却带着十分复杂的心情,尤其是我自己。当然这种心情多是出于忧国忧民,至于个人倒是像看透了一点什么,反而变得坦然了。忽然我想起培根的一句名言:真理是时间的女儿,而不是权威的女儿。

窗外是棉花般重重叠叠的云层,整个地球都像是被遮盖了似的,而太阳在云层上放射出强烈的光芒,太阳和阳光是永恒的。

陈、小沈和我坐在一排座位上,老陈轻声问道:"我看这件事情没有完啊,江青还要把记录送给维特克女士哩,我包里不是还带着按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吗?"

我随即说:"我看这些记录不能给维特克,到北京向领导汇报后,我们大家都想想办法吧。维特克是回美国去了,我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。还不知道该如何对付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。"

从我个人的职责来说，回到北京后，我首先要向领导汇报在广州的情况，在第二天上办公室后，我就拿上从广州带回来的全份录音记录稿。先向乔副部长汇报，他先还有兴趣听了一点，接着不耐烦了，挥挥手叫我去找王副部长。我把记录稿拿上去王副部长办公室，照样汇报，她说这事谁都管不了，等以后再说，我只得把全份记录稿拿出来，交到她手里。我说这次任务对我来说已经完成，记录稿的事情就请上级处理吧。我退回我的办公室。

9月6日上午，王副部长匆匆跑到我办公室，把我叫出门外，说是首长有命令，要把记录稿赶快整理出来，还要寄给维特克女士，要我继续负责，今天10点在129室大家集中讨论如何整理。我心里立刻涌起极大的反感，对她说："部长同志，你是否看一下那份记录呢？你不能提点意见？我认为这不是件小事，应该向上级反映！"

她说："别罗嗦了。这种事儿我们都管不了，你还是赶紧去集合人吧。"

在一楼那间129室，除礼宾官外，全部到齐，包括那位穿军装的局长。立刻大家就叫嚷开了：

"怎么个整法呀？人家广州不是已经根据录音整理了吗？"

"为什么还要整理记录？维特克自己是作了记录的，没有这样的先例要为她采访整理记录。"

"整理记录的目的何在？为了存档还是干别的用，应该明确，不然我们也不好整。我们只是接待班子，这件事已经结束了，我们还有别的工作哩。"

"如果要送给维特克，那还得翻译成英文，得花多少功夫呵！"

王副部长听着大家七嘴八舌，着了急，提高嗓门说：

“首长秘书刚才来电话,要整理这份记录,我们只能照办。首长指示:第一步要按录音整理,一字不许错,等一会儿我去找几台录音机来,你们两人一组,轮流核对。”

说完转身走了。大家鸦雀无声,每人找把椅子坐下,然后分散在小屋的每个角落,准备核对。

七个人用了整整三天时间,真是弄得头昏脑胀的,好在只要求一字不差核对记录,倒也不太费精神,整日价坐在板凳上,累得慌,最后一天结束时,陈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:“你看,倒是一字不差核对完了,但句不成句,段不成段,东拉西扯,这样的记录算什么玩意儿呢?”

“这是原始记录,我估量有数十万字,要铅印出来,江青要自己审查修改,以后还不定怎么折腾呢。”

这时办公厅一位同志来传话:“刚才首长处陆秘书来电话,说这阵子你们大家辛苦了,今天晚上在钓鱼台请你们全体看美国电影。吃过晚饭在楼前集合,有车送你们去。”

这几个人像是有点神经迟钝似的,相互看看,停顿着不吭声。吃过晚饭,大家先后坐上一辆小面包车,但相互并不交谈,可能是谁也找不出可以谈的好话题。本来到钓鱼台宾馆看电影,对每个人都是高兴的事,也很少有这种幸运,被邀请到那儿去看电影。

看的是美国片《音乐之声》。这部片子是江青向维特克要来的,大家都记得在广州的时候,江青向维特克说过:她导演的样板戏,有些拍成电影,可以送给维特克女士。同时要求维特克女士回赠给她一些好的美国片,还说这也算文化交流。当时维特克对于那些样板戏,并没有表示出多么大的兴趣,但回去以后,很快给江青寄来一部《音乐之声》的新拷贝。那时老陈、小沈表示很不高兴。

堂堂一国"领导人"向人家讨几部电影拷贝,真是有失体统。而江青倒好像觉得,人家什么都应该向她奉献。

面包车驶到钓鱼台东门口停住了。警卫人员拿着名单,挨个点名核对,好大一阵子才放行。进大门驶过一座小石桥,对面的那栋楼就是10号了。时间还早点,天还未黑,小俞、老陈几个人就站在院子里。时值夏末秋初,除了树上还挂着绿叶子,院子里显得有些荒凉,没有什么人行走,地上一片黄土而没有花草。

小俞和老陈呆站了一会儿走过来问道:

"老张,你是常常到这儿来的,是吧?这不是很有名气的宾馆吗?怎么是这个样子呀?"

"原来不是这样的,'文化大革命'以后才变成这样子,这所宾馆刚刚盖好的时候,我曾来参观过,那时虽说是初具规模。管理局长是很能干的,有着美妙的规划:如何种树、栽花点草,还有荷花池哩。那时大概已编到12号楼了。每幢楼都按照一定的特点来装饰。据说这里原来是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领导人来开会、休养用的,所以是按照不同的生活习惯来布置的,使客人来了有宾至如归的感受。所以色彩、样式和室内陈设都各自不同。"

我对她俩说着说着,也发呆了。我想起"文化大革命"开始后,为了接待一起国宾,我曾在这里住过一阵子。那时钓鱼台已经分成两半:从北门进来有几幢楼,偶尔也接待外宾,从东门过来呢,已经成为江青、姚文元他们的住宅了。所以我们刚过来的那座石桥成为界限。这边时时都有双岗和流动岗,谁也不能越过这座桥,这一半成为禁区。这次我们来到这里,还是第一次越过禁区。

记得那一年,为了接待外宾,要稍为装饰一下北区的楼,可真把人给急坏了。本来每幢楼前,都有一块小小的花圃,圆的、方的,

也有五角形的。花圃中都种上芍药花、月季花、牡丹花。即使在秋天，也种上并不名贵的秋菊、串红来点缀。这些年这些楼前的花圃里，长着稀稀拉拉的菠菜，也没有人去耕耘施肥，土地龟裂成片片碎块，菠菜像头上长的芥疮。树枝没有修剪，枝桠乱长。有些楼前花圃里种着玉米，梗叶都变黄了，可见不到一颗玉米棒子。那时，我们看到这种情况都愣在那里。后来只得把那位进驻的解放军军官领导找来商议。

他说：你们应该知道，种些花花草草嘛，那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，我们不能荒废一寸土地，所以种上蔬菜和粮食，这是上边的指示，以后一律不许种花草，最多只能种果树。所以那时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有一位女同志倒也爽快，对那位军官同志说：我们中国地大物博，也不缺少这两方块小地方来种菜种粮食，是吧？这里是宾馆，要美化一点，你看怎么办呢？

那位军官倒蛮痛快地说：今年菠菜粮食都没有长好，我看就统统铲掉吧。可是你们要花花草草的，却是没有，你们看着办。

当天下午，一个班的战士，跑步来到，不费半个时辰，两个花圃变成两片黄土……

我站在那里呆呆地想着以前那情景，又忽然想到在广州的时候，江青的住处鸟语花香的情景，还有那世外桃源一般的兰圃。

天色已近黄昏，副官来到门外，招呼大家进去看电影。对这幢10号楼，人人都感到是陌生的。进门向右拐个弯，是一间可容纳二三百人的放映厅，摆设着有扶手的沙发椅，对面有宽银幕，后边有专设的放映室，室内灯光很暗，江青的声音传了过来：

“这几天你们都辛苦哩，你们部长告诉我，记录初稿已整理完

了。今晚请你们看《音乐之声》,这是维特克女士刚从美国寄来的。我用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记录片和她交换的。你们都没有看过吧?我已经看了几遍,今晚请你们看,改天还请你们去江苏厅吃一顿,算我慰劳大家。"

江青没有站起身来,大家也就原地向她点头为礼。江青一般不轻易和别人握手,是怕传染病。她坐在大厅中间靠左的一张椅子上,这会儿大家才看清楚,她坐的是一张大靠背沙发,脚下还垫着软软的小长凳,腿上盖着一条绿色毛巾被,右边茶几上放着带盖茶杯,还有一个小瓷碟上放着一些白色小毛巾,看样子她确实非常舒适地在享受、在欣赏,几位女同志就近坐下来。

又听得江青叫道:"小徐,你坐到我旁边来,再好好给我译一遍,前几次呀,那些个翻译就是不行。你给我一句一句地译,这样才可以仔细分析,不过,这总是部好片子。"江青看戏看电影,好随时发表议论,这晚大概和以往不大一样,因为其他的观众都离她颇远,没有人在她左右应声附和,她便自己哼着电影中的插曲。

10月末的一个星期二下午。王副部长又找到我的办公室来,把我叫到走廊,又神秘又夸张地说:

"首长把你们整理的记录都看过了,大发脾气,说是整理得不像样子,你们是怎么搞的嘛。"

"我不是把广州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原记录送给你看了吗?而我们又一字不差地核对过一遍,连一个字都不差,这你很清楚呀。她的谈话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,一字不改就是这样,能怪谁呀。"

"别的事我也管不了。我是来告诉你,今晚6点你和徐到首长那儿去,该怎么办,你去听她的,而且首长吩咐,这件工作还得保密。"我听完这话又气又恼,感到奇怪,这件事部里怎么就没人管?

从广州回来我向几位副部长都汇报了,现在还要去整理那记录。没法子我回到办公室,没过10分钟,徐就找来了。

大食堂是6点钟才开饭,去钓鱼台至少得走30分钟。我们两人到食堂,还没到开饭时间,只得各买了一个馒头,夹上一分钱咸菜,放进小饭盒。然后直奔钓鱼台江青办公室。

原来江青办公室就在那幢10号楼里。副官把我们引进一间长长的房间,有一扇小门通往电影厅。这间办公室也像会议厅,四边靠墙放满小沙发椅子,大大的长方桌上放着文具。有一大把修好的各色铅笔,一大堆白纸,长桌当中有一把高背大靠椅。副官告诉我们,首长过一会就来,让我们坐在那里等候,我们看看室内那座立地式大钟,已是6点20分了。几乎同时,我们从手提布包里拿出馒头和咸菜来。我咬了一口觉得馒头有点干,走出房间想找一杯开水,正好遇见一位穿着整齐的女服务员,她很和气又有礼貌。

"唉呀,你们还没有吃饭就来了?快坐下我给你端杯茶来。"我道了谢又把徐也叫出来,坐在走廊的沙发上,有杯热茶,吃起馒头就舒服多了。服务员同志对我们说:

"首长要7点过后才来的,你们应该吃过饭再来,说不定还要坐过半夜哩,你们是来办事的吧?首长晚上办公。"

"传话要我们6点到这儿,食堂还没有开饭哩,谁敢迟到呀。"徐一边嚼着冷馒头一边说。

一直等过了7点,还没有听见一点动静。我们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散步,也无什么话可谈,毫无目的地走近大门,忽见有间屋子,灯光特别亮。我们好奇地走了进去,原来是一间设备齐全的治牙诊室,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,正在整理着什么,大概听到有

声音，转过身来打个照面。我好奇怪地叫了声：

“张大夫，原来是你呀？诊室怎么搬到这儿来啦？”

“你又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有什么特殊任务吧？我这个大夫呀，这叫随传随到！”他苦笑着说。

我和这位张大夫早就认识，彼此还了解，但交往不多。在这种场合相遇，都感到有一些惊奇，又不想多说什么。

正在这时，大办公室里有响声了，不止一个人走进那里，我和徐很快走出来，听见副官向江青报告：

“外交部两个女同志和张大夫都在等候。”

“叫她们两个进来。”我们已走近她身旁了。

江青：“你们都坐下。整理的记录我看过了，不行。完全照录音，有些地方就不通顺啦，得重新整理，我亲自修改。你们不懂，把张局长也请来，他可以出主意修改，你们作记录好了。你们印的稿子都带来了吗？你们坐在这儿等一下。”

我们从手提包里把已经铅印好的第一本记录稿拿出来放在桌上，坐着等候。突然隔壁传来一声尖叫声。

“张大夫，怎么搞的嘛，我受不了。”这是江青的声音。她正在那间特为她搬来的诊室治牙哩。

“首长同志，请您忍耐一点，这又不疼，而且只要一两分钟就好了。”张大夫说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我的神经受不了，你那些个机器发出怪声，太刺激。算了，我不治了。”

沉默。又过了一小会儿。

“嘻嘻，哈哈，对不起张大夫，我不是怪你。就算是我的毛病吧，咱们慢慢来好不好？每天磨一丁点儿，你可是得在这里等着，

哈哈。”

江青飘然进来,往那张大靠背椅一坐,脸死板着:“副官,给张局长打过电话没有? 该来了吧。”

“报告首长,没有找到张局长本人,已经传话去找,一会儿就到。”

江青抬起左手看看表,没说话。室内那座落地大钟敲了8下。这时女服务员端着一个不小的托盘进来,放在江青面前,这是给江青送来的晚饭。

我和徐坐在江青对面,我们对她的晚饭有点好奇地注视着:托盘里,除了碗、筷和碟子之外,放着六七个青花带盖的细瓷罐,江青把盖子打开,原来是一个较深的碟子盛着各种菜:蒸鱼、肉丸子、青菜、豆腐,还有鸡汤等等,瓷罐装着滚热的水,这样菜拿上来就可以保持温度,不会凉,我正感到看别人吃饭怪没礼貌的,正要起身走开,这反倒引起了江青的注意,立刻把我们两人叫住:“你们坐着吧,我吃我的,咳咳,你们懂吗? 饮食营养治疗,比什么药物都重要。我要保持固定的体重,不能发胖,还要保证有足够的营养价值的食品,我可不要大夫来干涉,我比他们懂得多,要听他们的呀,那就什么也别吃了,没意思。”她总是那样旁若无人,这已成习惯了,不在乎别人看她的吃相和高谈阔论。徐用手推了我一下,什么也没说。

张局长终于来到,江青脸上显得高兴起来,也没有再提谁把记录弄得不像样子了。

江青:“老张,还是得把你请来,因为你是我的参谋,关于记录的事,还得请你来办,你知道,她们都不懂战争,而第一次谈的就是西北战场,没有你怎么行。”

“首长，核对录音的时候，我也参加了的，初稿校对，一字不差，但是还得修改，特别是文字润色。您的命令，我从来都执行。”

“那太好啦，那就不光是西北战场了，全部记录修改，你都来参加，我已经对她们两个说过了，我们修改，她们作记录，这样会比较快一些。”

这时张局长才看见我们坐在对面一个角落。他不无歉意地走过来和我们握握手，好像也感到江青说话太不客气，赶紧接着说：

“首长同志，我们一起修改，一起修改。唉唉，在文字润色方面，她们比我强，今晚我们先试试看，您看可以吧？”

我当时心里觉得好笑，难道这还是什么好差事么？我早已烦透了。

在座四人，各人手里拿着一本铅印好的记录稿，开始修改记录。徐一句句念，江青手里拿着铅笔，在那份记录稿上圈点划线，不时停下来和那位局长议论一番，如何把段落改得合理，情节写得清楚。常常是张建议如何如何，征求江青的意见，江青拍板之后，叫我在那份记录稿上改过来。这样倒也使得我们两人感到轻松些，可以不用脑子。江青要改这，要改那，照改就是了。可是用这个方法修改数十万字，也真是够受的。直到午夜时分，还没有改出几页来。突然江青叫停止，她站起身来，伸伸腰腿：“唉呀，都过 12 点啦。”她在椅子扶手上按铃，随即进来一位女服务员。江青吩咐：“带她们两个到大食堂吃夜餐。”正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个服务员端着的一个长盘进来，把江青的夜宵摆到她的面前。

这座大院子，真是变得太荒凉了：草高树乱，阵风吹过，只听到簌簌之声。这时午夜已过，两旁路灯，发出一点点暗黄色的光，我们两个出得门来，长嘘了一口气，只见满天星斗，镶在蓝色的夜空

上,像宝石一样,闪闪发光,这是多么好的深夜呵,空气十分清新,但有谁会在这样的时刻来欣赏秋色呢!秋色倒显出那份悲凉、惨淡。我倒是好些年来没有这种感觉了,充满在感情中的是空虚、惆怅、失望……一路上我们没有谈一句话,机械地跟着前边的人走,过了石桥拐了弯,进入另一幢建筑物,到了大食堂。虽然已是深夜,但还有人声。我们各领了一碗汤和一个芝麻烧饼。那位服务员在另一桌坐下,跟她的熟人聊天去了。

过一会儿,服务员又带着我们原路返回。这位服务员就是刚才给我们端茶的,边走边说起话来:

"你们是有特殊任务才来的吧?从未见过面。你们不知道,首长吃完夜宵,还要运动和休息,你们先在外边透透气吧。"徐接着说:"都快两点了,你们首长什么时候才睡觉呢?"

"难说,最早也得4点吧。她晚上办公,白天睡觉。我是小夜班,把你们带回去,我就该下班了。我带你们去看看首长运动的地方。"

我轻声说:"服务员同志,首长没叫我们去,怕不方便吧?"

"没有关系的,来过这里的人都去,不要紧。"我们从10号楼的旁门进去,经过一间陈设考究的大房子,桌上摆着小盆景,长条桌上放着一个较大的玻璃缸,里面养着各色热带鱼。服务员介绍,这是首长打桥牌的所在。穿过这间房子,走到一处比较宽阔的地方,灯光很亮,四周站着20来个人。我们二人远远站在角落处。江青和小陆秘书正打乒乓球,有服务员为他们捡球,还有人在旁边叫好助兴。我四周看看,没有一个认得的人。这地方像是从房间伸延出来的一片平地,已装上屋顶和特别的灯光,但三面没有墙,可以看见外边的大树,大概是专门为江青运动而修建的吧。

大家走散了，江青却兴冲冲地走过来，发现我们二人站在角落里。

江青："嘻嘻，你们也出来了，这里多好，说室内吧，可和外边通着，所以呀，空气流通，对我运动最合适啦。来，来，我领你们看看我的小菜园。"她领着我们走进一间不算太大的没有房顶的屋子，里面果然种着西红柿、茄子、豆角、菠菜什么的。

江青："你们知道吗？这就是我的实验田。你们看，冬天在顶上装好玻璃就变为暖房，我还种各样蔬菜吃，以后分送给你们吃。在这里呀，我可不种花。"

江青走进内室，我们两人就回到那间大办公室坐着。只有张局长一人，独自在看那份西北战场的记录稿。过了好长一阵子，江青才慢慢走进来。她先到门口那个红木大镜子前，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木梳，不断梳她那一头乌黑的头发，然后走近那张大靠背椅子坐下，打哈欠了："唉呀都快天亮了吧？这一天可是真累了。"

她忽然看见张局长自个儿在看那份记录，高兴起来："哎，我说老伙伴，这份记录呀，请你先整理一遍，我们再一起来修改，好不好？这样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了。我忙，维特克女士还等着这些记录写书哩。"

张局长点头表示照办。江青又对我们说：

"你们随时听候招呼，随传随到，今晚就散了吧。"

张局长很客气，用他的汽车把我们送回家。

三天之后，我们又被召到10号楼，张局长已经坐在那里了，9点多钟江青才到。仍然是他们两人商议，我们两人做记录，这一次可是顺利得多了。因为张局长已经改过一遍，把段落整理清楚了，但内容太复杂，还是很难弄懂。不过江青表示很满意，只作了些文

字上的修改,或者江青提出某些地名要核对,或者哪些人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记录稿上等等,到1点多钟,这篇西北战场部分的记录就完成了。江青十分高兴地说:"小张,这部分记录今晚就算定稿了,你带回去交给外交部,铅印10份,编号留底,送给张春桥、姚文元各一份请他们审阅。周总理那份我要亲自送去,外交部就给乔副部长一份吧。小徐,这份稿子不会有多大修改了,你可以着手翻译成英文,你就定稿吧,反正是送给维特克女士参考用的。都记住了吧?"我们俩点头收拾东西,正要走出门去,江青又把我们叫回来,吩咐说:"小张,我看张局长先整理一遍的办法很好,有一些个别部分你也可以照他的办法,把容易整理的先修改一遍,整理出来,比如关于《红楼梦》的部分,你可以先整理,把故事情节、时间顺序、诗词等等都与原书核对清楚。还有关于上海文艺那些,都可以先整理,这样我修改起来就省时间多了。"

自从广州回来,我和徐经常加班,为这份记录折腾得够苦的。因为下令要保密,又不许带回家,在办公室里吧,日常工作还得干,只有当大家下班以后,两人才能凑在一起干,也可以互相解解心中的闷气。

"江青和维特克的事,既登了报又上了电视,还要保密,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。"徐说。

"会见是公开的,但谈了些什么,别人可是不知道。其实所谓保密,也是掩耳盗铃。这倒好,我现在只能在办公室改她那份《红楼梦》,办公室那么多人谁不知道?大家都不愿意问就是了。"

"我们那里可是不一样,谁都有兴趣打听。我在翻译的时候,常常和小沈商量,有些英文底稿,不少人都看过了。"

"我每天下班后,就得从办公桌的抽屉里,拿出你为我借来的

那套《红楼梦》,已经包上书皮了,真够滑稽吧,在这种时候,我居然在办公室里看《红楼梦》,而且当时她谈的也真够呛,前后秩序全乱套,人物张冠李戴,真烦死人!"

"谁不心烦,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差事。这些记录还要送给周总理审阅,真是活见鬼!周总理那样忙,还得为她看这些东西!"

"是啊,我是先到广州的,她的谈话经过谁批准吗?你忘了,江青和维特克谈话的时候,多次提过,说是记录都要送给周总理审查,到底怎么回事?"

"我们出发前一晚上,周总理找大家开过会,根本就不知道她要谈什么,周总理还规定她只能谈文艺问题,江青根本置之不理,还大发脾气。她倒好,当着维特克口口声声说要经过中央批准,周总理审查,这可以提高她的身份,同时也可以证明她的谈话的分量呵。"

"我说老张,从广州回来以后,你还没有向周总理汇报过吧?既然部领导不敢说话,你应该向周总理汇报,如果一点不向上级反映,那倒不对了。你去见总理也不是难事嘛,我想甚至可以反映我们大家的意见。"徐这么说。

那些天我脑子也老在琢磨,既然我向部里几位副部长都汇报过了,他们也确实有为难之处,江青的事谁也不敢过问,应该让总理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,向周总理汇报。而我去找周总理也不一定是很正式的汇报。这几年我也是常常去的,有时就是聊聊天,而周总理也喜欢知道一些具体的情况。那天晚上我反复想来,找周总理谈一次是应该的。也许别的同志也已向他汇报过情况,但我了解的要具体得多,反映一下也是负责的态度。我也知道周总理极忙,试试看吧。于是我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,请秘书转达,

我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。

那天晚上我难以入眠。这几天我在办公室里不断翻阅那套借来的《红楼梦》,一面是心烦江青那些谈话,听起来像是头头是道,但拉扯到许多章节回目,故事也是乱糟糟的,张冠李戴,还引用不少诗词,颠倒错误,都得替她核对清楚。同时想到我家里连这么一套书都没有,否则回到家来再翻翻也省事些。在办公室那套《红楼梦》是费了许多口舌才从北京图书馆借出来的,还挨了人家一顿训斥。我想起家里本来藏书不少,我是个喜欢买书的人,解放前不说,自打1949年后,重新出版的古今中外许多名著、论著都买了,每月发工资下来,除了吃穿,几乎都用在买书上了。虽说自己没有读许多,但有时间常常翻阅浏览一下,也是极大的乐趣和享受。可是自打"文化大革命"开始,江青、林彪那些人,也不知怎么会想得出来,什么砸四旧,大批封、资、修,煽动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,到处乱砸乱抢。知识分子家庭几乎毫无例外地遭到无情扫荡。就在1967年春天,那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"革命小将"——其实有不少是几十岁的人了,来到我们的宿舍。我们家是被勒令驱逐的,"革命派"说是来帮助搬家,可是进得门来,就大声嚷嚷:"哼哼,这真是封、资、修的大本营呀,有这么多大柜的书,他妈的没有一本好的,还有比修正主义还修的洋唱片,还收集这么多古董烂花瓶……"七嘴八舌就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拽,把全部书籍丢在院子里,我坐在门口台阶上发呆,也没去收拾,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群孩子,把他们认为好玩的东西拿走,堆积如山的书乱踢乱翻。我们从五间一套的大单元搬到两小间里。好在家俱不多,把所有的床放进一间房内,我也懒得去管,躺下闭目胡想,脑子一下也转不过味儿来:我们都是真心拥护"文化大革命"的呀,反封、资、修没什么不好,但什么才

算封、资、修呢？封、资、修也可借鉴呀，看书有罪，书也有罪么？真是闭着眼想不通，睁开眼我还是想不通。

过一会儿，另一间屋子也有了人声，大概是两个大些的孩子带着一群小朋友，用推车把书和一些杂物拉过来。一直躺到天黑，才想起来应该为孩子做点吃的。那阵子天天煮挂面，打两个鸡蛋，倒也省事。走到另一间屋子一看，满地都是书，平整地堆在那里，总有两三尺高，这下倒真发起愁来，孩子们都睡在那儿呢？有一个提议，哎，把被褥放在书堆上睡吧，比板床舒服多了。

好几天过去了，真是一筹莫展，先是让大孩子找一家收旧书的书店，问书店要不要，如要全部赠送。那些书店的负责人说：最近书太多没处放了，不能再收，卖废纸吧。那几天在我家原住的大院子外，真是不断有拉着大车来收废纸的。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，旧报纸杂志、书籍一车一车拉走。星期日不用去挨批斗了，我回到那院子来，许多人排队卖“废纸”。我走近去轻声问那个中年男子，请他抽空去看看我的书，如果要呢，全部送给他，拉走就行。等到他们收摊的时候，我领他到自己房里来，把堆着的书指给他看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：“我说同志，你这里有不少好书，为啥都不要了呢？你看这套书是绝版了的呀……”

“我是喜欢买书，但并不曾都看过，我现在满脑子封、资、修，就是中了这些毒呵，我发誓以后什么书都不买都不读了。”当时我心中一阵苦涩，也真想不到会遇到这么一位懂得书的价值，而收买废纸破烂的人。

“当然毛选、小红书、马列书我还得留下一些的。”

“还是留着吧，这阵风过去不就行啦，真是的，人睡在书堆上，这是怎么整的。你挑好的留下，余剩的明儿个我来拉走。”

我默然坐在书堆旁翻了许久，随手捡起《克利斯朵夫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等几本小说放在被子下面，倒不是认为这些书贵重，为了发闷时翻翻而已。

第二天那位男同志拉来两辆大车，还有几个伙伴，把书搬了出来，堆满两大车。临走时又走到我跟前，递给一沓人民币，也不知是多少。我执意不要，他又是劝又是为难："同志，我们不能白拿，就算五分钱卖一斤废纸，你这些书也不只这个数呵。"他把钱放在桌上就走了。

当时我真想痛哭一场，知识、文化宝贵财富全都成了垃圾，当废纸回炉去了。真是难以理解，"文化大革命"就是要毁灭文化？那几年几乎所有图书馆都把所有的书都封存了。每当我翻开那套《红楼梦》就茫然若失：难道说人类宝贵的知识财富，就让江青那些人独霸了？那时江青虽多次向红卫兵作报告，批这批那，什么都成了封、资、修，无人敢看敢说，但几年过去了，其实人们心中都能逐渐分辨清楚，真理到底在哪儿，谁是谁非不是都很清楚吗，就是没地方说理去罢。

11.周总理与《谈话记录》

周总理秘书让我第二天下午4点去西花厅。我一直在考虑，如何用最短的时间，又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，向周总理汇报得全面些。我知道这样的时间是周总理挤出来的，不可能长。当我走进西花厅时，周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，见我进来才把花镜拿下来。他先问我："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？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。你想有什么重要的情况，就先说说吧。"这一来我倒抓瞎了，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我说："如果要简单，那还真说不清楚。我们去广州前，总理的交代，我都转达了。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。她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，什么内容都有。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，翻成英文，寄给维特克。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。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……"我上气不接下气，一连串说下来，倒惹得总理笑起来：

"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，别那么急。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。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，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。以后找时间再谈。"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，我随即走进那客

厅。邓大姐见是我,就问道:"你们从广州回来啦,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。你慢慢说,我来听,恩来太忙了,但江青的事,他还得管。没办法啊。"

我和邓大姐很熟,所以谈起话来,也没有什么顾虑,说错了她会指正我的。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3个小时。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,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。但她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。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,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,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,胡乱吹牛。比如说到西北战场,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,这些传到外国去,不成了大笑话吗?她还谈到抗美援朝,五次大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,有一次彭德怀不听毛主席的就吃了败仗。又根本不提朝鲜人民军,还要把朝鲜作战地图送给维特克……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,不时还问几句。我又告诉邓大姐:"现在江青又要我们整理记录,准备送给维特克。她自己列了10个大题目。而在谈话中还常常说,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,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。……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,他们都说他们也管不了。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,还是应该来向周总理汇报。最重要的是,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,这影响确实太坏了。"邓大姐听完后,也表示不能如此,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。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了。

没过几天一个下午,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。外交部不少同志参加了,我也在坐。周总理开这样的会,是听听各方面的同志有什么意见。会议比较随便,但是大家还是聚精会神,因为周总理记性特别好,外交部许多同志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,倘若你一时走了神,他叫着你问什么问题,答不上来,那就太不好看

了。那天我坐在最后排一个角落里，反正我只要听着什么事该我回去办就行了。会议倒也开得简单，很快结束了。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，并向我招手。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，这就是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了，一张大桌子就把房间几乎占了一半，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办的文件。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我们整理过的铅印好的江青谈话记录稿"西北战场"部分，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。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。周总理说："那天我实在忙，没有听你的汇报。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，现在你和徐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？"我点点头，接着说："除了我和徐还有那位张局长，他说比我们早到好几天，那些地图和材料是他预备的。"

周总理"啊"一声说："他也在广州吗？现在也一起在整理记录？"

"关于西北战场这部分，是张局长先整理，又和江青同志一起修改，我和徐作记录，记他们商量好的定稿。"我回答。这时周总理的双眉拧在一块，估计周总理并不知道张局长去广州的事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，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

"周总理，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，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，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，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。江青同志的谈话，内容很庞杂，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，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。"

"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？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，不给不好吧？"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，态度凝重，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。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着一个下级同志，也只能这么说。

"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的,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,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,她要写文章,材料是足够的。"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,说完后就悄悄地退了出来。

又是一个夜晚,在10号楼,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,一字未改退了回来,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"已阅"两个字。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,上面写了一行字,大意是,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,错字都已经改过。我心想,周总理看过的,连错字都改了,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,这两人既是不愿意得罪江青,又不愿负责,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。

当年11月间,维特克女士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。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导江青的文章,准备登载在美国《时代》杂志上,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。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,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,以便她着手写书。江青收到照片之后高兴极了,把维特克寄来的以及原有的不少照片,摆在钓鱼台她那张大大的长方形办公桌上,反复仔细地自我欣赏,挑来挑去下不了决心。于是打电话到外交部,把我们当时在场几个人,用一辆面包车拉到钓鱼台10号楼去。这时江青正十分专注地看自己的照片,直至我们一群人走进办公室来,江青才抬起头说:

"好呀,你们快来看看这些照片,这是维特克女士寄来的。我觉得坐在栏杆上的半身像不错,当然还是不如我自己拍的那些色彩好。"我们分成三三两两在看那些照片,但谁的兴致都不高。江青拿着那张半身的照片,先问徐和小沈:

"你们看看,这张不错吧,有点侧着身子,光线还可以,就是色彩淡了些。"小沈和徐也就点头微笑。江青又叫:

“小张,你学过点美学吧? 你看是否把照片裁短些会更好看?”江青用厚纸盖着下端,上下比试,我走过去看了看说:“裁短就没有手了。”江青又上下比试好一会儿,吩咐小沈给维特克女士写回信。江青兴奋好一阵子,但以后谁也没有看到《时代》杂志有江青的照片用来作封面。

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。

某日下午,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,专门讨论维特克女士与江青谈话的记录如何处理问题,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女士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。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。绝大多数同志表示,这份记录无需送给维特克女士,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。而维特克女士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,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、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。而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,涉及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,倘若要逐一核实,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。而且江青谈话内容中,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。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。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,他都作仔细思考,并广泛听取意见,尽可能做得完善些。会议结束前他说:“对这件事情,你们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,这很好。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,还需要商量和请示。”他对我和徐二人说:“你们继续去作记录,根据江青同志的要求整理和修改。”

又一天晚上,我和徐又来到 10 号楼,继续修改记录稿。已经接近完成了,12 点已过,我们到大食堂吃过夜宵回到江青办公室。她正在打电话,声音还顶大的:

“我的那些个记录,一本一本都给你送去了,怎么不快替我看呀?”

“关于这些记录,我正想找你商量,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,已经

送给维特克女士了。最近送来这些,过于庞杂,涉及面很广,一时也难予核对,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?"

江青:"这怎么可以,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。我答应过人家,就得给。"她想做什么像是谁也阻止不了似的。

"维特克女士是当面采访的,又作了记录,她要写什么,完全是自由的,她是作家嘛,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。"

江青又立时换了个腔调:"总理呀,你就替我审查吧,不给维特克,那可不行,唉呀,我看到你桌上堆的那些个文件,我真替你累得慌。不过那些个记录,你还是得替我审查。"

"如果我抽得出时间就看,你也好好考虑一下,把记录送出去的利弊你也该想想。"

"一定要给,我不能失信于人,就得这么办。"江青又变了调,横不讲理。

"第一部分我已经看完了,又改了些,可以翻译,春桥、文元两同志,你也请他们改改。"

"哼,他们呀,就只划了个圈。我说总理呀,不送给维特克我可不答应。"

江青把电话放下,一脸怒色,眼睛都不往这边瞧,我们都默默地坐着。

江青吃过夜宵,好一阵才平静下来,拿起一本记录在翻看。这本记录中是谈她和毛主席生活的。当她与维特克谈的时候,有这样几段:

江青:"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,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,那是假的,王明捏造的。当时是有人反对,项英就反对,他甚至打了个电报,那时还不知道,他是个叛徒。他给毛主席打了

电报，毛主席也给他回电说，我学孙中山。

“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更大了，约30岁。实际上贺子珍只比我大两岁。是她要求离婚的。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。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。其实在中央苏区时，她和毛主席已经分居一年半了。非常固执，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，不关心毛主席。”

维特克：“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？”

江青：“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，她马上就要进去，毛主席不愿意。她自己的家是地主，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。当时毛主席不知道。她家开了个茶叶店。我不太清楚，我也不问毛主席。你书里不要写这些。”维特克点头。

江青：“她什么工作都不做，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，这是很大矛盾。另外生了孩子她不要，给老百姓，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，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……”

整理记录稿时我将以上几段的对话删掉了，徐正读着，江青突然问道：“哎，怎么这部分少了些内容？小张，是你先看过的吗？”我点点头。

江青声色俱厉：“怎么？是你改了？谁让你改的？”

“我没有改，我删去一些。”我直直地望着江青的眼睛，倒使江青一怔，她接着追问：“你胆子不小呀，哼哼，你居然敢删我的记录？说说什么理由？”

“那些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我认为不提为好，何况你用那种语气来谈另一个同志，不大适宜。”其实我是出于某种责任感，已经许多没有人再提这些事了，又何必再引起新的麻烦呢。所以才删一点过分的小节。我本已想到，会引起江青的怒火，但在广州时

已经历过了,怕也无用。她对我已恨在心头。

江青发火了:"有什么不适宜?"

"和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和身份都不适宜。"

江青在室内踱着步,右手拿着支铅笔敲打自己的左手,喃喃自语:"唔唔,我现在的地位和身份……自己这么说是有点不大好。"然后冲着我说:"这些内容是不能没有的,我和主席结婚是光明正大的。我不能是第三者。"她来回走动,恶狠狠地突然对我说:

"小张,这段话改为你的语气由你说,我想是可以的。"我真没想到,江青会想出这样的绝招,一时有点呆住了。

那座大钟嘀嗒嘀嗒的声音,显得特别响,一下一下像击打着我的心。"我不同意,这又不是我说的话,怎么可以变成我说的呢?"我平静而坚定地说。

江青:"反正要这样的内容,谁说都一样。这对你也无害嘛。"

"我在延安的时候,还是个学生,也不可能知道这么些事呀。还是删掉算了。"

江青顿时狂怒,拍桌子大骂起来:

"好呀,张颖,你就是不听我的,告诉你,这可不是小事。这是站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问题。你不和我站到一边,就是站到相反的一边,你想想看,会有什么结果……"我看到江青发火,也不止一次了,虽然都是横不讲理,但不像这次狂怒,而且扯到革命反革命的高度。我想这股火也不是单冲我来。我瞪着眼,无话可话。室内空气十分紧张。

"老张同志,你是首长的学生,这些事情嘛 是可以说的。难道在延安的时候,你没有听说过吗? 何必让首长发那么大的脾气哩。"那位局长想缓和一下僵持的局面,慢声细气这么说。我一闪

念，可有了救星，立刻接着说：

“对了，局长同志，你来说这段话比我合适得多，就写在你的名下吧。我是学生，不好谈论这些，而你是江青同志的战友，分量就大不一样了。”张局长一听发了呆。

第二天，我觉得精疲力尽，请假在家休息。傍晚时分，忽然听到敲门声，好熟的面孔，一时竟认不出是谁了。

“你不认识我了？”客人说。

“是你呀，阿晨。”我走向前紧紧抱着她。阿晨的泪水簌簌下流，直至痛哭。

阿晨是郑君里的妻子，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，虽然分住在北京和上海，还是常常见面的。但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，这些朋友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尤其是文艺界知名人士，全都成了牛鬼蛇神，彼此也不能通什么消息，只能从各种传言或那时特有的小报上，知道一点彼此的消息。我看着阿晨，这几年她变得如此衰老，消瘦，满脸皱纹，头发花白，不禁悲从中来：

“上海的同志们都怎么样？君里呢？”

阿晨好容易镇定下来：“在劫难逃啊，一个也饶不过。唉，君里君里……他”又悲痛起来。我倒来一杯水，劝她安静休息一下。

“死了的，也许你已听说了。活着的都在受罪。君里真冤枉，五年前就被抓走了。开始时被隔离在厂子里，有一天深夜，也弄不清是谁，既不像官的又不像红卫兵，闯进了我们家，到处乱翻，什么都折腾了，最后把所有照片，所有写过字的纸条统统拿走，把能砸的都通通砸碎，留下一间小屋子让我睡，其余的房子通通上了封条。六九年初小儿子去探望过，才知道已经被关进监狱。

“哪里去问？哪里去找呵，整整三年没有消息。前两个月，忽

然叫我去探视,那就是监狱医院吧。唉!白单子把全身盖着,简直像死人了,只剩下一丝游气,他告诉我,是为了那张结婚照片……"

阿晨饮泣。

"那就是君里、阿丹我们四对,在杭州时一起照的像片。几十年了,谁还留着这些东西啊,而江青就为这些,要把君里他们都置于死地……我好不容易来到北京,看看朋友们,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,给君里治治病,不然太惨了……"我们两人互相拉着手,默然相对,各自流泪。又有什么办法呢?

1972年的岁末,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,开了一个简单的会。周总理只简单宣布:已经请示毛主席,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,一切工作都停止,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,一份归入档案。

于是第二天,我和小徐、小俞把所有的记录(仅是在北京的)草稿、铅印修改稿等等,全部归总在一起,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。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,上锁加封条,交给外交部保密室。

12、旁听审判江青

1973年秋末，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。这里已经远离那混浊又令人窒息的北京城。但我们都是人在外，而心里总装着祖国，时时关心着那里发生了什么。就在那一年底，北京在大张旗鼓地搞起一个新的运动高潮，那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。虽然国内的消息都被封锁，但时常还会传来各种信息。江青一伙想要彻底摧毁我们国家的基础，她真想登上女皇宝座了。

在岁末年初之际，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，团长是老同事老朋友了，他把国内的情况告诉我们：这次批孔批大儒是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发起全面攻势了，并且开了万人大会，炮轰大儒，国内又乱起来了。但江青的做法不得人心。对她的不满和闲言也顶多的，攻势也弱了下去。又说现在国内正闹着《红都女皇》，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。又说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，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什么的。

我被这位国内来的同志谈话中的许多事情都弄得糊里糊涂

的。他问我《红都女皇》是怎么回事。我告诉他，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，可能是一个女华人写的，吹捧江青，说江青将要成为一个女皇了。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。维特克是个美国人，她采访江青以后要写的书，还没有写出来哩。他又告诉我，国内盛传毛主席批评了江青，这恐怕是确有其事的，但现在国内也真在追查谣言，说那个美国人采访江青就是谣言。我说这不是谣言，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新华社和《人民日报》都登载过的，而且当时我也在座，这都是事实，怎么会成为谣言呢。

1974年秋末，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。气氛还真有点不一般，全国追查谣查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，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。据说是《红都女皇》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，引起一些不良影响，江青也被批评。但和维特克又怎么联系上的呢？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特别去找了小徐，她知道得比较清楚。她说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，但与那本《红都女皇》没有直接联系。前些时候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《红楼梦》部分传抄出去了，大学中学都在传抄，说这是江青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，要学习什么的。这时恰恰《红都女皇》也传开了。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，于是立刻要收回有关《红楼梦》的讲话。那么一传，就把《红楼梦》那段说成是谣言了。现在是完全否认江青有过这么个讲话，连外交部也在追查，真是莫明其妙的事情，其实有不少人是知道内情的。尤其使我吃惊的是，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，全部都被江青搬走了。这件事确实使我感到十分意外。在外交部存放的保密材料，谁敢取走呢？即使江青要取走也得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呀。小徐茫然不知。后来我听说是外交部×副部长批准取走的，因为部长也不敢违抗江青。

随后我还听到，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，并且全部烧毁了。对于这件事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那时周总理病情已渐重，江青还有什么顾虑吗？我想那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复职，这当然对江青十分不利，也许正为此，而使江青感到一点压力吧。

那年回国休假，我们去探望了叶剑英老帅。叶帅对我们一家都很关心的。远在1937年深秋，那时正是抗战之初，我和广东中山大学一群大学生，组织北上抗日宣传队，其实就是奔赴延安参加革命。我们途经武汉时，叶帅当时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。他接见了这一群从广州来的抗日学生。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学生，可能长得瘦小，正站在他身旁，他用手摸着我的短发，开玩笑地说："你才这么丁点就要去抗日啦？怕连枪都扛不动呵。"我噘着嘴说："报告八路军首长，我去延安参加革命，别人能干的我都能。"引得大家哈哈大笑，多少年都没有忘记这件小事。又碰巧1939年我从延安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，叶帅他们从桂林回到重庆。他的记性真好，居然没有忘记武汉那段。见面时他拍着我的头说："长高了也长大了，像个革命军人啦。"虽然我和叶帅没有工作联系，但都住在曾家岩50号，他是个很乐观很活跃的领导同志，常常和青年一起谈笑下棋，有好吃的也不忘记我们。以后又都先后回延安。1947年从延安撤到晋西北，我们都叫他参座。他管着西北战场的后勤任务，十分繁忙。而我在那最困难的年代，生下一个孩子。有天他还特地来看我们，笑着说："你这个儿子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呵！"但他仍常关怀备至，常送些救济物资的剩余奶粉、白面、大米，甚至有时候叫小勤务兵送来一筐鸡蛋，我们心里都十分感动，对叶帅一直如对父辈一样尊敬并有深厚感情。

解放初期，叶帅不在北京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。但到"文化

大革命"开始后,叶帅一家受到迫害,儿女被关到监狱,或下放到远处,他被遣送湖南,只有王秘书跟随。回到北京后,仍是很孤单。那时我们又时常去看望他。他住在北海后门不远,我们是步行去的。因为他还受到江青、林彪一伙的监视,能了解到的情况很少,我们也只能对他说点小道消息,或一些道听途说的事,给他解解闷。我们去时他总是非常高兴的。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期间去看望他。见到我们他很高兴,我们对他说起关于加拿大的一些见闻,也说到当时在国外很难开展工作等。他心情不好,特别是因为周总理的病情不见好,他十分担忧。他忽然转变话题问我:"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?"我告诉他最后周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才决定不把那些记录寄到美国去。这时我想何不把自己的心事向叶帅汇报一下。我告诉叶帅我去加拿大前,根据总理的指示把所有材料记录都封存在外交部了,但这次我回来,一面听说全国在追查谣言,说江青会见维特克的事是谣言,另外呢,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,而且烧毁了。这当中会有什么名堂呢?叶帅显然像在听新闻,他不知道江青烧毁了所有材料。当时他只在默默地沉思,只轻轻自语:"这事有蹊跷。"

1976年我们再回国休假,正是1月9日,我们一下飞机就听到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。真像晴天霹雳呵。我的心在发抖,我们回到家放下行李,立刻奔去西花厅,欲陪伴邓大姐一会儿。只见赵炜秘书出来到门口,我们相抱痛哭。她说邓大姐已平静些了,不愿见人。在沉沉的黑夜里我们步行回家。

1月11日,我随着长长的人流,慢慢从长安街排队一直到北京医院后边的那间小屋,周总理就睡在那间小层里,所有走进去的人都在失声痛哭……

那年休假我们在北京住了4个月。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啊。从3月中旬,我们天天到天安门广场,先是一队队少先队员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,宣誓、哀悼。过几天是一群群青年、学生。清明节快到了,人流像潮水般涌向天安门,朵朵白花点缀了整个广场,然后是花圈、大标语。人们的心都凝聚在这里呵……人民真是觉醒了。那些天我心情本来非常沉重:中国这一伟人去了,今后的国家将何去何从?那群坏人会霸占整个国家吗?有时前几年和江青一起的那些日子,就一幕幕地重演在脑际。看得出来,她对我恼恨至极,随时都可以采取任何报复手段。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?多少人都无辜地死去了。看到这人民悼念总理的滚滚洪流,个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。

我们还要回到加拿大去,行前去和邓大姐告别。却是相对无言,我不愿在她面前痛哭,互道一声珍重而别了。

1976年10月,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在渥太华收到外国人打来的电话,询问江青一伙是否完蛋了。我们应该如何回答这种电话呢?绝不能辟谣,那就是无可奉告吧。我们在国外确是消息断了。

过了仅仅两天,国内仍无消息要辟谣。那天晚上我十分高兴地对大使说,看来江青一伙一定完蛋了,否则一定有辟谣的消息。同时我告诉他,我应该收拾行装,一个人先回国了。果不出所料,第三天接到国内电报,召我一人立即返回北京。

10月中旬,我回到北京,我感到四周有一种强烈的不安,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关住自家的门。突然在那一天,鞭炮声在北京城内外四周都响了起来,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:"四人帮"完蛋了,江青一伙完蛋了!

人群情不自禁地涌上街头，狂喜般的欢呼，喊叫：解放了，再一次解放了！我走向街心挤在人群当中，脑子里闪出了1949年北京解放时的情景，许多镜头都如此相似，而自己的心情却迥然有异。那时我还那么年轻，满怀献身革命的豪情；而今呢？内心中沉重的包袱是放下了，被人民解放了！内心说不尽激动感激之情，眼睛模糊了，滴滴泪水映着这群群欢乐的人们。

有一天，孩子匆匆跑回家来，对我说：某新闻单位有张大字报，揭发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事，说妈妈是同谋，还有一张照片哩。

我听后猛然一惊，立刻又平静了，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了解真象呵。

在一份上呈件上，用接待单位的名义，写了一份有关江青会见维特克谈话的报告，在最后一段中，把参加那次谈话会见的人员名单分列两排，而我的名字写在与江青合谋一边。我把这份报告看了又看，字迹分明，赫然纸上。我好像头上猛中一击，一阵眩晕，几乎跌倒，我强自镇静，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：江青对我的辱骂，可以坦然承受，那是来自敌人的投枪；那张大字报，也可以默然置之；而这份报告，这些同志对自己应该是十分了解的，对接待维特克的一切情况，以及当时我们的立场态度，她们都应该十分清楚，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，会反给我刺上一刀呢？我颓然地想，为了保存自己或者为了什么说不出的理由就只得去伤害别人，难道这十年来江青一伙的罪恶行径，真会把人们正直的灵魂都阉割了吗？多么可怕的后遗症！但我仍相信事实总归是事实，不值得去计较。

一天下午，我突然接到叶帅秘书的电话，叫我到他那里去，心中真是高兴。在这困惑艰难的时候，叶帅居然会想起我。我赶快离开家门，思绪也难以平静。十年动乱中，老帅受尽折磨，现在也

许已平复了伤痕。我搭上公共汽车,看到的也尽是欢畅的面容,我也就把自己那点心事暂时忘却了。踏进老帅的家门,一下就听到院内欢腾雀跃的笑声,已经十年没有听到这样的欢乐声音了!入得院门看见老帅穿上崭新的军服,军帽上的红星和红领章,闪烁着灿烂的光华。比起前两年,他显得年轻多了,脸色红润,身体健壮。他正和几个孩子在院中照相哩。见我进来向我招了招手,把我引进他的办公室。我感到有点忐忑不安,看着老帅慈祥的面容,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。默默坐了一会儿才说:

"叶帅,我想您一定看到那份上呈报告了?""人家可以这么说,你不必介意呵。关于江青与维特克的那次会见,你还向我谈起过哩,而且向你们的领导也都汇报了。你的态度我是了解的,我想组织上也了解的。"

老帅这么几句话,使我十分感动,不知是委曲还是感激,泪水又流下了。

"你现在应该把记录整理出来,把当时的情况也整理清楚。江青做的坏事太多了,那次谈话并不那么重要,但作为一段历史,也应该弄清楚的。你看是不是呢?我听说你一个人先回来,会有顾虑的,才叫你来谈谈。你还没有见到邓大姐吧?"

我摇了摇头说:"暂时还是不应该打扰她。"可是这一下,我的话匣子打开了,恨不得把这些年积在心里的话都吐出来……握别老帅步行回家。我想尽力驱散心头种种不快,除了江青一伙,我应该什么都不计较,都原谅,都忘掉。

我回到家后,心中感到平静、舒畅了许多,这是十年来都不曾有过的一种喜悦感,胸中像展开的一片湖水,宁静、开阔。我坐在那张小小的一头沉办公桌旁,无意识地用手抚摸一下自己那已开

始脱落又有点斑白的头发,这十年真是多么长久呵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时候,还在健壮之年,而现在却忽然有老去之感!不过还要振作精神,还可以从头开始,以往也是一样,在经过一段挫折,遇上一段困难以后,总是这样鼓励自己:从头开始,有新的开始,总不嫌太迟的。

我集中精神,回想那一段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,江青的种种行径,江青的谈话,我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。同时又想到应该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思想态度,都无保留地敞开在大家的面前,特别是在组织领导面前,让事实为自己说明一切。我摊开一张纸,把我与江青的关系,尤其是与维特克谈话期间这一段,尽我所能记忆的都一一写下来。与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并非我一个人。

过了两天,外交部有关的领导,把我们曾参与维特克谈话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宣布:现在部里有责任和必要向中央和审查江青一伙的组织,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。我们今天就成立这个材料小组,仍由张颖负责。尽快作好,向部领导报告。

当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,看来外交部对我是信任的。但我仍然觉得应该请求审查。我立即把我自己写的那份详细情况拿出来,交到领导手里,说明为了慎重,我请求组织首先审查我与此事件的关系。因为既然有单位或个人对我不了解,就更应审查,我所呈上的情况,每个小节几乎都有证明人或几个人同时在场,所以调查也不难。在座的几个同时参与这件事的人,颇觉惊异。我对她们笑笑,我是非常坦然的。虽然我一边要求审查,但同时又欣然开始工作。散了会我们聚在一起,这次相聚倒非常高兴,都笑了起来:我们成了整理记录的专门人才啦!

我们几个人开始工作没几天,李先念副总理又把我们找到国

务院他的办公室。他先是鼓励我们，说这几天我们大家努力已经写了一些情况，写得也很认真。要我们赶快把全部记录整理出来，送上边参考。李先念副总理特别对我说，你所写的要求审查报告，已全部核查清楚，都有确实的证明。叫我不要有任何顾虑。还加上句半开玩笑的话：你现在也变得精明啦，周总理不在了，邓大姐还能不知道吗？那么多老同志都是看你长大的，对你还能不信任吗？快把事情办好才是重要的。我也坦然地笑了起来。

几年后，我在办公室收到一张入场券，非常一般又极不寻常的入场券，是旁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江青。

走过长安街，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，有一条很不显眼的小道，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间比较大的审判室，坐落在一所大院里。这是我从来未到过的地方。当我走近门口，法院的一位同志跑过来，热情招呼，让我坐在右边第三排的座位上。这时我举眼看看，这间房子已挤满人，有穿灰色或蓝色制服的机关干部，也有着绿色军服的军官们，大概是各方面的代表吧。屋子是长方形的，有坡度。面对大家的，是临时搭了一个稍高于地面的平台，摆着几张长桌和椅子。每张桌上都放一块牌子，写着主审席、法官席、陪审席等等，正对着台，下边偏右一点，有围着木栏栅的一块地方，插着被告的牌子。这使屋里增添了肃穆的气氛。人们静静地坐着，等待着。

我有生以来，还是第一次踏进法院的大门，与我想象中的法庭不完全一样。坐着的人群，流露出庄重、还带着点好奇的目光。

准点开始。主审法官是位女同志，她声音沉稳："带被告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。"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到一点，两个女法警从右旁门把江青押进来。江青穿着一身黑色的囚服，头发仍梳得乌黑光亮，昂着头抿着嘴，装出一副蔑视法庭的样子，但毕竟还是

被押进了被告的木栏栅里了。其余三人在边上的一条长凳坐着。这一天是审问江青与核对江青迫害文化人士的罪状。

法官:“江青,在1967年你签发了以李同志写反对社会主义文章为由,逮捕李同志入狱。是否属实?”

江青:“他写的文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,就应该认罪。”

法官:“江青,你回答我对你的提问,你无权在这里评论李同志的文章,你签署逮捕令了吗?说!”

江青:“我捍卫毛主席,捍卫革命路线……”江青举着手,像她以前那样喊口号,旁听席上人们在议论。

法官:“你回答问题,现在是审讯你!”

江青开始胡搅蛮缠。突然女法官的声音显得特别响亮,命令江青:“你住口,承认事实。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。”真像有一块沉重的惊堂木在桌上一拍,江青顿时也安静下来。法官传令姚文元作证,他从右边的座位上站起来,两只贼眼左顾右盼,他声音很低,法官叫他大声点。

“是有这件事情,我也参预了的。江青决定要这样做。”

江青两眼紧紧盯着姚文元,哼不出声来。

最高检察院当天控告江青的第二件事,是无故迫害郑君里等同志,历诉许多违反法纪和暗中迫害的事实。

江青的脸色在不断变化,女主审官叫她的名字时,她才醒悟过来:

“这些事我没有管呀,我不知道,我和君里……”

这时从左边门内,走出一个女同志,扶着一位头发花白、身体衰弱的老太太,坐到旁边桌子后头。我仔细一看,实在吃了一惊,这不是阿晨吗?只不过两三年,怎么会变成这样啊?心中突然激

起愤怒的情绪:江青呀江青,你干的坏事,真不是人干的!我同时又想起孙维世无辜被害的惨剧。只听见阿晨说:

"江青,江青,你看看我是谁,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呀!……"

江青显得有点惊惶失措:"阿晨,君里的事我不知道,真不知道……"

"不知道?对上海那么多老同志,你是一网打尽呵,你还是个人吗?就为了掩盖你30年代那些丑史,你要斩尽杀绝。君里就是你害死的。他临终时亲自告诉我的,你是怎样折磨他……还有你,张春桥,你是个魔鬼!……"她本是激动地站着,泣不成声,这时像是晕厥过去,跌坐在椅子上。

法官:"张春桥,你说在上海你都是怎样迫害这些同志的,你与江青怎样合伙的?回答。"

张春桥站起来,就是一言不发,不作任何表示。

江青像只狂狗般叫起来:

"不是我,我没有害死……"

阿晨:"那天半夜里,把君里抓走,把我的家翻了个遍,连有一个字的纸条都不放过,是你的手谕……"

江青连续大喊大叫,语无伦次。

江青还在大喊大叫,打断阿晨的证词,旁听席上,本来鸦雀无声,这时已骚动起来。

阿晨由于愤怒,过度激动,手指着江青说不出话来。

江青声嘶力竭,还在喊叫……

女法官又发出强音:

"江青,你老实坦白事实,任何一件事都是证据确凿的。"

江青完全疯狂了,她什么也不听,举着双手大喊大叫。主审官

叫法警把她押下去,但江青像一只疯狗被困在笼中,双手紧抓着木栏栅狂叫不止。两名法警挟着她,押出被告席。在还没有出门的拐角处,江青突然一声吼叫,躺在地上,人们都站起来往这处看,两个法警把她拉起来,挟出了审判室……

人们一时回味不过来,这就是江青!曾几何时,她也曾声嘶力竭地叫喊,她高高站在人们的头上,真仿佛要登上女皇的宝座。

晴朗的初秋,并不寒冷。我走出那条窄窄的小巷,步进天安门广场。湛蓝色的天空多么美好呵。长安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,天安门的城楼已经粉饰一新,在阳光照射下闪光,好像洗刷干净了那层蒙上的厚厚灰土。

审判江青,持续了好多天,我再也没有去旁听。我已清楚地知道,人民已经公正地审判了这段历史。但心灵深处仍留下了那么多遗憾:数千年文明古国,半个世纪的革命征途,人民付出了几多代价,还是无法躲避这样一场灾难!现在这场灾难过去了。多么善良的人民呵!但愿能迎来真正的幸福吧。

历史是人民创造的。人民永远是历史的见证人,是历史最终的裁判。

13.题内题外

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,名为《江青同志》。据我所知该书没有见到翻译成中文本。这一客观事实显然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有些人撰写的一些文章甚或书刊总要把什么《红都女皇》与《江青同志》混为一谈,使我难以理解。这是有意混淆是非,还是不作起码的调查研究所致?

最近我又粗略地再翻看了一下《江青同志》这本书。该书的内容,共分为五大部分:一、早期生活的开始;二、从上海到延安;三、50年代北京与莫斯科;四、登上政治舞台——文化大革命;五、江青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。该书还列出了江青各段生活的年表。

这本书出版于1977年,那时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,中国的政治环境已起了截然不同的变化。所以作者并没有盲目的一味吹捧江青,而是有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,还补充或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。至于这些内容是否准确,留予别人去考证评论。但当时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,作者都作了相当具体详尽的记述。

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的。江青的本

意是希望把自己树立为一个有各方面才能的中国领导人的形象，既是军事家、政治家，又是艺术家的全才。所以当时江青不仅是从谈话，而是从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要给维特克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比如在广州兰圃时做植物标本，黄昏时候的拍照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例子。她曾多次提醒维特克她不仅是文艺家，而她最热衷讲述的则是所谓西北战场那一段。但由于她根本不懂什么军事，也无任何战争实践，所以她那段谈话纯是胡编滥造。我们在座稍有一点常识的人，都感到她仅是胡说八道罢了。而维特克本人倒是一直比较实际。她再三声言她不懂战争，她只想写江青个人的历史。而她的兴趣也仅只于此。所以该书大量的篇幅是描写江青个人的历史。尤其对江青 30 年代的情况，包括那些男人追求她以及到延安后如何成为毛泽东夫人，维特克女士都有不厌其烦的叙述，就像维特克常常说的，这是外国人最关心而又最有兴趣的事。

该书作者也没有忘记江青的愿望，用了不少篇幅写西北战场。她还特别说明为了把这些段落写好，曾读了江青提出要她阅读的毛泽东有关战争、战略等文章，书中还登了江青给她的作战地图。她企图弄明白一些事情。说实话，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，更何况千变万化。江青本人就根本没有读懂毛泽东的有关战争的书，她也根本不可能对维特克谈清楚什么西北战场。我在这本小书中曾大段摘引江青讲话原文，读者可见一斑。所以在该书中许多即使是有关当年战争的一些有特别含义的词，如运动战，内线作战，诱敌深入，各个击破，战术上以多胜少，战略上以少胜多等等，作者都没有说明白。应该承认维特克女士还是花了不少精力想要说清楚，而说不清楚也是可以谅解的。维特克女士有一点是说清楚了的：即江青之所以那么强调又费劲谈西北战场，

是要说明她本人不是为毛泽东织毛衣，而是参加了那场有着决定意义的战争。她对新中国的建立有不可忽视的功劳。而江青被许多人冷落了，没能够得到中国领导人的位置，于是她心怀怨恨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她就像奇峰一般露出“峥嵘”，而且凶残。复仇的火焰使她完全疯狂而失掉理智，使她陷于被中国亿万人民唾弃的必然下场。

另外，围绕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件事，前前后后还有一些沸沸扬扬的传言，传得时间比较长而又离奇的是：周恩来为了避免维特克写的书出版以后，引起对江青的非议和在各方面引起不良影响，所以令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有关人员，找维特克女士商议，用高价收买她的版权，使之不能流传。这一谣传在美国还相当普遍为人所谈论。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。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与维特克有过接触的人士核实，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。我想如果用头脑思考一下，就知道这种谣言绝对是无稽之谈。为了使人们清楚了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，了解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，我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整理出来，也算是一个当事人的见证吧！

[General Information]
书名=风雨往事: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
作者=张颖著
页数=178
SS号=10159511
出版日期=

封面页
书名页
版权页
前言页
目录
1 旧事重提
2 江青初见维特克
3 移师广州
4 饭前饭后
5 “ 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 ”
6 “ 我是轮人之女 ”
7 江上有奇峰偶尔露峥嵘
8 批《武训传》 评《红楼梦》
9 亲改记录 树碑立传
10 谈话记录的是非
11 周总理与《谈话记录》
12 旁听审判江青
13 题内题外
附录页